



引用格式:郑忆石. 走出工具化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1): 1-8.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1-0001-08

走出工具化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Out of the toolization tendency of Marxist philosophy study

郑忆石

ZHENG Yi-shi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在充分肯定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须警惕弥漫其中的工具化倾向:一是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而淡化其理论功能;二是以理论的有用性取代或否认学理致思的必要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单纯的实用工具。其突出特征是,过于依附于现实而沦为纯粹的工具,过于关注经济利益而沦为追名逐利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工具化倾向,是历史、现实、文化传统、主体认知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克服这种工具化倾向,需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哲学本性的学理性与实用性的关系、哲学功能的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的关系,以及研究主体的自在与自为的关系。

关键词:

工具化;
哲学功能;
哲学本性;
研究主体

收稿日期: 2015-09-29

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题

作者简介: 郑忆石(1971—),女,浙江省温岭市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

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实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也是其职责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在反思以往研究因实用化导致理论沦落为“现实应声虫”时强调研究的学理性,又在反思以往研究因封闭性导致理论蜕变为“展馆青铜器”时强化研究的现实性。然而,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研究中的工具化倾向始终存在。因此,如何在“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1]双重向度的统一中,既使理论行之有效地服务于实践,又避免理论亦步亦趋地追随现实而沦为纯粹的应用工具,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的表现

这里的“工具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有用性取代学理性,在过分夸大其实践功能而淡化其理论功能的致思趋向中,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单纯服务于现实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这种工具化的研究倾向,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表现形式亦有所不同。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工具化的典型表现是哲学属性上的高度依附性,即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因哲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导致其工具化。

不可否认,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阶段我国的哲学发展,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

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在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也在随后的传播、研究、运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哲学形态出现了,一支集教学、宣传、研究、翻译于一体的队伍也得以形成。二是设立其他哲学分支学科。它们在前30年我国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各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思想家们,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于各自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不同学科间的互补。

改革开放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一天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将关注点集中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这一点,我们仅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著作中,便可证明)。就学术层面而言,这种探索包括新概念的提出、新范畴的推演、新命题的展开、新理论的创建等;就话语方式而言,这种探索是运用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相契合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有作为职业哲学家的李达、艾思奇等人,分别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系统而通俗的阐发;有作为政治革命家的毛泽东,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多个层面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成;有众多哲学教师和研究者,在参与诸如“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等问题的讨论,以及诸如“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学术争论中(以杨献珍等哲学家为主要参与者的这些争论最终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某些领导人主观意志的决

定,在与政治直接挂钩中破坏了正常的学术争论,并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思考,从而在有别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解读与解答。

然而,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并以之为样板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形成于20世纪初,一定程度上是将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嫁接到中国社会土壤的产物,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著述,都对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因而在基本理论、体系框架上,都基本沿袭或遵循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在后来近30年的研究中,我国学界一直认可和赞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以政治意识形态为生存基础,因受领导意图、政策导向的强大制约,其研究思路不得不围绕既定课题在指定的范围内进行,而在力图发挥其社会实践功能中,走向了明显的工具化和实用化:以简单贫乏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理论;以主观随意的方式,构造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演变成纯粹的教科书模式。正是将哲学与政治的贴近等同于哲学的时代感、把哲学的理论功能简化为意识形态功能、把哲学的实践功能当作满足政治的需要,导致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蜕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只言片语千篇一律或千书一体的注解。于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特点,愈发浓郁。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工具化”的典型表现是哲学功能上的极

端现实性,即在哲学与经济的关系上,因哲学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关注而导致哲学沦为追名逐利的手段。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空前的生机。1980—1990年代,学界通过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回归的序幕;通过思考现实、反思传统教科书模式,追问“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重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域;通过多个向度重启主客体关系、实践唯物论、真理观、价值观、中介论、矛盾统一性等过去被屏蔽或忽略的问题的研究,深化了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价值论的研究;通过从文本、对话、问题等多维角度的思考,初步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致思新趋向;通过“问题意识”引领下的研究指向、研究内容、研究传统的转变,从整体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后,学界通过“路径分化”的深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应用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深入,在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研究、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等方面,开辟了研究的新方向。

无疑,改变和打破先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政治化倾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市场化,在促使人们用经济理性的眼光来衡量一切时,也使贵为庙堂的哲学研究打上了世俗化的烙印,在适应市场化之需的同时,越来越具有工具性色彩。

在认识领域,哲学被工具化集中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革命变革的关键在于其拒斥在思辨王国中叠床架屋而是直面现实为由,否定学理思辨和逻辑抽象对于

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涵的价值;以主观唯心论和唯意志论留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大教训是以主观臆想思考现实而导致哲学与生活世界的隔绝为由,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无缝链接”而否定理论思考对“问题意识”形成的作用;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概念库”和“逻辑圈”、其实践功能决定了它对所谓纯粹理论应当保持警惕为由,敌视对日常生活经验、情感意愿、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表达;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功能的坦途为由,忽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层面分析和研究现实问题。上述这类观点,虽然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现实性特质,肯定了这一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发挥社会实践功能的基础、前提和条件,但是,由于这类观点强调只有坚持“哲学的实际运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正确途径,从而只见其社会功能而忽略其理论功能,更未看到后者为前者的正确发挥提供导航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进行了片面化理解,形成了以功利化、工具化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误区。

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倾向不时可见,表现为形式时髦而实质空乏的研究成果,这是其一。受市场化大潮的裹挟和利益的驱使,为了拿课题、出成果、评职称、获奖金,研究目的围绕功利的指挥棒旋转,从而使研究走上了急功近利的“短平快”之路。于是,如何使研究形式在追求新异时髦中“看起来很美”、如何使研究内容在应对考核中“显得丰富厚重”等,逐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潜滋暗长。这样一来,较之其他学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雕琢精品和埋头磨剑的学术成果似不多见。更有甚者,少数人罔顾学术道德和社会影响,推出学术快餐和制造学术泡沫,严重损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导致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理性蜕化和学术水平降低。其二,似是而非的“问题意识”。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是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否能够提出和回答时代、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否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践价值的重要维度。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研究中的这种“问题意识”却发生了变异。一些看似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却止于问题的表面,既不暴露矛盾也不揭露问题的实质;一些看似紧扣现实的研究,却没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既缺乏问题意识的理论导向也没有回答现实问题;一些看似实现了现实与理论结合的研究,却缺乏对于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握和理论的深度耕犁,既不具备问题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又缺乏理论深度;一些看似蕴含问题意识的思考,却并非来自实践和现实而往往是自己的主观设想,既不具有现实针对性也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

因此,正是这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限于重功利的工具理性而忽略其重认识的价值理性的误区,在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有用性而复活其“万灵神丹”功效,重蹈既往那种亦步亦趋追随现实中,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停留于就事论事、情绪表达、浅尝辄止、主观随性乃至政治说教的层面。而这类既缺乏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又丧失对现实的反思批判性研究,使得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从过去纯粹为政治社会服务走向今日纯粹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过程中,实用主义色彩浓厚并日渐成为新的应景工具或获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而一些只是纯粹地和直接地进行政治宣传的所谓哲学研究成果,又无形中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人们会认为,它只是一种宣传工具而没有其他应用价值。因而,拘泥于这种“现实实践”而与理论相脱节的研究,

使得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因理论深度的局限,既谈不上有高学术水平和理论品位,又难以在对现实问题的提炼中,通过把握理论总体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洞见未来发展趋势,实现理想的价值诉求。这类研究成果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也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作为人的解放工具的实践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的成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倾向的形成,有着多种原因。

就历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与我国过去长期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描述,过于突出其改变世界的功效性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成功,使其理论实效性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随着广泛宣传而在民众中获得了普及。然而,被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虽然简单明了、易记易背,但在注重“活学活用”和“实际效果”中也被彻底工具化了。长期以来,我国民众认识 and 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几条类似自然科学公式和定理的概念、名称。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被人们挂在嘴上而凸显其“大众化”特征的同时,也在工具化中被矮化和庸俗化。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终极关怀的维度时,将它简单地转换为劳苦大众的直接利益诉求。这种转换,对于唤起民众的阶级觉悟功不可没,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要求的具体而非抽象的价值诉求目标;但是,如果这种转换走向极端,就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完全等同于某些具体的利益诉求,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利益化中被彻底地工具化。新中国成立后,为形势所

需,研究者们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和手段,而没有将其同时看作一种学术对象。这种将哲学功利化的做法,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沦为现实的“应声虫”“追风影”的危险,也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与评价充满浓厚的主观色彩,功利的权衡与考虑泛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也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中寻找论据,但它的完整性被肢解,这些研究往往是从既有的政治立场出发,注重和突出那些与现实政治需要相吻合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以此作为支撑和强化政治意图的应然利器。这种“为我所用”的做法,难免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问题的解答止于肤浅、流于形式,也加剧了其工具化倾向。

就现实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与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的利益追求强化相关。改革开放使民众长期被压抑的物质利益诉求得到了空前释放,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将维护民众合法利益、为其合理性呼吁辩护,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贴近民众生活的特征,在因把握了社会心理脉搏而为自己赢得声誉的同时,也为自身研究提取了鲜活素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在极大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并带来生活及其观念世俗化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价值体系受到空前冲击。与物质欲望和利益需求的强化相伴随的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与道德追求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是活在真空而是活在尘世,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冲击,少数学者难以“守身如玉”,在将研究目标聚焦于“大写的利益”中、在拒斥形而上学中,模糊和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市场化大潮中再度沦为

工具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此外,简单化、数字化等重量轻质的学术评价机制,以及一些学术刊物为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追捧一些貌似有现实感实则肤浅、看似有“问题意识”实则是伪问题意识的文章,在助长不良学风文风的同时,也催生了学者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导致研究成果中复制品、翻拍品的批量涌现和低水平重复。这一切,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性的同时,也成为其工具化变异的推手。

就理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传统有关。与西方传统哲学注重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领域并对之长期系统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关注点和侧重处不在这类抽象的“形上”领域,而在政治、伦理、道德等与社会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形下”领域。即便是哲学,也十分注重研究的功用,强调其现实作用的一面。“经世致用”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目的,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旨向。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注重文化功利性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传承,便是我们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为中国的现实实践服务,其典型表现便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哲学中,以“实事求是”(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从哲学角度概括了“实事求是”)为其理论核心和理论精髓。“实事求是”,这一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术语,在“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转化成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思想路线、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乃至行为准则”,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运用前景”^{[2]116},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世俗经验的“重实践轻思想、重实用

轻思辨、近人事远鬼神”^{[2]117}的实践理性精神。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理论取向上明确肯定功利主义、在理论目的上主张具体的操作运用而非为理论而理论、在理论评价上强调从运用效果而非单纯从真理性出发评估理论的价值等观点,更是对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发挥。历史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现实性理论特质,决定了置身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大背景和几十年形成的研究理路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不可能游离于这种“实践理性”的研究氛围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因强调哲学研究的效用而推崇实用主义和工具化,便不仅可能而且是十分现实的事情。

就认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与国人反思既往研究失误而易走两个极端有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现实性与学理性、效用性与规范性、工具性与价值性这种两端并行共生研究维度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两端孰轻孰重?何者更为根本?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激辩的论题之一。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那种简单片面地理解哲学的本质、属性、功能,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同于政治性,甚至将哲学与政治混为一谈,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简单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发挥其应有功能,反而沦为政治工具,遭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反思和批判。痛定思痛的研究者们,在作别和抛弃“闻政起舞”的研究路径和研究目的中,将目光和研究重心转向了研究的纯性学术、思辨理性和表达的规范性等学理层面,并将其视为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和理论水准的正道。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研究却剑走偏锋,将思辨性、学理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路径,拒绝对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展开学理性分析。这类将研究导向书斋化、自我幽

闭于象牙塔的做法,随后遭到了学界的质疑。然而,在反思这种研究的纯学术化倾向中,一些研究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以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实用性、功效性,淡化或否认哲学研究的学理性、规范性、价值性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流俗、肤浅,加剧了其沦为工具的危险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的摒弃

避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工具化倾向,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下述关系。

1. 哲学本性:学理性与实用性的辩证统一

究其本性而言,哲学是学理性与实用性的统一。首先,与一般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具有艰深哲理性和理论思辨性的一面,因而,其理论的学术性和体系的系统性,不是仅靠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哲学读本或哲学讲坛就能得以实现或建构的。毕竟,作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等同于作为“教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与一般哲学不同,作为民众改造现实的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深奥哲理只有转化为通俗的大众语言,才能发挥作用。然而,通俗化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民众的一条正确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当下中国,随着民众知识面的扩大、理解能力的提升、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先前被认为是难理解的概念范畴和深奥的哲理,已经没有什么难解深奥可言。因此,即便是作为宣传教育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一味强调其表达的通俗性、形象性而放弃其表达的思想性、思辨性和学理性。因为这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变语言形式的同时导致其思想变形,从而不仅降低其学术深度,而且矮化其理论形象。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性与实用性的双重维度,一方面需要通过平实朴素的文风、通

俗大众化的表达,将深奥哲理和学术话语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语言,从而掌握社会生活的话语主动权;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透视问题表象把握问题实质,通过考察实践现象提炼实践规律。而要实现二者统一这一目标,就离不开研究中的理论思辨力。因此,研究的学术性、规范性、学理化,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深度,至关重要。

2. 哲学功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与哲学本性相应,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其功能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哲学的理论功能,是指其作为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可为人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提供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哲学的实践功能,是指其具有一般意识形态干预和服务生活实践的效用和能力。诚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哲学不仅应当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3]220},即反映现实,而且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旗帜与号角,“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3]220}即干预现实。哲学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使命,决定了它的出路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统一。作为理论,它负有“世界哲学化”^{[3]77}、唤起主体理性的使命;作为实践,它负有“哲学世界化”^{[3]220},即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哲学的理论功能通过现实生活的实践而得以证明,哲学的实践功能需要理论引领以确保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哲学功能中蕴含的这一双重性,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因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同于政治性,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发挥其应有功能反而沦为政治工具的历史悲剧。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反思和思想解放,使哲学逐步恢复了其求真爱智与指导现实的双重功能。但如前所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没能真正跳出“两级跳”的泥潭。因此,在

哲学理论功能的认识上,吸取非此即彼的研究模式、避免重蹈教条化或工具化的两极思维模式的教训,必须在警惕将哲学视为单纯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而“活在云端”倾向的同时,警惕以哲学应当服务现实为由变其为现实的“传声筒”“播放器”的工具化倾向,即防止无限夸大哲学的实践功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超越其所能履行的界限,将理性的哲学变成纯粹的工具,沦为现实的“尾巴”。事实证明,过度介入现实的哲学,必然坠入主观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陷阱。因此,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需要研究者们辩证理解、正确把握哲学功能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3. 研究主体:自在与自为的辩证统一

这里的“自在”,是指受个人利益驱使或完全为环境所左右的研究;这里的“自为”,意即自觉地将个人志趣与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相结合的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其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者应当更具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决定了其作为社会批判者和良知代言人,应当更有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然而,研究者们不是飘在真空中而是活在尘世这一现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难免会受功名利禄的纠缠纷扰,从而落入将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当作追名逐利工具的陷阱。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正确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就主体而言,需要强化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理想主义维度,激励其“为人民做学问”;从道德修养层面,提倡“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的自觉性;从学术追求角度,“崇尚精品、严谨治学”^[1]。就客体而言,除了要充分考虑和解决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待遇外,还需要学术评价机制更为科学化和学术法规规则进一步强化。唯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现“出产品”与“出精品”、“为自己”与“为人民”的统一中,避免研究中的工具化倾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9-26)[2016-05-1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 [2] 何显明,雍涛.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引用格式:程耀明. 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精神建构[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9-1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09-06

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精神建构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piritu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程耀明

CHENG Yao-ming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形象、政党的旗帜。文化自信源于民族基因最深处的国民素养和精神力量。今天中国文化自信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与滋养,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劲的精神引领。要培育、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要持续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坚持文化的科学性,增强文化的说服力;坚持文化的大众性,增强文化的向心力;坚持文化的创新性,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坚持文化的开放性,增强文化的进取力;坚持文化的时代性,增强文化的感召力。

关键词:

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精神建构

收稿日期:2016-09-10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项目(huy-da1521)

作者简介:程耀明(1962—),男,河南省杞县人,河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作过多次精辟论述,认为增强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强调中国坚定“三个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把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作为“四个自信”,而且对文化自信作出了更加深刻的阐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这一阐释极大彰显了我们党的文化情结和文化理念,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认识的深化,可谓意蕴深远、意义重大。

一、文化自信的缘由

文化自信源自民族基因最深处的国民素养和精神力量。本质而言,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同、坚守和积极践行,更是对其文化生命力的自信及其未来发展的期望。因此,文化自信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素养,也是乐观积极的文化态度,更是激发民族活力和开发民族智慧的深沉持久的内在力量。坚持文化自信,主要是基于文化具有以下功能。

1. 文化彰显个人内涵

人既创造文化又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文化发挥其功能的过程,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人的认识过程之中,而且贯穿于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纵观人类史,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不打上各种文化的烙印。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一旦文化内化于心,就会形成“文化指令”,从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理念,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指向——这一过程全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能够浸润心灵使人充满正能量,相反,腐朽文化和落后文化则会使人变得狭

隘、自私、无知、庸俗。

2.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每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创造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旦被人们接受和认可,就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民族的兴旺不能完全靠金钱和权力来支撑,还必须依靠自己的文化。民族文化可以积淀成民族品格,汇聚成民族心理,使一个民族获得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不致迷失方向和失去动力。在历史上,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最后征服,往往是通过破坏其民族认同、解构其民族文化、消解其民族自信来实现的。一个没有优秀文化和精神支柱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民族。

3. 文化是国家形象的灵魂

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的集合体,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大国和强国均高度重视其文化建设,不重视文化的国家,不管其经济实力多么强盛,都难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无疑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其实质是科技和文化的竞争。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文化不仅能够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等领域,而且还能够直接创造价值。目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文化。越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就越高。

4. 文化是政党的旗帜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非执政党,从成立到确立其政治地位,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任何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都必须选择某种理论或者某种文化作为自己的旗帜。政党地位特别是政党权威的要义是争取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政党权威必须依靠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正确的价值

理念才能确立——政党权威不是全然刚性化的东西,还包含深厚的文化意蕴。政党权威与文化理念具有同构性和互构性的深层关联。文化一旦化为政党组织的集体行为和党员的个体行为,就深层地融入政党的组织架构中,进而成为政党的旗帜。

二、文化自信的源泉

我们的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言:“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1]中国的文化自信,既在于有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支撑,也在于有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继承发展而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共同奠定了我国文化自信的基础。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其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其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这是今日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优秀的传统文化滋养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植根于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希望,是无可替代的中国软实力,也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独特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种文化

精华闪烁着时代光辉,涵养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¹⁵⁸“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2]¹⁸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各民族的文化不断吸纳融合。不仅如此,中华文化还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长期交流中兼容并蓄,吸收了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使得我们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承继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举世罕见,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古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曾在世界上长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给予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以重要文化支撑,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创造出世界历史上一个个惊世奇迹。

20世纪中国最辉煌的文化景观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开辟了独特的革命道路,凝练了厚重的革命精神,形成了丰富的革命文化。这一革命文化最具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它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是在新形势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升华。因此,这是20世纪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文化建设的厚重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引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形成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当代中国特点而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它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崭新形象。

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现实根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引发的经济社会推动效应,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今天,中国文化受到了全球的关注,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统筹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1]改革推进到今天,更需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种种繁荣景象给世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积累和沉淀下来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需要

我们后人去挖掘、继承、创新。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还不是文化强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已经实至名归,但文化发展的程度与目前的经济水平相比还极不适应。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欧美等国之所以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文化的进步导致其体制创新,进而促使其经济日益强盛。可以说,文化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自信,既来自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沉淀,又来自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文化的繁荣、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足,就是文化自信的源头和根本。目前,中国正在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比任何时候更有理由坚持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

三、文化自信的意义

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发达,都需要文化的积淀、传承、创新。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的理性认识;文化自信不是心傲自负,文化自觉也并非妄自菲薄。文化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绝不能用情感代替理性,也不能以理性否定情感。只有做到文化自信,才能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真心认同;只有做到文化自觉,我们党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清醒认识和理智把握,从而自觉践行,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荣使命。因

此,无论是道路选择还是理论创新、制度建设,都需要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文化自信能以其强大的感召力,激发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纳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相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言,文化自信具有更为独特和深刻的内涵,它是内化于心而无法撼动的自信。文化自信使其他三个自信更有定力——能使道路自信更有印证、理论自信更有基础、制度自信更有信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1]反过来,文化自信也来源于其他三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善,作为必然的结果,文化自信就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强大。

文化自信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不竭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诉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引领。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硬实力,便会一打即败,而如果缺乏软实力,则会不打自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已到了关键期,此种情势使文化自信显得格外重要。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对国家和民族发自内心的责任担当,就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庄严使命。因此,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时代

课题。

树立文化自信,中国有足够的历史底蕴和底气。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全球华人共同守望的精神家园,为人类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当代中国文化之所以如此有信心、有定力,正是几千年中国优秀文化积淀的结果。

树立文化自信,中国有丰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植根于中华沃土,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同时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具有真正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支撑,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了其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

四、文化自信的路径

文化自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秩序的重构而变迁,其演变是有规律的。历史反复证明,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于经济强盛、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时期,其文化就会随之而繁荣,文化自信就会随之而产生;反之,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于经济衰落、政治黑暗、社会紊乱时期,其文化认同必然会随之减弱。文化自信不仅需要孕育和培养,而且需要巩固和加强。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水涨船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还只是一个文化大国而不是文化强国,文化事业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文化产业还需要进一步培育,文化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文化资源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不断创新,给我们的文化自信带来了挑战。在此情况下,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持续的文化自信,需要有

战略性的科学规划和制度创新。

其一,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增强文化的凝聚力。民族性是文化所特有的品质,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最本质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因此,民族性是文化的根本,没有民族性的文化不可能有持久的魅力。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曾经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并经久不衰的文化,无一不具有浓郁的民族性特质。中华文化正因其特有的民族风格而为世人津津乐道。假如我们的文化与其他文化只有雷同而没有异质性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对其兴趣索然,“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就在于全民族有共同认可的文化存在。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164}

其二,坚持文化的科学性,增强文化的说服力。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科学文化与愚昧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优秀文化与腐朽文化之间的较量。科学文化、先进文化、优秀文化传递正能量,让人积极向上,有助于社会进步与和谐。科学的才是先进的,先进的才是优秀的。在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向往和追求科学文化、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化。但愚昧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仍然有其生存的条件和土壤,甚至会有人对其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这就需要我们弘扬科学精神,传递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引导人们学会辨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说服力,才能真正树立起持久的文化自信。

其三,坚持文化的大众性,增强文化的向心

力。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源自于人们鲜活的生产实践和生活体验。一切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文化都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少数人的文化,而是根植于大众、人人喜闻乐见、雅俗共享的文化。事实证明,文化什么时候贴近大众,什么时候就会繁荣。人民大众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果的共享者。只有坚持文化的大众性,才能使文化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进而通过这种文化自信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化为当代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

其四,坚持文化的创新性,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文化的每一次跨越无不是创新的结果。无论一个民族的文化多么优秀,一旦因循守旧和故步自封,最后只会变得平庸和落后。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161}这一论述对新时期我国文化创新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其五,坚持文化的开放性,增强文化的进取力。每个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都曾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吸收的优秀成分。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负,恰恰相反,文化自信需要博大的胸怀,需要有全球视野和开放魄力。对待外来文化,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兼收并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华传

(下转第22页)



引用格式:袁立国.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反思及其时代价值——基于《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的考察[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1): 15-22.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1-0015-08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反思及其时代价值

——基于《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的考察

The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and era value of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Hegel and the six questions of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袁立国

YUAN Li-guo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 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思想史的视角,既是探索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彰显其历史性内涵即立足古典而走向现代意蕴的不二法门。立足于深厚的传统思想资源,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方法为根本支撑,马克思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政治观念、经济观念“三位一体”的批判。在理论焦点上,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分享了共同的问题意识——基于“道德政治”诉求下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理论效应上,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抓住了自由主义政治正义论的理论盲点,并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解答。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这一重大变革,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就罗尔斯等人仍将“分配正义”作为主题以构建先验的政治理想而言,当代政治哲学尚未企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分析方法。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不仅为研究中国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哲学视角,而且也极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

关键词:
马克思;
政治哲学;
黑格尔

收稿日期: 2016-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X00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00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07)

作者简介: 袁立国(1983—),男,吉林省永吉市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

1970年代以来,肇始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成为当代思想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国外来看,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背景是:由于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所引发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者迫切地需要从新自由主义手中夺取理论的话语权。在国内,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与政治体制转型的大势,同样呼唤一种能够表达时代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以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进行深度阐释。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更为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源泉;与此同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观照现实、产生具有实践效力的理论构图,仍处在艰苦的探索之中。庆幸的是,最近张盾、田冠浩所著《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4月版)一书,就是这样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以独立的问题意识和思辨的笔法,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的若干重要问题,其间作者的一些重要思考值得学界关注。

总体来看,《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以下简称《六论》)是一部具有高度综合性的作品,全书45万余字,涵盖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等的关系六大论题。这些论题超越了学科意义上的政治范畴,在西方历史、道德、经济、政治、宗教的多维视野中求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本质。作者在钩沉文本的基础上,阐明事实,重构论证,彰显意义。本文拟管窥锥指,择其要点讨论,以期能够推动学界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价值。

(一)

从思想史的视角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个

得天独厚的视角。从19世纪开始,西方政治哲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综合时期,从理论谱系上看,马克思政治哲学可以说是近代政治哲学所达到的那些真理性洞见获得深度综合的结果。^{[1]2-3}基于思想史和文本的双重视域,《六论》重构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但具有学理依据,且包含了回应现实问题的深意。

在《六论》的第四章,作者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划分为“往前做”(探究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渊源)与“往后做”(关注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效应)的两种路向,并把关注点设定在“往前做”。以往人们过于强调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的“断裂”,忽略“传承”。作者一扫习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应该是在续写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史的意义上才得以实现的,“改变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抽象肯定和抽象赞美,这无论对马克思还是对整个近现代哲学都更公正”^{[1]56}。这一论断熔铸了作者的真实研究体验。在此之前,作者张盾的《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就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当代理论效应的典范之作。到了《六论》,他不再满足于这种“现代派”写作,而是立足于西方政治哲学,重塑马克思哲学的原本意义。此次重谈思想史的意义在于,作者悬置了以往“保卫马克思”的激进立场,以真正富有学理性的方法重审马克思的理论总问题——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哲学形式问题,“也可以说,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性问题,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主题”^{[1]7}。

总之,《六论》打通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分野,以总体性视野对同一问题加以阐释。就以往的研究范式而言,人们更多从“本体论批判”维度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旨在强调形而上学的“思辨原则”与唯物史观

“现实原则”的根本对峙。然而,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中,近代哲学的精神要旨恰恰是反对古代哲学对理想政体的推崇,注重从人性的实际出发设计政治生活,因此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政治哲学有着近乎同一的问题域,并以更深刻的方法推进了对相关基本问题的认识,如自由与权利、劳动与财产权、国家与法等。

那么,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哲学总问题之间何以具有一致性?《六论》作者认为,德国先验哲学是对现代性政治和历史的深度理论化解释,或者说,先验哲学是对政治哲学的逻辑和概念化阐释。近代政治哲学大多是以直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来探讨政治问题,德国哲学的反思精神为政治哲学重新注入了一种彻底的理性结构主义,由此使政治哲学超越经验论,把政治作为一个完全为人所创制、不同于自然事物的对象性领域,如法、道德和正义等。例如,黑格尔逻辑学所揭示的“客观思想”并非一种抽象的“观念幽灵”,而是熔铸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将政治和道德的创制性原则安置在反思的基础上,使其成为有存在论根基的解释原则。^{[1]167}在逻辑学中,维护私利的权利原则被提升为“特殊性”概念,而“普遍性”则代表“反思性的社会原则”,它力图扬弃个人主义的自然意识。所谓“普遍性高于特殊性”,是说纯粹的“特殊性”只是一个外在性的内容原则,它缺乏普遍目标和形式,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生活。相反,“普遍性”作为政治反思的形式原则,如果失去“特殊性”的实体内容,就会使自己沦为抽象的同一。因此,“伦理”必须既拥有思想的纯形式又必须包容“特殊性”内容于自身。黑格尔的经典命题“概念与实在的同一性”的深意在于:它把近代哲学中思想与实体的二元对峙,转化为精神自由创制过程中的存在与本质、实在与概念的同一过程,以此超越近代政治哲

学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恢复了由古代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所开创的精神政治传统,即“应当”存在的政治理想。

同样,康德哲学真正富有深意的考虑也不在纯粹哲学范围内,而是指向道德、政治诸实践领域。^{[1]203,318}如果说拯救共同体与现代社会是卢梭和柏克的目标,那么,康德的目标就是要拯救被经验主义所败坏的理性。康德对理性进行辩护的深意在于:他把政治问题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意境,认为理性不再是霍布斯、洛克意义上的自然法概念,理性的本质在于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再限定于权利、财富等经验内容,而是道德的本质标识即“人之为人的最高根据”。然而,当康德把道德规定为主宰善良意志的内在化理性规律的时候,他无疑选择了政治上的个人主义。一旦自由被理解为个体意志的内在化理性规律,那么,道德的主体就只能作为善良意志的个人;并且,道德政治的主体将是个人,而不可能是作为共同体的社会。^{[1]319}在这一复杂的理性结构中,康德以作为自律的自由概念继承了卢梭的自我立法观念,并走向纯粹的、内省的道德自我,从而摒弃了近代个人主义粗俗的自利原则,最终以更彻底的理性主义手段将政治个人主义推向极致。

《六论》对康德哲学的上述阐释,解决了我们以前理解马克思的一个困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康德“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的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意识形态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2]。对于马克思的这一判定,人们通常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对之解释。但实际上,这种解释不仅显得意识形态性强于学理性,而且往往有似是而非、循环论证之嫌,即以有待确证的命题来解释依据这一命题所得出的结论。相比

之下,《六论》的解释不仅更具有学理性,并且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说明《六论》在深层次上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相契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要旨在于:把哲学批判、政治批判与经济学批判融为一体,以达到对真理的总体建构。基于这一总体性视野,旧形而上学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庸俗争论失效了,更真实的问题是:“如何把私人利益与公共善统一起来,如何把每个人的自利倾向与人类的自由理想统一起来”。同样,以“敌友政治”为分析框架的现代政治自主性、以“合理盈利”为分析框架的现代经济自主性都变得不可能了,“马克思的新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被异化的、财产权是压迫性的、剥削是一种政治压迫形式,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1]5}。于是,当作者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涵进行深度分析时,就勾勒出一个不同于“哲学的马克思”“政治学的马克思”“经济学的马克思”的“总体的马克思”形象,从而具备了一些新的问题意识,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风格。

(二)

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道德、政治都是意识形态的一般形式,其相比经济而言具有派生性,为特定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艾伦·伍德由此认为,马克思不是依据道德和正义去批判资本主义,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及其必然崩溃的结果。然而,一旦彻底清空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要素,将极有可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导向实证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对此,胡萨米的反驳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社会学,其规范不仅有经济因素,并且也作为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而具有超越性特征。

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经济批判,并且同样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或“真正人的”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3]这个反驳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如果道德在唯物史观中同样具有实质性的规范力量,那么,这一超越性的共产主义价值规范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我们如何证明共产主义具有价值上的可欲性?笔者认为,《六论》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六论》表明,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家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如何在现代社会之上重建“道德的政治”。近代政治正义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当霍布斯、洛克把政治从古代抽象的伦理目标中摆脱出来以确保其现实性时,不过是以个人的自我保存为前提,即允许每个人为自由和平等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聚集在一起订立的契约关系。在这个个人主义社会中,如何统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整合是一个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卢梭、康德、黑格尔的,同样也是斯密和马克思的。^{[1]194}在这一问题域内,马克思的独到贡献是:“所谓‘道德政治’必须从一般的权利扩展到财产的权利,而财产权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也就是所谓‘社会问题’。”^{[1]214}在此意义上,当代分配正义问题并不具有原初性,实际不过是社会问题的折射,它们共同隶属于马克思对现代道德政治的更高规划。自洛克以降,对私有财产权的论证是现代政治的顶点,为了克服资本逻辑对现代政治的异化,马克思把普遍人权的反思推进到“穷人的权利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现代政治的“物质根源”,即“财产权批判”这一落脚点。

将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学术渊源(卢梭、蒲鲁东)与现实关怀(开启于“林木盗窃法案”)结合来看,对穷人的关注是其哲学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把穷人的权利和贫困问题置于现代政治场域的核心,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规避以往先

验的伦理规范原则,这堪称马克思对政治分析方法的最大创见。

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观点。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受法国大革命的误导,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宗旨是把“社会问题”改造为“政治问题”,即把解决穷人的贫困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幻想以“穷人的权利”,取代启蒙哲学的“普遍权利”,以此作为人类解放的最高目标。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所做的工作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倒退与堕落,因为贫困在其本质上是基于人的生物性需要所产生的必然趋力,它与自由的积极含义——基于实践理性而建立富有公共精神的共同体的政治行动——相悖,它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六论》认为,正是在财产权问题中,凝聚着现代自由的最深刻难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经济问题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主导问题,现代政治在进行自我理解时只有将经济问题纳入进来,才能获得整体性的解释。早在《巴黎手稿》时期,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马克思就发现了异化劳动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以此解构了资本主义政治解放所建立的公民社会,进入到了阶级社会的境域。“自霍布斯到康德一直追寻的‘公民社会’概念亦失去对‘现代’本质的政治解释力,新的解释是: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216}因此,马克思在进行现代政治分析时,始终坚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内部重新理解现代自由的全部含义,强调“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4]，“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5]。

事实上,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主题,在17—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被反复探讨。无论是在古代抑或是在中世纪,消除

贫困都不曾是政治正义的主题。尤其在早期基督教时代,贫困被看作上帝对原罪的惩罚,对穷人的救助往往诉求于教区救济,以彰显上帝的荣光。决定性的转折点是亚当·斯密。斯密秉承启蒙时代的平等精神,在财富性质的探讨中进一步把社会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理解,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政治社会的唯一目标。借此,斯密力图矫正欧洲社会对待穷人的歧视态度,并试图在伦理学上说明使穷人摆脱贫困不仅是正当的,并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表现:“每个大规模的政治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各式各样的职员、劳动者或工人。任何让绝大部分成员得到改善的发展,绝不可能伤害整体。当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还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欣欣向荣或快乐。”^[6]但在斯密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古典经济学日趋保守。威廉·汤森、马尔萨斯都认为,穷人的存在不仅源于道德堕落,而且也是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于贫困,政府什么都做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市场掌管穷人的命运,以维系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观点后来在萨伊、西尼尔等“庸俗经济学家”那里,被发挥为市场的自发平衡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

上述近代思想史表明,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史的革新和影响巨大。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其深意在于回应斯密的问题,即如何在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逻辑规定中,把握现代自由的最高含义。对现代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政治哲学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应该从现实的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整体结构出发,思考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现代社会制度构架之关系的深层规定。在此意义上,“现代人的自由”已经不同于“古代人的自由”。相比于古代人蔑视财富、贬低劳动,现代人认为“人之为人的自由并不需要为摆脱它的

制约而放弃现实中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转入内省的主观道德性,它就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之上为自己开辟另一条道路,‘真正人的存在’运用物质的力量将自身逻辑从自然的必然性改变成自由的自主性”^{[1]347}。同样,这种对“自由”的规定也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解。现代自由主义把矛盾的焦点转化为“群一己”之权界,汲汲于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划定明晰的界限,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免受社会之害。结果,公共权力则被视为绝对的消极力量被最大限度地予以规避,诸如贫困等社会问题也就被自由主义政治重新划入私人领域,这实际默认了社会的自然发展。在马克思的政治反思视野内,自由主义对个人与社会的僵硬划分,不过是资本逻辑统治下物化世界的衍生物——“物化世界不仅抛弃了真正的共同体也抛弃了真正的人,只保留了作为所有者的抽象个人和作为虚假共同体的阶级……个人与社会都是依经济尺度和利益原则而存在的”^{[1]350}。因此,自由的真谛不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划定明确界限,而是如何克服物化逻辑的规定,完成从物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升华。这一世界作为真正属人的世界是“本真的共同体”,代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财富生产的支配。个人从此不再作为资本的职能而存在,而是通过重新支配生产条件和生产过程、重新占有自己作为人的内在的丰富本质。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联合必须具有经济性质,这是基于人的存在论境遇而去克服人的受奴役状态的唯一出路。

(三)

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当代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调整与修正的过程,并克服了早期理论的一些缺陷,以应对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进步社会理论思潮的批评。针对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新变化,《六论》缺少必要的回

应,这是该书的遗憾。笔者认为,以上述问题为导向,可以在当代语境中进一步拓展其理论宽度。

例如,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左翼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似乎变得更有“良心”了,这体现在社会问题被编织进了正义论的理论建构中,这显然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积极成就。^[7]一方面,从方法论层面而言,罗尔斯对正义论的建构是从先验理性主义出发的,并设定“原初状态”“理性人”“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几条原则来建构正义的规范理论和法律框架,因此明显地把政治作为一个自治领域来看待,悬置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对法与政治的掣肘作用;另一方面,从理论诉求而言,罗尔斯进行正义论建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团结。但这种按照“差序”原则所实现的社会正义并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好社会,因为它等于要求我们在正义理论的“劝导”下承认市民社会中现存不平等事实的合法性。究其根本,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调节性的”,实质是附着于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关系之上的,并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挑战。无视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必然无法对产生不公正社会关系的源头予以有效分析。因此,尽管它同样试图认真对待社会问题,但并没有深入考察产生这一问题的真实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继承了自由主义的道统——把经济看作绝对无辜的私人领域,把政治看作高于经济利益领域之上的法律规范。与其相对,马克思看到了经济领域乃是一个真正的“力量”和“权力”的体系,在其中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深层权力结构。

回到前述阿伦特对马克思以社会问题取代政治问题的批评,可以说,阿伦特的错误在于用仍旧停留于经济与政治二分的思维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规划。事实上,马克思在此已经偏离并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古典传统,把以

往属于政治的价值观归属于社会概念。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认为,政治概念意味着共同体成员的和平、安全、正义等公共福祉,特定的人群通过制定共同的伦理规则确保共同体的良序运作。^[8]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概念不能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即作为经济关系的职能与映现。事实上,政治就内在于人的存在之中,是人无法逃避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社会”吸纳“政治”的内涵,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表述为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形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以所有其他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条件,由此表达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和政治性(公共性),而不是被私有制所限制的普遍性和阶级政治。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社会范畴是真正的政治范畴,它早已超出了政治范畴的传统内涵。由此看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更无法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方法。

需要回答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针对马克思这一内蕴了政治价值的社会概念,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选择介入正义论话语?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应对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论?

必须看到,分配正义论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分配领域。马克思在批评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汤普森、霍吉斯金、勃雷等人时就指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谋求“公平的工资”“平等的权利”,在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资本主义的法与政治关系依托于其背后的社会与生产关系,如果不改变生产关系的结构,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人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强调,由于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在产品分配之前,首先是生产资料和生产

工具的分配。从马克思的早期命题“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自由人联合体”(《资本论》)观念,都是建立在“人支配生产过程”意义上的关于重置生产结构、变革生产方式的诉求,以此指向了一种实践的革命目的论。笔者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谋划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正义”观念^[10],以区别于各种分配正义论的观念。

生产方式的正义(或生产正义)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人支配生产过程”而非“生产过程支配人”,它不仅从根本上扬弃了分配正义的存在论基础、瓦解了资本逻辑对人的抽象统治,从而使社会关系变得更加透明、和谐,并且在社会主义图景中,生产表现为以人为目的的活动,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挥将取代资本逻辑成为真正的社会财富。人作为生产性存在,将自主地去创造其自身的历史形式。在新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与生产更像是一种艺术家的创作,虽然同样包含艰辛,却因作为人的真正的自主性活动而重新焕发光彩。就当代中国而言,分配正义论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缓解社会矛盾、重建社会公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只有在强调生产正义论的意义上,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独特价值。社会主义作为“劳动者共同体”,应当尽可能地以公权力优化资源配置,“重建社会共同意志对生产的支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以及‘劳动的普遍化’,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腾出时间,创造条件”^[1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必须以维护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尊严、平等为宗旨,反对一切蔑视、践踏劳动者人格的东西,这大概是全社会各阶层劳动人民所能接受的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正义的“重叠共识”。

从解释学的视角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真正富有意义的阐释,不仅仅是在政治哲学观念史的考察中重塑其原本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重塑其实已经包含着对文本潜力的发挥,实现了理论的再生产。如何在经典阐释中思考中国现实,生长出具有中国气质、风格 and 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是当前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正在探索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 [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2.
- [3] 李惠斌,李义天.马克思与正义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1-5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8.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 [6] 亚当·斯密.国富论[M].谢宗林,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86.
- [7] 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32.
- [8] CHANTAL Mouffe.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J].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A,1993(5):3884.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2-445.
- [10] 袁立国.正义观变革视野中的斯密、李嘉图、马克思[J].天府新论,2015(3):26.
- [11] 田冠浩.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重思马克思哲学的形上观点[J].哲学研究,2015(4):18.

(上接第14页)

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才能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前进。“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162}

其六,坚持文化的时代性,增强文化的感召力。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长期的历史沉淀,更来自于当代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牢记历史,继承传统,开创未来,善于创新。牢记历史,继承传统,不能厚古薄今,更不能以古非今,要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努力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只有这样,文化才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才能做大做强。所以,我们既要坚守传统,更要面向未来。我们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唱响时代最强音,增强文化感召力和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以文化自信创造新的奇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1).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



引用格式:阿兰·巴迪欧,马塞尔·高歌,蓝江. 关于共产主义的对话[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23-3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23-09

关于共产主义的对话

Dialogue on communism

阿兰·巴迪欧¹,马塞尔·高歌², [翻译]蓝江³

A. BADIOU¹, M. GOCHE², [Translator] LAN Jiang³

1. 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2. 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
3.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这是一场发生在法国当代左翼内部的对话,对话双方为阿兰·巴迪欧和
马塞尔·高歌。前者是革命派的代表,后者是社会民主派的代表。对话的主题
是一些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即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高歌虽然也经历和参与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五月风暴”),但完全站在纯粹理
论的角度去看待和界定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去评判列宁领导的俄
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高歌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将左翼或者马克思主义建立
更为公正的社会理想诉诸民主制。巴迪欧立足于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明
确反对高歌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认为高歌不仅曲解了马克思和列
宁,而且沿用马克思的说法批评高歌为“议会迷”。巴迪欧认为只有革命的共产
主义,才是走出资本主义泥淖的唯一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

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
列宁

收稿日期:2016-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6BZX016)

作者简介:阿兰·巴迪欧(1937—),法国哲学家,曾从师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曾任教于巴黎高师,是当代法国左翼思想的旗帜性人物,提出在当下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其主要代表作有《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元政治学概述》《柏拉图的理想国》等;马塞尔·高歌(1946—),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现为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研究总监,主要立场偏左翼改良派,主张在修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框架下实现更为平等的政治制度,其代表作为四卷本的《民主的降临》与《世界的祛魅》;蓝江(1977—),男,湖北省荆州市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

[译者导言]这是一场法国当代左翼内部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话。围绕着这一主题,以阿兰·巴迪欧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马塞尔·高歌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就共产主义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对话。高歌认为,左翼或者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在民主制框架下来争取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而巴迪欧则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认定只有革命的共产主义才是走出资本主义泥淖的最终选项。另外,在这篇对话中,两位思想家分别描述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上的心路历程及其革命性转变,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事实上,这两条路径也正是当代欧洲左翼思考未来道路的两种不同选择。

主持人(法国电视24台《争论》节目的记者和主持人 Raphael Kahane):开始对话之前,我想建议一下,你们每个人先谈一下在你们的人生历程中共产主义的价值。这是你们俩的第一次会面,你们虽来自于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知识背景,但共产主义对于你们来说都十分重要。在转向共产主义的实践及其哲学定义之前,能否解释一下你们是如何发现共产主义的,如何发现其观念、其运动、其政治体系的?

阿兰·巴迪欧(以下简称“巴”):我是共产主义后来者。一开始,我来自于社会民主派。我的父亲雷蒙·巴迪欧,是抵抗运动的成员,是图卢兹市1944—1958年的社会党籍的市长。因此,我自然地就成为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战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就等于是当时的法国社会党。1956年,我成为了巴黎高师的学生,与我的朋友埃曼纽尔·特雷一起创办了一个社会主义小组,即便当时那里已经有很多共产党了。但我真正的政治生涯肇始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在那个时期,我发自内心地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期间发生的恐怖,那里的酷刑折磨无

处不在,甚至也出现在巴黎的警察局里。我加入到反对居伊·摩勒社会党政府政策的艰苦斗争之中,他采用了镇压手段来对付学生起义。议会左派内部逐渐升级的紧张关系,导致了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分裂。我的父亲由于也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官方的治理路线,因此不得不从图卢兹市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与其他一些人组建了统一社会党。我参与了统一社会党的建立和发展,直到1960年代末期,我都是其中的积极一员,甚至当过统一社会党马恩河支部的秘书长。此外,我还取得了一点小成就,让统一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议席扩大了5倍。

马塞尔·高歌(以下简称“高”):他们得好好支持你……

巴:是的,我有很好的机会上升到党的上层……那些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清楚,之所以没有如此,是因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那是一场冲击波,对我的人格和政治主体性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我那时才31岁。正是从那时起,我与议会制社会主义彻底决裂,转向了共产主义。法国共产党(PCF)当时很强大,但我并不是其中的成员或同路人。理由很简单:法共在反殖民斗争中太过谨慎,一旦1960年代末期及其之后诞生新革命实验,法共便成为敌人——一个被鄙视且十分真实的敌人:“官方”战士想垄断他们在工厂里的政治地位,他们阻止我和我的朋友们去商店街头接触工人,阻止我们在郊区市场中分发传单。我们与法共的人多次发生暴力冲突,因为绝对不能让官僚化的政党来代表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他们过于依赖苏联的权力体制。我的共产主义认识体现在法国式的“毛主义”当中,而其中关键事件就是“文革”——我后面会讲到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的人生轨迹就是去反对主流模式:许多战士,无论是不是知识分子,在拒绝接受那

个遗产并转到其他方向上面前,都是从作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的,我,在我的立场上,“生”为社会主义者,而后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高:我的经历完全相反……我来自于一个相当卑贱的社会背景:我父亲是一个马路工人,我母亲是针线女工。我所接受的是戴高乐主义和最传统的天主教教育,后来我必须强烈地与之决裂。我生活在芒什省(下诺曼底大区),后来走出了乡村:共产主义痕迹在那里不存在,可以说寥寥无几。我很好奇,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我第一次邂逅共产主义自然是在知识上:15岁时,当我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时完全被其折服了。那时,难以抑制内心兴奋的心情。马克思的著作是我读到的最令人如痴如醉的作品了。毫无疑问,马克思也是一位长期以来对我影响最深的哲学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最后一年,我发现了政治。让我接受心灵洗礼的事件是,1962年2月8日在巴黎夏罗纳地铁站由于对反殖民战争示威遭受镇压而发生的流血伤亡事件。那时,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在其战士的伪装下,认清了法共的真实面目。我对这次遭遇,也对法共在此次事件中的不闻不问感到十分震惊。这个所谓的“党的自觉的先锋队”是多么的傲慢,多么的“运筹帷幄”!他们对待党的战士的态度,犹如玩弄象棋的棋子,仿佛他们仅仅是为了党的机构的利益才操纵他们。我或许曾遇到过友爱的朋友,更开放的实践,更实质性的知识内涵(的纠结)……但是,我不能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仍然认可最初让我恶心的东西。当你们毋庸置疑地聚集起来时,我从来没有成为其中一员,甚至都没有成为法共的同情者。相反,我加入了其他派别,一个非官方的共产主义派别:委员会共产主义(conseillisme),这个词真的很难定义。委员会共产主义运动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它关注的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决

策、直接民主,通常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一词的。那时,委员会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分化,后来裂变成几个更小的对立的分支,有时一个分支都不足12个人。这就是基本背景,即少数人中的少数人,有些东西并不容易,甚至经常没人听说过……

后来,1968年的“五月风暴”发生了。首先,这是我最擅长的,因为事件代表着极左翼的胜利登上了知识的舞台,而委员会共产主义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我的斗争主张在左翼中产生了共鸣。不过,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当我们各自的道路发生分歧的时候:那时,对你来说,1968年的“五月风暴”铺平了通往共产主义观念的大道;而对我而言,却是运动的失败——很令人震惊吧——尤其是其结果,让我逐渐地、心碎地抛弃了最初令我魂牵梦绕的马克思主义。我逐渐地意识到:共产主义是一种模式,它最终只会陷入僵局,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前提,都让我们陷入到无法超越的问题。我开始想,真正的政治工作只能在民主框架下进行——不是我年轻时的纯真的民主,而就是这种民主。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有必要彻底地改良这个当然有问题、但仍然能利用的框架。我的新的关注点是,如何让代议制民主进一步发展和改进。我“生”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后变成了一个社会党的(批判式)的同路人。这就是我如何踏入到我年轻时经常对之进行挞伐的“资产阶级阶层”的过程!

主持人:在你们各自的政治和斗争生涯中,哲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什么主要人物、什么知识流派影响了你们各自的立场?

巴:首先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萨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反殖民运动中,我是一个标准的存在主义者,我打心底里了解存在主义的伟大信条。我正是站在萨特的肩膀上,超越那些明显为殖民主义辩护的哲学家:我带着勤奋、

热忱和耐心阅读完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二战之后,萨特的哲学观念,天然地就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就是在政治上从事哲学的著名人物,创造性地将知识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国式的结合。萨特十分正确地将自己视为伏尔泰、卢梭之类的启蒙思想家的继承人,他那举世无双的盛名,正是来自于启蒙传统。

高:是的,在法国,有一种信念,即政治必须与知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典型特征。在这个方面,美国人恰恰相反。在那里,政治是纯粹实用主义的:问题就是赢得选举……与萨特的情形不同,战后共产主义的名声与你所提到的政治与知识的关联有关:共产主义观念试图将理论与实践的维度结合在一起,将思维与政治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法国就是这个观念的最理想的土壤。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巴:你把我推出来了!我是典型的法国人……

高:我肯定你是!

巴:对我而言,哲学事业与政治事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紧密。但我要指出的是,其意义并不明朗,而是非常复杂。说开一点,我今天就是来辩论的。从我个人发展来说,很明显,哲学在我政治主体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萨特是这里的第一座里程碑——但我的政治主体性,与真实的事实有关(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的“五月风暴”“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也对我面对一种“真正的”哲学产生了强烈冲击。因此,在1968年之后的岁月里坚持“毛主义”,我不得不更详尽地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最终在我后来相对较晚的时期,我发展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性分析,得出的主要观点是:我的政治事业更像是我设定自己特有的哲学任务的背景。当你们为解放而斗争、反对殖民或资本主义秩序时,会遇到哲学中

的所谓“主体”。我们不可能设想在没有理性的和合理的主体理论时,就可以谈政治激进主义问题,因为在政治中总会有一个无法泯灭的意志的维度。结果,正是在我“皈依”了共产主义观念之后,我才开始彻底思考主体的观念。这迫使我进行了一个不太可能的也极具风险的综合,即将萨特的遗产(在萨特那里,主体被萨特称为“自为”,自为就是纯粹自由,换言之,就是虚无)与结构主义综合起来。

主持人:你能回溯一下当时如何发生的情境、解释一下这个综合中的问题的模式吗?

巴:19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成为一般性的旗帜,许多来自于不同派别的作者聚集在这个旗帜下,他们提出,社会、知识、历史、语言等都有着客观的基本结构,它们是由看不见的和“无意识”的亚结构决定的。结构主义将科学性的空气带入知识氛围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我十分欢迎它——在传承上,我爸爸是一个数学老师;在个人喜好上,我喜欢征服各种难题;在训练上,我听了形式逻辑和纯数学的课程与讲座,成了一个数学家。很明显,结构主义潮流的一个主要靶子就是经典的主体或意识概念。结构主义摧毁了唯心主义将主体概括为所有意义和经验起源的传统——这个概念仍然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主要概念。主体观念被以各种方式还原为科学客体的地位,还原为虚伪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范畴。对我来说,在哲学上,它十分现代,我将其等同于唯物主义方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结构主义尤其在主体问题上,走得太过分了。当然,剥除主体的唯心主义属性是可以的,但结构主义纯粹是为了消灭主体、取消主体在哲学话语秩序中的所有的相关性和正当性!例如,在我的老师、作为科学化马克思主义运动领袖的阿尔都塞那里就是这样。对阿尔都塞而言,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一个非主体性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

从来不是一个阿尔都塞主义者。对我而言,存在着主体,在思考结构主义发展时,必须保留这个观念。如果明确地消除了主体,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获得政治激进主义。事实上,我注意到,那些基于结构主义背景而坚持共产主义的人,不可能坚持到底,最终会半途而废。完整的科学性的短视,仅仅只诉诸严格的结构——所有这些最终都破坏了政治事业,并注定会陷入僵局。

那时,还有一个人在进行着这种综合,即拉康。这就是我对拉康表示景仰并继续与之对话的原因所在。在精神分析的背景中,拉康让主体依赖于与语言有关的无意识的超个体结构。这样,他就成为结构主义运动的一分子。他打算在那个根基上来保存甚至重建主体观念。当然,在他作为治疗师的生涯中,他坐在躺椅上之后,每天遭遇着各种主体,他们是多么主体呀!他们是在多么主体的前提之下呀!有时,拉康用一个十分通俗的带有挑衅性的表达来界定自己,把自己看作“精神分析界的列宁”,就像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界中的地位相当于马克思一样。他虽然实际上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不可能一点也不关心政治。“毛主义”?一时的愚蠢。至少可以说,他抵抗1968年的“五月风暴”运动。很明显,他不是我们这边的。所以,你不得不从他关于主体的哲学态度中获得灵感,但需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打造它,以便让我们在全新的政治情境中来得出一个新概念,在其中孕育新的战士。因而这些就是我的灵感来源。它们彼此各不相同,将我塑造成别具一格的哲学人物。

主持人:马塞尔·高歌先生,你说马克思对你十分重要……

高:是的,只有当我深刻地研究黑格尔的时候,我才景仰马克思,黑格尔是让马克思的创作成为可能的哲学家,无论如何,黑格尔深刻地激励了马克思。不幸的是,今天黑格尔已经不流

行了。

主持人:无论在个人关系上,还是在知识关联上,你与某些反极权主义的人物,如柯奈留斯·卡斯托利亚迪斯和克劳德·勒夫尔关系密切,这一点众所周知。但结构主义对你也十分重要吗?

高:当然!毕竟,这是1960年代标志性的知识事件。真正的决裂发生在1965年……

巴:在1966年达到巅峰。

高:是的,它发展得很快!当你思考它的时候,它已经名满天下了。同一年,拉康出版了他的《拉康选集》,而福柯出版了《词与物》,阿尔都塞出版了《读资本论》,本维尼斯特出版了《普通语言学问题》……当时还有许多新东西!法国结构主义,在根本上,是人文科学的结构主义,它摒弃了萨特的遗产,更广义地说,是摒弃了整个现象学的遗产,与此同时,开始与其进行批判性的对话。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对拉康、福柯和阿尔都塞来说十分重要。所有这些都汇集在人类学、历史学和形而上学的交叉点上,代表了在语言元素基础上形成的人和社会的统一科学。对我来说,我与结构主义是携手并进的,这最终导致我与我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保持了距离。阿兰·巴迪欧,就你我而言,我们俩又再一次走到一起。以拉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让你在理论上得到新生,你可以借此再次赋予共产主义观念以生命力;对我而言,正好相反:一个大转变,让我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证明了那种说法:所有思想家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孩子,除非在同样的境况中,照耀出不同的路径……我很排斥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结构主义。我认为,阿尔都塞剥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成分,创造出了一种神秘化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把马克思主义变得有些苛刻。他声称,他可以用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区分出科学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成分,他的这种唯物主

义,非常类似于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共产党时代流行的教条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非常没有说服力,他的工作,最终是一本概览性的教义问答。在极左翼当中,有更为正确也更有激发力的对马克思的解读。然而,问题在于,由于结构主义,马克思所忽略的问题突然被彻底照亮,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方面是令人失望的:它似乎许诺了主体解放,但最后,它总是回到社会的经济结构或历史的前进步伐严格决定个体的模式。阿尔都塞喜欢这种分析框架。但在其他结构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这就是为什么阅读量对我来说也十分震撼的原因——在两个层次,即主观层次和客观层次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真实关联。

主持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构主义对你产生影响的一般问题域是什么?

高:一般意义上被称为“内在生活”的东西与集体生活中的东西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内”与“外”、“私”与“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结构”概念——心灵结构(包括语言结构)、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和交换规则的结构)——为此提供一种解答。但事实上,结构观念没有真正提供一种主体与他所归属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至多,它提供的是一种对这种关系的客观上的形式概括。它不让我们从里面进行理解。除了语言学、经济学和心理结构之外,实际上只有政治将社会成员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只有在政治领域中,个体才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社会人的主体。这就是我沿着克劳德·勒夫尔和柯奈留斯·卡斯托利亚迪斯的足迹发展而来的洞见,即非常早就从政治的历史变革的维度来思考政治问题。在结构主义觉醒时,我逐渐转向的问题就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重新解释历史:历史是解释个体和共同体、将历史解释为指引当下行动的关节点。要谈点有意义的东西,你就必须知道你

从哪里来,你的理论和实践角度是什么。在事实 and 知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决定意志(用一个你刚才用过的词)产生作用的一般方向。如果不能在哲学上思考我们面对的历史情境,政治行动只能是盲目的。我非常信服这一点,尽管很简单,但很有效。

我自己从事的重新解释历史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对欧洲民主经验的谱系学和深度研究,以及研究历史上唯一的共产主义的经验——苏联的经验的深刻意义。

巴:好吧,我们转向历史吧,那么……

主持人:马克思第一次从理论上概括了共产主义,而1917年的让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十月革命让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实现。你们如何评价共产主义从观念到苏联取得共产主义具体经验的转变?尤其是,你们认为列宁所建立的体制在经济上、政治上与意识形态上是否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概括?

高:当使用“共产主义”一词的时候,必须要澄清一些误解。要十分谨慎小心地区分作为一种观念、一种哲学和社会规划的共产主义与作为一种历史经验、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而建立的体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就共产主义观念而言,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尽管是马克思第一次赋予了共产主义在哲学上的名声。他在历史科学的框架下重新解释了共产主义的规划,他将历史分成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由经济结构的优先性和变化所决定的。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打破了唯心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概括,而他,作为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力图让共产主义的观念从知识的天国下降到物质的大地上。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终结,他使用了他的好友恩格斯的一个词“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究竟如何与资本主义决裂并创立共产

主义?对马克思而言,关键是废除私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认为后者会消除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消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也会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城市与农村、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对立。这也会终结共产主义社会的观念及其运动之间的区分。简言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计划许诺了一种新的伟大的和谐,一种分工自由的社会的来临,这是一个与生产体系的原始状态相关联的痛苦无序状态。在所有的领域中,其目的是整体的社会和谐。相对于这种对大写的“一”的欲望,十分明显,马克思的思想,尽管他自己并非如此,但有可能让其走向极权主义类型的理解。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共产主义计划在历史上的发展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列宁主义。马列主义的观点是锻造的产物,列宁主义被正统派界定为“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但与早先的一个结论相一致,我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结论……

主持人:那是什么?

高:当然,一方面,他们在观念上有连续性。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弹药库,尤其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的概念。但另一方面,在政治实践上,他们之间判若云泥。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在他的时代里,资本主义逐渐陷入到严重的周期性的危机之中,并日渐走向解体。此外,他认为工人阶级将变得日益强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凭借自己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就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来支撑和强化从革命性的无序(出现在资本主义崩溃的无序之后)向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简言之,在马克思那里,一切都是注定的和计划好的。相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与列宁之间的基本区别,列宁并不认为决定论会走向革命。在他看来,决裂不是“自

然的”,它需要武力的强迫。与依赖于决定论、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自然发生的过程不同,必须要在方法上预先制定好革命的过程。

当然,1917年与1848年的时代和环境已经极为不同了!马克思没有想到《共产党宣言》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他”的工人遍及整个欧洲,从组织实际行动的能力来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堂吉珂德式的国际。可以理解,实践并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思考——关于在革命转变之后会发生什么的清晰观念。列宁,对他来说,登上舞台正当其时,那时包括俄国在内的工人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工人运动提出了组织的迫切问题,界定了眼前和长远的目标。由此来看,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的决裂需要协调和引导。人们相信,一个恰当的实体可以作为先锋队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建党,如果没有党,社会主义仍然是痴人说梦,无产阶级最终也只能听从于社会民主派的旋律而远离革命——资本主义仍然继续处在最丑恶的暴行当中。这就是后来托洛茨基所概括的著名的“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的选择。

这就是基本的哲学—政治转换:列宁“发明”了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革命党,其目标是掌握国家政权并摧毁旧国家机器。一旦十月革命成功,党自己就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并成为体制的基石。它以一种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科学为武装,马克思主义科学是历史科学的具体体现。这种马克思主义科学来自于历史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外在化,它只能由体制的专家和官员来把握。于是,党就是“公正合理的”,它不仅将意识形态施加于整个社会,而且将社会发展到让其起作用的科学阶段上!一种真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专制得到了履行,所有的集体生活都由党来规制和掌控。我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制”一词来形容这种在政治和知识上的专政,这也是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极权主义。

1924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将这一逻辑推到极致。斯大林主义就是对列宁主义的延续,是对列宁主义的前提得出全部结论。斯大林是一个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它在本质上是细节性的:斯大林的主要问题是盘剥农民,并加快苏联的工业化建设。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内战,即党与农民之间的内战。这种情况导致了斯大林实施了一种极其恐怖的专制体制。

主持人:巴迪欧先生,你对这个分析有什么反驳吗?

巴:我要提出几点不同意见……

高:最后!读者们必然会没有耐心!

巴:你的分析涉及到从马克思到列宁的转变,这对我来说是太过于俗套的问题。对于政治史来说,这种延续性比你强调的更为重要。实际上,对于起义这个核心问题,有一根线索将他们二人贯穿起来。最后,在最广意义上的19世纪就是一个伟大起义的世纪:从1789年的巴士底狱风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间还有遍及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运动。你说过,马克思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政治思考。这不准确。马克思,青年时代就被教育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带有一种自发论的倾向,过度相信普通的历史力量,这种力量将十分自然地实现其规划。马克思相信前历史(即私人占有的历史,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等等)都会导致真正历史的发生,真正的历史与作为人类社会最终没有任何病兆的组织形式的共产主义相一致。马克思的概念是以一种一般性的末世论为基础——著名的“大黑暗”。这就是从法国大革命衍变而来的情境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中,造成历史断裂的正是起义的模式。马克思之所以没有真正的政治思考,是因为他极其信任革命起义,正如他自己参与了1840年代的德国革命。

不过,30年后的巴黎公社悲剧性地失败

了。在一场波澜壮阔的起义之后,工人们占领并接管了这个首都近两个月,最后在残酷镇压的血腥屠戮中结束。马克思自己并不希望在那样的条件下起义,但对他来说,巴黎公社的失败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巴黎公社既标志着19世纪起义的高潮,也代表起义的停顿点。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产生了一个萦绕在政治讨论之上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起义仍然是有效、合法的途径吗?一些人说不是,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法国和德国占据优势。他们不再讨论革命观念,他们加入到既有政党当中,选择了一条“议会迷”(“议会迷”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使用的一个词,马克思用这个词意在嘲笑认为可以通过议会途径来获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这就是你选择的道路,马塞尔·高歌先生(大笑)。

但还有一些人坚信,起义的道路是可行的……这就是列宁的选择。在根本上,我将列宁界定为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与之前的马克思一样,他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获得了教训。像那位光辉伟岸的前辈一样,他指出领袖——公认的臭名昭著——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得出结论说,那里十分缺乏对运动的组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由一个专业化的、军事化的也是严守纪律的组织队伍来领导革命的话,起义仍然有可能获得成功。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起义是一门艺术”,这意味着:政治学与经济科学和历史学不是同一回事,它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实践。

1917年,他赌赢了,将一切奇谈怪论一扫而光!列宁主义的历史就是这个不太可能获胜的假设绝对胜利的历史。它说明了,有时候你们需要留意那些假设,尽管它们不太可能……让1917年的革命获得胜利是列宁主义的政治概念,这是一种基于当时情景和机遇的概括的艺术,其中,主体性和组织是其最高属性。但

是,如果列宁关于政治实践的观点无法在其根基上实现的话,那么他就永远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难懂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这种情况下,情境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他付诸实施的政治概念而言,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骇人听闻的屠戮,俄罗斯当时的情况,正处在一个不同于欧洲列强发展模式的发展阶段。事实上,我们仍然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代”——在众多其他道路中,马列主义所代表的革命是唯一成功的革命。我记得我自己读过并深入地研究过《起义手册》,这是第三国际时期所分发和学习的材料。

主持人:这份材料鼓舞你了吗?

巴:并非如此!我从来不会认为,我自己会成功地带来一场起义。让我们回到俄罗斯与列宁。一旦掌握了权力,就要用之来实现共产主义,而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你们怎样具体实施集体化农业?你如何处理中央化的工业,如何创建一个新的贸易形式?没有任何人知道!变革整个社会的任务,在根本上由一个具有军事化革命党形象的国家来进行。最初,需要一些过渡的工具,需要一个机制来掌控权力,让其成为独一无二的模式和真正权力的根基。苏联体制真的就是一种军营式的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下——这是由极富攻击性、极富暴力性的方式所建立的专政。在艰苦卓绝的俄罗斯内战期间,这个习性保存了下来,即他们用清洗“敌人”的方式来解决,“敌人”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这种被保留下来的习性成为某种标准。当你们处在内战期间,我们完全无法评价其方式是否正义。但一旦转为建设一个国家的问题,这种方式就具有毁灭性的和野蛮的效果:只要某些决定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你就要发布命令来清洗内部的“敌人”。我们很容

易大声宣布,叛徒被击败了,但事实是,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暴力性文化如何深入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并让其变得盲目——你们要了解这一点,即马克思所界定的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千万条道路……仅仅是它们无处可寻。

最初的共产主义观念逐渐地在 20 世纪的苏联变质和堕落,这也是我的结论。但对列宁主义的整个解释,我的想法与马塞尔·高歌先生所提出的解释大相径庭。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璀璨而光辉的政治创造,但它也是 19 世纪的马克思倾注了所有希望的起义运动的最后一次实现。如果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实现最终在现实层面上被彻底抛弃,这正是因为它没有解决掌权之后阶段上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因为这个计划本身就是糟糕的。

高:你的解释,尽管部分正确,但对我而言,似乎完全不够充分。你并没有揭示出列宁主义以及随后的斯大林主义的真实含义。1917 年的胜利证实了 19 世纪的起义模式是正确的,当然,你是对的。我主要反对的不是这个。但在苏联发生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愿景。如果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只能归结为你所说的东西,如果问题仅仅局限于专属于俄罗斯的偶然性,那么布尔什维克体制的盛名和意识形态就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完全不能赞赏,它那凌驾于人民精神之上的意义和掌控。阿兰·巴迪欧先生,你贬低了苏联经验,也没有完全把握其全部价值。

巴:在这里,我并不想进行争论。直到现在为止,我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掌权及其随后的结果上,即 1922—1923 年期间的俄罗斯,在那段时间里,革命的热忱仍然是有感召力的。即便我每时每刻已经表达出我的严格的立场,甚至明确的忧虑,但我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个对苏联政治架构的完整和终极的解释。



引用格式:斯拉沃热·齐泽克,李西祥.黑格尔对决海德格尔[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32-42.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32-11

黑格尔对决海德格尔

Hegel versus Heidegger

斯拉沃热·齐泽克¹, [翻译]李西祥²

S. ZIEK, [Translator] LI Xi-xiang

- 1.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黑格尔、海德格尔和拉康哲学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批判,一方面是黑格尔思想内核中存在着一个他所未曾思考过的张力和对抗,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缺乏现象学的维度。但是海德格尔的批判错过了要点。海德格尔未能思考黑格尔的自我相关的否定性,即主体的先验的痛苦。这也正是拉康批判海德格尔的原因。通过对海德格尔语言观的批判,拉康提出语言是“折磨之家”,而主体就是无意识的、实在界的主体。对拉康而言,不仅我思不能被还原为纯粹思想的自我透明性,而是悖论性地我思是无意识的主体、是快感的实在界闯入其中的在存在秩序中的裂隙/切口。

关键词:
黑格尔;
海德格尔;
拉康;
主体;
我思

收稿日期:2016-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X005)

作者简介:斯拉沃热·齐泽克(1949—),男,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人,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后现代主义;李西祥(1971—),男,山东省泰安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室副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

[译者导言] 斯拉沃热·齐泽克(Salvo Zizek)生于1949年,是斯洛文尼亚的精神分析哲学家、文化批评家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齐泽克是一个跨越多个学科领域的思想家,其思想融合了拉康精神分析、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一直尝试将高深的哲学思想与大众文化贯通起来,其主要的思想意旨在于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复兴黑格尔的辩证法。齐泽克思想活跃、著作等身,以每年至少1~2本的速度出版了不少于50本著作,其译本包括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本文是齐泽克参加2011年柏林文化研究所召开的“一分为二:否定性、辩证法和趋势”会议时提交的论文。这篇论文以简练的语言深刻阐述了黑格尔、海德格尔和拉康哲学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从拉康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海德格尔的主体理论进行批判,恢复黑格尔的主体理论。这篇论文对于我们把握齐泽克的基本哲学思想脉络,理解黑格尔、海德格尔、拉康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德格尔的黑格尔批判

已经由青年黑格尔派说明了的对黑格尔的一个标准批判,关涉到他人、后人对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其体系之矛盾的理解和认识。尽管黑格尔的方法在其动态发展中趋近现实,在每一个确定的形式中发现了其自身毁灭和自我克服的种子,但他的体系致力于获得一个秩序存在的总体性,其中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在其视野之内。对仍然处于海德格尔影响之下的20世纪的阐释者来说,在逻辑与历史之间的这种矛盾获得了更深刻的激进确定:他们试图去勾画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存在论框架,它既是黑格尔的辩证体系的来源,与此同时又被这种体系化所背叛。在这里,历史的维度既不是一切生

命形式的无休止的进化,也不是在试图去把握历史对抗的青年黑格尔与强迫性地以其辩证法机器压倒一切内容的老年黑格尔之间的生活—哲学的对立,而是黑格尔的观念性自我中介(或扬弃)的体系的驱动力与更为原初的被科瓦雷(追随海德格尔)描述为被导向未来的人类的历史性之间的内在张力。^[1]黑格尔称之为否定性的东西的根源就是(我们所觉知的)未来:未来是(尚)未[not(yet)],否定性的力量最终与时间自身的力量是同一的,这是一种腐蚀了每一种坚固的同一性的力量。因此,人类存在的严格的时间性不是线性时间的时间性,而是参与性的生存的时间性:一个人谋划其未来,然后以一种通过过去资源的迂回方式去实现它。这种否定性的“生存的”根源被黑格尔的体系模糊了,它取消了未来的首要性而将其展现为一种以其逻辑形式扬弃的过去——在此所采取的立场不是参与的主体性立场,而是绝对知识的立场。(一个对黑格尔的相似的批判是被科耶夫和伊利波特所展开的)。他的批判者们努力去说明的是在黑格尔思想核心的一个黑格尔所未曾思考过的张力或对抗——不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必然性,这就是为何——精确地说——这个对抗不能被辩证化解决,或通过辩证的调和“扬弃”的原因。由此,所有这些哲学家提出的就是一个黑格尔的批判的精神分裂学。^[2]

在这种参与主体未来导向的时间性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海德格尔对作为人类存在之不可超越的困境的有限性之激进肯定:正是我们的有限性使我们曝光于未来的开放性,曝光于将要到来的视域之下,即超越与有限性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难怪海德格尔本人在一系列的研讨班和书写文本中,提出了对黑格尔的这种批判解读的最详尽的版本。因为这不是写《存在与时间》时的海德格尔,而是晚期的海德格尔,

他试图通过对出自《精神现象学》中的黑格尔意识的经验的观念的近距离解读,解码黑格尔所未思及的维度。海德格尔解读了黑格尔对康德怀疑论的著名批判——只有当绝对已经事先想要与我们一起时,我们才能知道绝对——通过他把基督再临(parousia)阐释为划时代的存在之揭示(去蔽):基督再临命名了先于在我们一方的任何主动的努力,绝对(黑格尔的存在之真理的名字)已经向我们揭示的模式,即这种绝对的揭示的方式奠基并引导了我们理解它的努力本身——或者,如同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所说的,如果你不曾遇见我,你将不会一直寻找我。

为何黑格尔没有能够看到基督再临的这种恰当维度呢?这便是海德格尔的下一个指责:黑格尔的否定性观念缺少现象学的维度,即黑格尔没有描述否定性在其中出现的经验本身。黑格尔从未系统地举例证明或揭示术语拒斥、否定、无、不是等之间的区别。^{[3]37}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预设了其自身的现象学—存在论基础的遮蔽:主体性。黑格尔总是使否定性服从于主体的“否定的运作”,服从于主体对一切现象内容的概念的中介/扬弃。这种对其自身基础的无视不是第二性的特征,而是使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特征:辩证的逻各斯只能在前—主体的拒绝、放弃或说不能的背景上才能发挥功能。

然而存在一种赋有特权的现象模式,在其中主体性可以被经验,尽管是以一种否定的模式:痛苦。经验的道路是痛苦地认识到在“自然的”意识与超越的意识、“为意识自身”与“为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裂隙:主体被暴力地剥夺了其存在的“自然的”基础,它的整个世界坍塌了,并且这个过程被重复着,直到它达到绝对知识。当他说到“先验的痛苦”是黑格尔思想的根本的情绪时,海德格尔在追寻着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开始的线索。^{[3]103}在那里,康德把痛苦规定为唯一的“先天”的情绪,被道德法则的律令所羞辱的病理性的自我情绪。(拉康在这种痛苦的先验特权中看到了康德与萨德之间的连接。)

在海德格尔把黑格尔的经验描述为绝望之路时,他所错失的是这个过程的深渊本身:不仅自然意识是被撕裂的,而且自然意识以之为背景经验到其不足和失败的先验标准、尺度或框架基础也是被撕裂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如果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不能作为真理的尺度,这种尺度本身就必须被抛弃。这就是为何海德格尔错失了令人眩晕的辩证过程的深刻原因:不存在通过痛苦经验逐步趋近真理标准;这个标准自身被过程本身所捕获,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这也是为何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诡计”的指责错过了要点的原因。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黑格尔的经验过程在两个层次上运动,即活的经验层次和概念诡计层次:在活的经验层次上,意识看到其世界的坍塌和一个新世界形象的出现,它把这个过渡体验为纯粹的跳跃,一个没有任何统一两种立场的逻辑桥梁的跳跃。然而,“对我们而言”,辩证的分析使一个新世界如何作为旧世界否定的规定、作为其危机的必然结果出现成为可见的。本真的活的经验,对新事物的开放,因此被揭示为某种由概念运作所锚定的东西:主体所体验为新世界的无法解释的兴起的东,实际上是在其背后的概念运作的结果,并因此最终可以被解读为由主体自身的诡计所生产的。不存在本真的他性的经验,主体遭遇的只是其自身的(概念的)运作的结果。这种指责只有当人们忽视了这两个方面——自然意识的现象的“自为”和暗中的概念运作的“为我们”——如何都被重复的令人眩晕的失去的无基础的深渊捕获时,才是成立的。“先验的痛苦”不仅仅是自然意识所

经验的痛苦与被其真理所分离的痛苦,也是知晓真理自身是非全的、断裂的、不一致的痛苦。

二、语言的“折磨之家”

这使我们回到了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指责,即黑格尔没有提供否定性的现象的经验:如果否定性恰恰命名了现象性的裂隙,某种并不(且从不能)出现的东西,那又如何?不是因为它根据定义规避了现象层次的先验姿态,而是因为它是悖论性的、难以思考的否定性,它不能归属于任何代理之下(无论经验与否),它是黑格尔所谓的“自我相关的否定性”、先于一切实证基础的否定性,且其退缩的否定姿态开启了一切肯定性的空间的否定性。从这个观点看,人们甚至能够颠覆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指责,并宣称海德格尔正是未能思考这个“先验的痛苦”的人,并且他错失了思考它的道路,恰恰是通过过早地丢弃了需要去思考人类存在的(非人的)内核的“主体”这个术语。

相应地,贯穿其整个工作,拉康把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的主题进行了修改。语言不是人们的创造和工具,而正是人“居住于”语言之中:“精神分析应该是主体所居住的语言之科学。”^[4]拉康“偏执狂”的扭曲,他附加的拧紧螺丝的弗洛伊德转向,把家的特征标记为“折磨之家”:“按照弗洛伊德的经验,人是被语言捕获和折磨的主体。”(Ibid)人不仅居住在“语言的牢笼”(詹姆逊早期论结构主义的著作的标题)中,也居住于语言的“折磨之家”中。弗洛伊德所展开的整个精神病理学分析,从铭写进身体的征兆扭转一直到完全的神经症的崩溃,都是这种永恒折磨的伤疤,是在主体与语言之间的如此多的原初的不可愈合的裂隙的标志,是人们在自己的家中从来不能如在家中舒服自然的如此多的标志。这正是海德格尔所忽视的东西:我们居住于语言之中的这种黑暗的、

折磨人的另一面——并且这就是为何在海德格尔的大厦中没有快感之实在界的位置的原因,因为语言之折磨人的一面关涉的主要是力比多的变迁。这也是为何为了使真理言说悬置主体的主动干预而让语言自身言说是不够的:语言应该被折磨以便说出真理。它应该被扭曲,去自然化,延展、压缩、切割并再次统一化,使其自身反对自己。作为“大他者”之语言不是我们应该对其信息进行适应的智慧的代理人,而是一个残忍的无情和愚蠢的地点。对人的语言进行折磨的第一基本形式被称作诗歌——想象一下一种类似于十四行诗的复杂形式对语言做了什么:它迫使语言的自由流动成为节奏和韵律的固定形式的普洛克鲁斯特斯之床。那么海德格尔的倾听语言自身的无声语词,展示出已经居于它之中的真理的程序是怎样的呢?晚期海德格尔的思考是诗性的,这毫不奇怪。回忆一下他用来这样做的手段:人们能够想象(比如说),一个比他在其著名的对巴门尼德的命题“思维一言说和存在是同一事物”所做的解读更为暴力的折磨吗?为了从它之中抽出意图中的真理,他不得求助于词语的字面意义——作为聚集的话语(legein),求助于反直观地置换句子的重音和韵律,求助于以一种特殊性的、描述性的方式来翻译单个术语,如此等等。正是从这一视角看,晚期的维特根斯坦的普通语言哲学——它把自己理解为意图纠正引起“哲学问题”的普通语言使用的医学治疗——想要去消除的恰恰就是迫使它说出真理的语言的“折磨”。(记得卡尔纳普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的对海德格尔的著名批判,他宣称海德格尔的推论是基于对作为一个实体的“无”的错误使用。)

难道同样的情况不也适用于电影吗?难道电影不也是迫使其视觉材料通过折磨说出真理吗?首先,存在着爱森斯坦的“吸引力的蒙太

奇”、一切折磨者的母亲:一个暴力的剪切把连续镜头变为随后被以一种完全人工的方式再统一起来的碎片,同把整个身体或场景暴力变为漂浮在电影空间中的“部分对象”、被从它们所属的有机整体切割下来的特写镜头的暴力还原一样。然后存在着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爱森斯坦的最大敌人,他以其对立面替换了爱森斯坦的狂热的蒙太奇:时间的拉伸、“折磨台”(它是一种古代的拉伸受刑者的肢体的折磨机器)的电影等同物。只要回忆一下塔科夫斯基的形式程序就够了,鉴于其苏联的出身,这个程序只能讽刺性地援引(臭名)昭著的质中的量的颠倒的辩证法规律,并补充以某种否定之否定(它被斯大林从这些规律的单子上排除了,因为它过于黑格尔化了,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的”):塔科夫斯基提出如果一个镜头是延长的,对观众而言无聊自然就会到来。但是如果一个镜头被延长得更远,某种别的东西就出现了:好奇。塔科夫斯基本质上提出的是给予观众时间去居于镜头为我们展示的世界中,是去思考它、研究它,而不是去观看它。^[5]

或许这个程序的最终例子就是在塔科夫斯基的电影《镜子》中的著名场景:在那里,女主角——她是一个1930年代的苏联的日报校对者——冒雨从家中跑到打印社,因为有一种对她错过了斯大林名字的淫秽性的错误打印之怀疑。肖恩·马丁(Ibid, 135)在强调其直接的形体之美的出人意料的特征时所言是正确的:

似乎只要看着玛格丽塔特瑞科娃在雨中奔跑,走下台阶,穿过庭院,进入走廊,塔科夫斯基就满意了。在此,塔科夫斯基在某种表面上看是世俗的东西中看到了美的在场,并且,悖论性(鉴于这个阶段)也潜在地对玛利亚是致命的,如果她认为她犯下的错误已经印刷了的话。

美的效果恰恰是由这个场景的过度的长度所产生的:不是仅仅看着玛利亚在雨中奔跑,并且沉浸于叙事中,担心她能否及时到达以阻止灾难,我们被引诱去思考这个场景,注意到它的显著的特点,活动的紧张,等等。因此人们把塔科夫斯基针对爱森斯坦的争论标志为一个折磨者与其同事关于不同装置之使用的争论,是完全正确的。

这也是为何与海德格尔对作为技术控制的现代性主体的历史化不同,与他以此在替代人类存在的名字的主体不同,拉康执着地使用成问题的术语“主体”之最终原因。当拉康暗示海德格尔错失了主体性的关键维度时,他的观点不是海德格尔过多地把人“被动化”为存在之揭示的工具并由此忽视了人的创造性的愚蠢的人道主义观点;相反,拉康的观点是,海德格尔所错失的是存在被语言所捕获的“被动性”本身的严格的创伤性影响,是人类动物与语言之间的紧张:因为人类动物并不能适应语言,所以存在着主体,拉康的主体是被折磨的、被毁坏的主体。就拉康的主体之地位是实在的,即就实在的原质最终是主体自身的(不可能的内核)而言,人们应该对主体应用拉康的原质的定义,即原质是“遭受能指之苦的实在”的部分或方面。主体之最基本维度不是主动性,而是被动性,是忍受。这就是拉康(参见拉康1959年5月20日的文章*Le desir et son interpretation*)如何来定位对身体实施了暴力切割、毁坏它的成人礼的:

成人礼采取了这些欲望形式之变化的形式,以这样的形式赋予它们以一种功能,通过它主体之存在与自身同一,或宣布自己本身,通过它,主体——如果人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完全成为一个(男)人,但也

可以说是一个女人。这种毁坏在此的作用是引导欲望,确切来说使它能够承担一种索引的功能,是某种可以在一种符号的彼岸中实现自身的事物的功能,一种只有在符号的彼岸中才能说明自身、表达自身的事物的功能,这种彼岸是我们今天称为存在的,在主体中的存在的实现。

在此把拉康与海德格尔分离的裂隙恰恰因为其接近而清晰可辨:通过这一事实,即为了指明在其最基本意义上的符号功能,拉康仍然使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存在”。在人类存在中,欲望在生物学中失去了其停泊点,只有就它们是铭写在语言所支撑的存在视域之内而言,它们才能够运作。然而,为了让从身体的直接生物学现实向符号空间的转换得以发生,就必须在身体中以其毁坏的假象留下折磨的标记。因此,说“语词变成了肉体”是不够的,人们应该补充的是,为了让语词铭写为肉体,肉体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夏洛克的一磅肉——必须被牺牲。因此,语词与肉体之间不存在什么先定和谐,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牺牲,肉体才能成为被语词所接受的对象。

最后,这把我们带到了快感的主题。拉巴特非常精确地定位了拉康对安提戈涅的阐释与海德格尔的阐释(拉康大量地参照了它)之间的裂隙:在海德格尔那里,完全被错失的东西不仅是实在界的、快感的维度,而首要的是,指明了在安提戈涅被克瑞翁从政体中驱逐之后的主体位置的“两种死亡之间”(符号界和实在界)的维度,以一种恰好与在现实中死亡了却被符号死亡所否认、被埋葬仪式所否认的哥哥波利尼兹的对称,安提戈涅发现她自己符号上死亡了,被排除在符号共同体之外,但在生物学上和主体性上仍然是活着的。用阿甘本的术语来讲,安提戈涅发现自己被还原为“赤裸生命”、

还原为神圣人,其在 20 世纪的典型例子就是集中营中的难民。^[6]海德格尔的忽视之赌注是非常之高的,因为它们关涉 20 世纪的伦理-政治难题在其极端展开中的“极权主义”灾难。因此,这个忽视与海德格尔未能抵御纳粹的诱惑也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两种死亡之间”乃是我们世纪所实现的或仍然承诺去实现的地狱,并且拉康正是对此作了回应,而这正是他想使精神分析为之负责的。难道他不是说过政治乃是形而上学的“洞”吗?海德格尔的场景——如果有这种场景的话——是完全地定位在这里的。^[7]

这也说明了海德格尔对在灭绝的集中营中死亡的描述令人不安的两可性:这种死亡不再是本真死亡——个体把其死亡假定为其最高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另一种匿名的工业-技术过程。人们在集中营中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他们仅仅是在工业上被消灭了。海德格尔不是隐晦地指出在集中营中被烧死的受害者不知如何并不是“本真的”死亡,而是把他们的完全受难转化为主体的“非本真性”。他所未能提出的问题是精确的:他们如何主体化(相关于)其困境?他们的死亡对他们的行刑者而言是毁灭的工业过程,而不是对他们自身而言。

在此巴尔梅斯做出了一个明确易懂的评论:似乎拉康对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之隐蔽而又冷静客观的指责是,它只是对于神经症患者适用,而不能说明精神病患者。^[8]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主体占据了在海德格尔的版图中没有位置的生存论立场,一个以某种方式“在自己的死亡中幸存”的人的位置。精神病患者不再适合海德格尔的参与生存的此

在的描述,他们的生活不再在占有人们过去的背景上自由参与的未来谋划的框架中活动,他们的生活是外在于“操心”的,他们的存在不再是“向死”导向的。

抵抗符号化(逻各斯)的快感剩余是为何在其教学的最后的20年里,拉康坚持说(有时甚至是伤感地说)自己是反-哲学家,即反抗哲学的人的原因:哲学是存在论,其基本前提是——正如第一个哲学家巴门尼德所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是思维(作为理性/言语的逻各斯)和存在的相互一致。一直到海德格尔,哲学所思的存在总是其家是语言的存在,是语言所支撑的存在,是其视域由语言所开启的存在,或者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针对这种哲学的存在论前提,拉康聚焦于快感的实在界,认为它是一种作为某种尽管远不是外在于语言的(它相关于它不如说是“外密”的),却是抵御符号化、保持为在它之中的外在的核,在它之内显现为断裂、切口、不一致性或不可能性的东西:

我向任何一个现在说明能指的出现和快感与存在相关的方式之间关系的哲学家挑战……我说的是,没有任何哲学今天能够满足我们。从十九世纪的开端就落后的作为分崩离析的惯例的哲学的可怜的天折的怪胎,只不过是一种跳跃的方式,而不是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真理的唯一问题,它被称为并且是弗洛伊德命名的死亡驱力、快感原初的受虐狂……一切哲学家的言语在这里都逃避和退缩了。(参见拉康1966年6月8日的文章 *L'objet de la psychanalyse*)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拉康指明了其作为“快感的实在论”之一的立场:一种其“自然的”

敌人只能显现为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作为存在论的最高点,作为对存在的总体解释的逻辑(逻各斯的自我展开)的最高点,通过它存在失去了其晦暗性并变成完全透明的。但是拉康在这里难道不是走得太快了吗?在黑格尔那里,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遵循拉康的“性化公式”,难道黑格尔的基本命题“没有什么事物不是逻各斯的”,其另一面不是对非全的肯定吗?这就是说,“非全部是逻各斯”,即逻各斯是非全的,毋宁说,难道它不是被对抗和断裂从内部腐蚀和切割并因此从来不能完全是自身吗?

也许拉康模糊地觉察到这一切,正如在上面他通过对哲学的粗暴的丢弃,一个从后黑格尔思想开始的丢弃,奇怪地限制为“从十九世纪的开端就落后的作为分崩离析的惯例的哲学的可怜的天折的怪胎”所表明的那样。显而易见的事情本来会是说,恰恰是后黑格尔的思想打破了存在论,断言了超逻辑的意志或生命——从晚期谢林开始通过叔本华到尼采的反逻各斯(反哲学)。似乎在这里拉康信奉了海德格尔的教义: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公式不够激进——一切关于参与的主体性的现实生活与“单纯的思辨思想”对立的谈论,仍然是在存在论的范围之内的,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明的)存在只能通过逻各斯而出现。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拉康不是接受了存在与逻各斯之间的一致(相同),而是试图从其中走出来,进入由主体与快感之间的不可能的连接所表明的实在界的维度。这就难怪关于焦虑,拉康赞同克尔凯戈尔胜过海德格尔:他把克尔凯戈尔看作是反黑格尔的,对他而言基督教的忠诚的悖论标志着与古希腊存在论的一个激进断裂(与海德格尔把基督教还原为在中世纪形而上学之内希腊存在论的衰落的一个环节形成对比)。忠诚是向只能显现(从存在论角度看)为

疯狂的一种生存的跳跃,它是一种没有任何理性保证的疯狂的决定——克尔凯戈尔的上帝实际上是“超越存在”的,是实在界的上帝,而不是哲学家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拉康会再一次地接受在1920年代当海德格尔抛弃了天主教时的著名陈述,即宗教是哲学的致命敌人——但是他把这看作执着于在宗教体验中的实在界之核的原因。

正是基于这一主体与对象(或思维与现实)之间激进的非对称性或非相关性,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梅拉苏的非相关性批判的不足:在他对先验的非相关性(声称为了思考现实,必定已经存在着一个现实对之显现的主体)的拒斥中,他自己仍然过多地停留在康德的先验对立之内,即在向我们显现的方式之现实与独立于我们的现实自身之先验彼岸的先验对立之内。以一种列宁主义的方式(《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的列宁),他接着断言了我们可以通达和思考现实自身。但是在先验的僵局领域本身之内,某种东西丢失了,它是某种关涉弗洛伊德发现的内核本身的东西(正如拉康所说的):建构了主体自身的内在扭曲的形象。这就是说,拉康所断言的恰恰是在主体与现实之间的不可还原的(建构性的)不一致和非相关性:为了主体能够产生,本身是主体的不可能的对象必须被从现实中排除,因为正是这种排除打开了主体的空间。问题不是在先验的相关性之外思考独立于主体的实在界,而是思考主体之内的实在界,主体的核心本身的实在之硬核及其外密中心。

同时,对象的排除对现实之表象也是建构性的,因为现实(不是实在界)是主体的相关物,它只能通过从它之中退缩出一个对象来建构自身,而这个对象就是主体,或者换句话说,它通过主体之对象的相关物的退缩来建构自身。用能指逻辑的旧术语来说,主体只有出于

自身的不可能性,即变成一种对象的不可能性才是可能的。因此,打破了先验相关性的自我封闭的东西,不是躲避主体把握的先验现实,而是本身即是主体的对象之不可通达性。重述黑格尔的话,这是真正的“化石”,是精神的骨头,并且这个对象不仅是主体的完全的客观现实(主体经验向客观过程的成功科学还原,如同在生物基因学中那样),也是非肉身的、幻影般的“薄膜”。在某些弗兰西斯·培根的画作中,我们发现一种(通常是赤裸的)伴随着奇怪的黑暗的似乎是从其中生长出来的、几乎不依附它的、污斑样的圆形的无定形的形状,作为身体无法恢复和整合的一种奇异的赘疣,并由此使身体的有机整体无法修补不稳定了——这就是拉康以他的“薄膜”或“混沌”概念目标所向的东西。

为何会有这种原初失落,为何会有这种建构性的从实在界的一部分的现实中的退缩呢?恰恰是因为主体是现实的一部分。因为它从它之中产生出来。这就是为何,如果主体作为非实体的我思出现,它的存在应该被提升为永远困扰他的幽灵的不可能之对象(并且它可以采取许多幻影形式,从薄膜到幽灵二重身)。主体—对象的“官方的”先验的相关性因此是被一种主体与不可能的实在对象的否定性的相关性所再加倍的:在与作为外在现实的一个部分的对象相关之前,主体被其自身的对象性阴影所困扰。在附加的虚拟对象的假象下,主体被暴露给实在,是建构性的离心的,甚至比在符号秩序中更为激进。这就是人们可以如何解读拉康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一个重述:我是实在界的不可能的一部分,在那里我们不能思。我们也可以看到以什么方式两个短缺在这种不可能的对象中是重叠的:主体的建构性短缺(主体为了作为能指的主体出现所必须丢失的部分)和大他者自身的短缺(必须从现实中排

除的部分以便现实能够显现)。再一次地,对象不仅是在两个短缺的横切面上,它严格地,并且是更为激进地通过两个短缺的重叠而出现(一旦达到了这一点,拉康就把对象 a 的地位从想象界的变成实在界的)。因此,实在界不是某种随着主体和对象的对立失去的原初的存在(如同荷尔德林在其著名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原初碎片中所说的),相反地,实在界是一种(两个短缺之重叠的)产物。实在界不是虚无的,它是某种我们无法摆脱之物,是某种作为符号运作的剩余物。

在符号秩序与现实的对立中,实在界属于符号一边,它是黏着于符号界的现实的一部分(以其不一致性/裂隙/不可能性的伪装)。实在界是这样的一个点,在那里,符号秩序与现实之间的外在对立,是内在于符号界自身的,是从内部毁坏它的,它是符号界的非全。存在着实在界不是因为符号界无法把握其外在的实在界,而是因为符号界不能完全变成自身;存在着存在(现实),是因为符号系统是不一致的、有缺陷的。人们应该给予这个命题以所有的其“唯心主义的”分量:不仅现实太丰富了,以致每一种形式化都不能把握它、都被它绊倒了;实在界只不过就是这个形式化的僵局本身——之所以存在着“在外面”的稠密的现实,只是因为符号秩序中的不一致性或裂隙。实在界只不过是形式化的非全,而非其外在的例外。

因为现实自在是脆弱的和不一致的,它需要一个主人能指的干预来使自身稳定为一致性的领域;这个主人能指标记了这样的点,在那里能指陷入了实在界。主人能指是这样的能指,它不仅指明了现实的特征,而且述行性地干预现实。因此,主人能指是对象 a 的对应物:如果对象 a 是在符号界这一方的实在界,主人能指就是陷入实在界的能指。它的作用与康德的统觉的先验综合是完全相同的:它的干预把实在

界之碎片的无意义杂多,转化为“客观现实”的一致性领域。以同样的方式,对康德而言,正是主观综合的附加把主观印象的杂多转化为客观现实;对拉康而言,正是主人能指的干预把印象之混乱领域转化为“超语言的现实”。那么,这就将是对相关主义的拉康式回答:尽管先验的相关主义可以把主人能指的干预思考为建构现实的东西,但它错失了主人能指与对象 a 之间的这另一个颠倒的相关性,即它不能思考从内部离心化主体的实在界的污斑。

三、主体与我思

拉康的主体命名了符号界中的一个裂隙,并且其地位是实在界的。如同巴尔梅斯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其关键的关于幻象逻辑的研讨班(1966—1967年)中,经过和海德格尔的十余年的斗争之后,拉康获得了其悖论性的并且(对那些执着于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观念的人而言)完全出乎意料的从海德格尔向笛卡尔、向笛卡尔的我思的返回运动。在此确实存在着悖论:拉康首先接受了海德格尔关于笛卡尔的奠定了现代科学和其数学化宇宙的我思,宣布了存在的遗忘的最高点;但是对拉康而言,快感的实在界恰恰是外在于存在的,以致于对海德格尔而言是对反对我思的论证,对拉康而言却是赞成我思的论证——快感的实在界只能在当我们从存在领域中出来的时候才能被接近。这就是为什么对拉康而言,不仅我思不能被还原为纯粹思想的自我透明性,而是悖论性地我思是无意识的主体、是快感的实在界闯入其中的在存在秩序中的裂隙/切口。

当然,这个我思是“生成中的”我思,尚不是思维之物,即完全参与到存在和逻各斯中的思维着的实体。在此,拉康比在其较早时候的研讨班更为激进地解读了“我思故我在”,在前面的研讨班中他无休止地利用主体之颠覆的变

种。他以相关于思维的离心化的存在开始:“我不在我思之处”,我们存在的内核不是在我的(自我的)意识之中的;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这种解读留下了对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关于生命比单纯思或语言更为深刻的主题过多敞开的道路,这是一种与拉康的“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起来的”这种激进“理性”或话语的论题相反对的命题。因此,他过渡到更为精致的“我在我不在之处思”,它离心化了相关于我的存在的思。作为我的完全在场的知晓,无意识是纯粹虚拟的(内存在的,坚持的)思的他者地点,它逃避我的存在。那么就来到了不同的断句:“我思:故我在”——我的存在被贬低为被我的思维产生的幻觉。然而,所有这些版本所共享的是对分离我思和我在的裂隙之强调。拉康的目的是通过指出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表面同质性中的一个裂隙,破坏二者重叠的幻觉。只是在其朝向教学的晚期,拉康才肯定了它们的重叠,当然,这只是一种否定性的重叠。这就是说,拉康最终把笛卡尔我思的最激进的零点理解为在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否定性的交叉点:一个消失中的点,在那里我不思且我不在。我不在:我不是一个实体,一个事物,一个存在物;我被还原为存在秩序中的一个空洞,一个裂隙,一个切口。(回忆一下,对拉康而言,科学话语预设了主体的排除——用素朴的话说,科学的主体被还原为零:科学命题应该对重复同一个实验的每个人都有效。一旦我们必须包含主体的说话位置,我们就不再在科学中,认识在智慧或启蒙话语中。)我不思:在此,再一次地,拉康悖论性地接受了海德格尔的(现代数学的)科学“不思考”的命题——但对他而言,这恰恰意味着它打破了存在论的框架,作为与存在相关的逻各斯之思维的框架。作为纯粹的我思,我不思考,我被还原为与其对立面重合的“纯粹思(的形式)”,它没有内容并因此是非思。思维

的同义反复因此与存在的同义反复以相同的方式自我取消的,这就是为何对拉康而言,在西奈山上燃烧的灌木丛对摩西所说的“我就是我所是”表明了超越存在的上帝、作为实在界的上帝。^[9]

拉康对我思的肯定之重要性是,相关于语言—世界的这个对子,它肯定了外在于它的一个点:一个单一普遍性的最小点,严格说来,它是无世界的、超历史的。这意味着我们受制于我们的世界,受制于我们的有限性的解释学视域,或者如伽达默尔所说,我们受制于预先决定了我们能够看见和理解的领域之历史“偏见”的不可穿透的背景。每一个世界都是被语言所支撑的,并且每一种“被说的”语言都支撑一个世界,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其关于语言的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所意指的东西。难道这不正是我们自发的意识形态吗?存在着无限差异性的、复杂的现实,我们,植根其中的个体或共同体,总是从我们的历史的世界之特殊有限视角来体验它。民主唯物主义所愤怒地拒绝的是这样的观念:能够存在无限的普遍真理,它贯穿了世界的多元性。在政治中,这意味着强加其作为普遍性的真理的“极权主义”。这就是为何人们应该拒斥雅各宾派,他们强加给法国社会多元性的、平等的普遍观念或其他真理,并由此必然地在恐怖中终结。因此,存在着民主唯物主义者格言的另一个版本:在今日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后现代的全球化机制,以及(保守怀旧的,原教旨主义的,旧左派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对它的反动和抵御。对此,唯物主义辩证法当然补充了其附加条件:真理的激进解放(共产主义的)政治是例外。

当然,对我们来说,表达这个真理的唯一路径是在语言之内,即通过折磨语言来表达。正如黑格尔已经知道的,当我们思考时,我们是在一种语言反对另一种语言中思考。这把我们带

到了本雅明那里:难道我们不能把他的神秘暴力与神圣暴力的区分应用到我们所涉及的一种暴力的模式中吗?海德格尔所指向的语言的暴力是“神秘的暴力”:它是语言形成的暴力,是本雅明关于作为神话力量的神秘暴力。用巴迪欧的话说,世界的先验坐标对存在之多元的暴力强加。相反地,思维的暴力(以及诗的暴力,如果我们的理解与海德格尔不同)是本雅明所谓的“神圣暴力”,它是语言摧毁性的扭曲,目的是使一个真理的超符号的实在能够在其中出现。

参考文献:

- [1] ALEXANDRE Koyre. Hegel a Iena, Etudes d' Histoire de la pensee philosophique [M]. Paris: Galimard, 1971.
- [2] CATHERINE Malabou. La Chambre du milieu, êde Hegel aux neurosciences [M]. Paris: Hermann, 2009.
- [3]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vol. 68, Hegel [M]. Frankfurt: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3.
- [4] JACQUES Lacan. Seminar III: The Psychoses [M]. New York: W. Norton, 1997: 222.
- [5] SEAN Martin. Andrei Tarkovsky [M]. Harpenden: Pocket Essentials, 2005: 49.
- [6]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M].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7]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De l'ethique: a propos d' Antigone [M]. Paris: Albin Michel, 1991: 28.
- [8] FRANCOIS Balmes. Ce que Lacan dit de l'etre [M]. Paris: PUF, 1999: 73.
- [9] 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M]. London: Continuum Books, 2008.



引用格式:英格·埃尔贝,李乾坤.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当代书写——英格·埃尔贝访谈录[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43-50.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43-08

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当代书写

——英格·埃尔贝访谈录

The contemporary writing of new Marx reading in Germany

—Interview on Ingo Elbe

英格·埃尔贝¹, 李乾坤²

I. EIBE, LI Qian-kun

1. 德国奥尔登堡大学 波鸿社会理论研究所;
2.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新马克思阅读”是1960年代中期兴起于联邦德国的一场思想运动,其产生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土壤上,专注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以价值形式理论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研究,力图以此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关系进行新的诠释。自2008年以来,以德国学者英格·埃尔贝等人为代表,这一理论运动的思想资源再次吸引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的关注,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英格·埃尔贝博士在受访中就“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包括“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特征与定义,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它的思想传统的谱系,它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与思想史背景,它的核心问题即价值形式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及其当代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等,为我国学界深入了解“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料。

关键词:
新马克思阅读;
政治经济学;
批判理论

收稿日期:2016-10-16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506190003)

作者简介:英格·埃尔贝(1972—),男,德国多特蒙德市人,奥尔登堡大学教授,波鸿社会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李乾坤(1987—),男,河南省商丘市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译者导言]“新马克思阅读”,是1960年代中期兴起于联邦德国的一场思想运动。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这一思想运动主张通过对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重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从而为批判理论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力图立足于这一价值形式理论的范式,进一步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关系进行解释。自1997年以来,这一运动在德国日益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2008年,德国学者英格·埃尔贝出版了《西方的马克思:1965年以来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一书。这是西方学界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著作。它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对这一长期以来被掩盖的思想潮流的关注,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就“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一些重要问题,英格·埃尔贝博士接受了一次深入访谈,现予披露,以期有助于我国学界对这一运动有更多了解。

李乾坤(以下简称“李”):英格·埃尔贝(以下简称“埃”)博士,您是德国学界第一位系统研究“新马克思阅读”的学者,这一内容也是您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大学生涯,以及您为何选择这一内容做您

的博士论文,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在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埃:我在波鸿鲁尔大学学习哲学时,就与一些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主要阅读批判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鲁尔大学并不提供与马克思相关的课程。我们必须通过自学,并借助一些马克思研究者,如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米夏埃尔·海因里希**、狄特·沃尔夫***等,来学习马克思的思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共同的目的就是拒斥德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作斯大林式的理解,以及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批判。因此在根基上,我们恰恰同“新马克思阅读”的开拓者在1960年代中期的探索有着同样的初衷。不过,对我们来说,历史情况与那个年代的联邦德国相比已经完全改变了。在这一时期,一个马克思研究者要想获得教授席位已然变得不可能了。目前,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相结合。特别是在关于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问题上,如果不将马克思和阿多诺的思想进行结合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这些问题的。因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参与到当时在德国左派中广泛开展的反犹主义批判(但不限于此)之中。

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弗

* 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1929年生于图宾根的鲁多尔施塔特,经济学家、哲学家,1968年在阿多诺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一直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作为“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首要开创者,其代表作有《价值形式的辩证法》(1969)、《马克思价值理论重建材料》(1978);其曾主编《社会:马克思理论研究》辑刊(1974—1981共14辑),这份杂志有力地推动了德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1957年生于海德堡,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柏林工程与经济应用大学教授,199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有《价值的科学》(199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2004)、《如何阅读〈资本论〉》(上、下卷,2008、2013),任《阶级斗争问题》(Prokla)杂志主编。

*** 狄特·沃尔夫(Dieter Wolf),1942年出生,社会学家、信息技术学家,独立学者,1979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代表作有《黑格尔与马克思:绝对精神和资本的运动结构》(1979)、《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1980)、《商品与货币:〈资本论〉中的辩证矛盾》(1985)。

里德·奥托·沃尔夫教授*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安德里亚斯·阿恩特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得到了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资助,没有这笔资助的话,我很难最终完成博士论文。

李:在您的博士论文《西方的马克思》中,您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作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并列的一个独立传统,这一做法,我相信不论对中国学界还是对西方学界的很多学者来说,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然这这也是一个很富开创性的做法。您不能阐释一下,“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最独特的特征是什么?换句话讲,您是如何定义“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

埃:“新马克思阅读”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因为它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特定方法,以及对认识对象的理解方式——这里首先批判的是恩格斯开创的对马克思著作的阐释方式。从“新马克思阅读”的范式看来,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叙述方式阐释为经验式的,也因此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降低到了李嘉图的水平上,也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价值理论上。“新马克思阅读”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种阐释指认为一种总和性的,即将其包括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我的博士论文特别指出,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

中,可以发现一种介于古典传统与科学革命之间的矛盾。

在内容上,“新马克思阅读”坚持价值实体和价值是财富生产历史的特定形式,而非一种超历史的、为所有人类社会奠定基础的现象。“新马克思阅读”指出,马克思那里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表述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之间是不能分离的。

国家推论***是1970年代在联邦德国出现的一种独特思想现象,在这一讨论中,“新马克思阅读”批判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理论。列宁主义尽管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属性,却没有解释清楚为何这一国家属性可以得到制度化。社会民主党虽首先将国家视作无产阶级的保护机关,却没有揭示出国家与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新马克思阅读”主张回到《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因为与商品、财富形式之间存在内在纠葛,从而必须采取一种外在于经济的公共的权力结构,一种“并不从属于特殊,而是超越一切的,针对一切的权力”(帕舒卡尼斯语),并且同时依靠这种“中立”的权力——这是对私有财产等类似东西的保障——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统治。此外,国家尽管要作为无产阶级的保护机构,但同时也是资本的再生产形式,这一点,鲁道夫·沃尔夫冈·

*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1943年生于基尔,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德国人道主义协会主席,早年曾求学于阿尔都塞,代表作有《转途:马克思主义危机中的政治理论》(1983)、《激进哲学:对启蒙与解放的探讨》(2002)。

** 安德里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1949年生于威尔海姆斯哈芬,哲学家,柏林洪堡大学神学系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主要从事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和施莱尔马赫的研究,代表作有《马克思:对其理论发展的探讨》(1985)、《辩证法与反映:理性概念重建》(1994)、《历史与自由意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2015)。

*** 国家推论,是德国1970年代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的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因马克思生前并未完成国家理论的研究计划,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只有立足《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推论。其代表人物有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约阿希姆·毕施霍夫、艾尔玛·阿尔特法特等,国家推论被“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人物视作其构成部分。

穆勒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已经指出了。

“新马克思阅读”也重建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这里尤其要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资本论》使得与制度相一致的思想行为的阐释得以成为可能。

“新马克思阅读”虽然从事经济学批判,但并不表明它是与决定性的、客观的、历史哲学的论证模式——正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之中还在频繁进行的——相兼容的。“新马克思阅读”要证明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元素,如贫困化理论、自动化生产力进步模式、将无产阶级作为清醒的即告别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这些正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可以发现的。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已然开始将其原创性的科学成果在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中拓展开。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支柱并不牢靠:阶级斗争是在内在于资本的结构化强制中进行的,并首先是在处于虚假意识形态的拜物教形式之中进行的。一种绝对的贫困化并非资本主义的必然元素,生产力并非历史的推动力量,而是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当然,对于“新马克思阅读”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它的观点是:社会的视角不能够系统地个别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中发展出来,马克思主义因而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李:中国学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我相信,对“新马克思阅读”还很陌生的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许多人一定会非常关心这一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阅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因为很有趣的事情是,“新马克思阅读”的开拓者大多是阿多诺的学生,阿多诺

在既往的研究中显然是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恰恰批判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解读。

埃: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和变化中的主体之作用,并且力图将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的因素作为西方革命缺席的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新马克思阅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经济学的批判和政治理论的具体研究并不占据中心位置,它大多还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那里,并没有对《资本论》的具体研究。不论是卢卡奇,还是布洛赫抑或葛兰西和阿多诺,都是如此。特别是他们非批判地接受了恩格斯在国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立场,并将之作为前提。与之相反,“新马克思阅读”的中心议题就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范畴体系进行研究,不仅批判恩格斯的解读,并且再次将国家问题作为分析的核心对象。当然,“新马克思阅读”也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作为相对次要的主题来研究。

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作为一种思潮,当然有其特定的产生环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兴起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背景?

埃:“新马克思阅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著作进行解释的一条新路径,这条路径首先是在1960年代中期形成的(有苏联的两位先行者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和伊萨克·鲁宾),其在联邦德国的背景是缘于左派学生运动,其时代背景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持续的、国家福利

* 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Rudolf Wolfgang Müller),1934年生于日本神户,政治学家,196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汉诺威大学教授;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Christel Neust) (1937—1988),女,政治经济学家,曾任柏林经济高等学校教授。二人在1970年合写的论文《社会国家幻象与劳资矛盾》是国家推论讨论中的重要文献。

化的战后资本主义繁荣而动摇,以及在越战期间反共产主义共识的破裂。此外,“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也因德国大学在战后的大规模扩建而获益。自1960年代中期始,德国新建、扩建了许多大学,这为左派学者提供了大量的位置。一般而言,“新马克思阅读”可以被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读,并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立足于学术领域。“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共同观点,他们都认为迄今为止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理解都有很大局限,因此需要一种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读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阿多诺的学生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海尔穆特·莱希尔特*、于尔根·李策尔特**和海尔穆特·布兰特尔等是非常关键的代表人物。除此以外,还有完全独立于阿多诺的,如约阿希姆·希尔施***、菲特·米夏埃尔·巴德尔****等,这些人也为“新马克思阅读”做出了贡献。另外,“新马克思阅读”的核心活动地点,曾是柏林、法兰克福和不莱梅。

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有趣的思想史现象是:在德国和法国学界同时开展了对《资本论》的重新解读。在德国,是以阿多诺的

学生为核心,而在法国则是以阿尔都塞的学生为核心。对德法这两个思想潮流进行对比研究,阿历克斯·德米洛维奇****和弗里德·奥托·沃尔夫*****都已经开始尝试了。对此,您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吗?

埃: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端于1965年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共同主编的《读资本论》。在此之后,《资本论》研究就超出了法国而拓展到了西德。阿尔都塞在《资本论》中想要得出一种与马克思的自我评注相对立的辩证法,并在此过程中驳斥了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经验主义说”,以及概念的、逻辑的、历史的、展开的统一这些论题;朗西埃有力抨击了恩格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本质范畴的经验主义解释,并且批判了恩格斯在历史发展领域中对财富形式的解释。阿尔都塞和朗西埃后来的思想发展,对“新马克思阅读”没有再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走向了一种愈加明确的后现代方向。

李:您的《西方的马克思》一书可以被视作德国马克思研究领域自2000年以来的一个独特事件,它在德国激起了众多的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批判了您在这本书中对“新马克思阅读”传统建构的努力,如卡尔·莱特尔和克里斯多夫·海宁。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批判的呢?

* 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1939年生于瑞典布罗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阿多诺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伊林·费切耳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68),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后在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的积极争取下,在布莱梅大学接替了佐恩-雷特尔的教席,直到退休。他也被视作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还有《新马克思阅读:社会科学逻辑批判》(2008)。

** 于尔根·李策尔特(Jürgen Ritsert),1935年生于法兰克福,社会学家,1966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

*** 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1938年生于内卡河畔施文宁根,1965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 菲特·米夏埃尔·巴德尔(Veit Michael Bader),1944年出生于乌尔姆,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与政治哲学荣誉教授。

***** 阿历克斯·德米洛维奇(Alex Demirović),1952年生,德国学者,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1979年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指导下获博士学位。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客座教授,柏林工业大学政治系教授。现任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高级干事。

*****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1943年生,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柏林人道主义协会主席,是阿尔都塞思想在德国的主要介绍者之一。

埃:很遗憾,大多数批判者从来没有真正试图理解“新马克思阅读”的立场。就此而言,这些讨论更多是作为令人有些恼火的并被证明为一些参与者的极端的无视。批判来自不同的方面。卡尔·莱特尔的主要观点是:阶级斗争就是全部,阶级关系的经济形式是完全无意义的。他将“新马克思阅读”称作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认为在“新马克思阅读”这里,处于核心位置的范畴是价值形式而非生产。这种说法不仅是无法自洽的,而且显示出莱特尔落后于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关于特定形式的,也就是市场和价值中介的形式,它采取了在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统治,从而使得一种结合动力学得以成立,这种动力学强迫所有阶级和个人处于一种资本的价值化逻辑下。莱特尔是完全不理解这些的,他站在一种强烈的活力论的和受到后现代影响的传统中,这种传统将革命主体的作用视作到处都存在的。克里斯多夫·海宁的批判我也不能理解和赞同。他对我的著作的阐释是不公平的,并且宣称,我没有解释清楚形式概念。然而关于形式概念我已经在不同的层次上非常系统地加以阐释了,尤其是在论述海尔穆特·布兰特那里。批判的总体基调也是从德国共产党的角度出发的,批评“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结构主义”,它没有提供更为革命的改变,并且是学院化的。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德国左派们对我的看法,就是一种彻底的对科学和理智的敌对。

李:埃尔贝博士,这么说,您也将自己算作“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之一员了?

埃:这是一定的。在思想内容上,我首先是站在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和狄特·沃尔夫的立场上,然而我同时也从事被“新马克思阅读”视作边缘的领域,例如对反犹太主义的批判。在这

一问题上,普殊同*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也试图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进行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衔接。但是我的观点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弗洛姆和阿多诺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李:“新马克思阅读”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如《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那么“新马克思阅读”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呢?我们知道,阿尔都塞在他的《保卫马克思》中集中探讨了这一主题,“新马克思阅读”和阿尔都塞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有何不同呢?

埃:“新马克思阅读”当然也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且研究得很细致。“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恰恰对早期和晚期著作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著作史研究,最早在海尔穆特·莱希尔特那里,他的《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1970)一书就有大量篇幅探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时,在革命理论方面,阿里克萨·摩尔也做过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这一问题上还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过评注(1980,1981)。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在《价值的科学》(1991)中同样也探讨了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著作。从内容上来讲,“新马克思阅读”对此问题没有一个一致的立场。一些人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一致性,而另一些人则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断裂性。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认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行教条,较之于晚期著作,更多还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的。这也表明,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上,不论是列宁主义还是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

* 普殊同(Moishe Postone),1942年生,加拿大华裔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作《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1993)。

者都没有达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水平。换句话说,马克思将他在1857年之后的晚期著作视为一个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影响并导致了马克思在个别定理上做出了决定性的改变。另外,还有对马克思晚期著作中价值形式分析的一些变化进行的批判。这些讨论太过复杂,很难在这里简单概括。

李:“新马克思阅读”首先关注的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着墨更多的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也被恩格斯称作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那么在“新马克思阅读”的语境中,您是如何看待价值形式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关系问题的?

埃:价值形式理论非常重要,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并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是他的“构成价值的劳动”概念,才导致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根本决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价值实体在马克思那里是高度历史化的和社会化的,而在斯密那里则是超历史的和纯粹人类学的。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上,一方面,剩余价值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和价值中介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只有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下才是存在的。于尔根·李策尔特将《资本论》“商品—货币—资本”之中描述的发

展,理解为向阶级关系的形式分析的后退,并将此视作价值形式的基础。在《资本论》中,这些看起来显得简单的范畴,是以总体的社会化方式及其现实化为中介的,因而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与恩格斯清晰的、简单的商品生产的观念相对立的。W—G—W的循环形式因此并非简单商品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一个抽象概念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对“新马克思阅读”的批判,认为“新马克思阅读”是一种循环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臆测。

李:埃尔贝博士,我了解到,自1990年代,您就在波鸿鲁尔大学建立了一个“红色鲁尔大学”的读书组织,您的一些同学也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探索。您是否可以就当前德国之马克思研究的状况作一介绍?

埃:在联邦德国,与所有人看到的表象完全相反,马克思研究日益在大学受到挤压,仅有一些完全孤立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德国的大学拥有位置,绝大多数不得不接受那种受限制的教职,或者以编外的身份在大学勉强度日。然而在更广泛的公众领域,马克思又重新成为探讨的对象,大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也有很大的兴趣。然而当学术领域的哲学家们研究马克思时,多数只是以激进批判的形式来面对马克思,也没有对过去40多年的马克思研究进行认真回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很遗憾地再次陷入了政治性的泥沼之中。此外,一些政治上左翼的组织,也不愿承认这些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意图。这是一种荒诞的情形。

李:您的新书是关于政治哲学的,您在其中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了吗?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8-99.

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在此意义上,您如何看待哈贝马斯和霍奈特的研究?

埃:我的这本书,通过对近代以来的契约论(霍布斯、洛克、康德)、20世纪的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施密特、凯尔森),以及批判理论(马克思、阿多诺、弗洛姆、萨特、哈贝马斯、阿伦特)的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和统治关系的特征。从马克思、弗洛姆和阿多诺出发,我将资本(而非资本家)的批判概念作为一种独立化的社会关系的统治,同时也追问了个体的、直接的统治在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这些问题在解释极权时和法西斯主义大逃亡时,具有什么样的潜力。

我激烈地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立足点。在我看来,他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根本特

点,对马克思作了灾难性的错误解读,并建构了一种完全向资本主义投降的理论。我在2012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向哈贝马斯陈述了我的批判,哈贝马斯直接拒绝了在内容上给予回答。哈贝马斯及其学派(我将霍奈特也算作其中)试图推动批判理论成为社会民主的、认同资本主义的工程,并且相信这样的幻象:能够给予资本主义一副“人”的面孔。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样,都是哈贝马斯和他的学派根本不关心的。这一流派对我们当下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给出任何解答。

李:埃尔贝博士,非常感谢您耐心细致的回答。

(本文翻译:李乾坤)



引用格式:张福平. 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动态与展望[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8(1):51-59.

中图分类号:G237.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51-09

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动态与展望

Trends and prospect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era

张福平

ZHANG Fu-ping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互联网这一全新高维媒介的出现与发展,在深层意义上改变着编辑出版格局:(1)进入数字时代的媒体对社交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社交性上升到突出位置,点击率成为选稿考量的指标,“生产明星”“消费明星”成为媒体运营的热门方式,可分享性成为内容制作的要素构成,社群运营、让用户生成链接成为媒体建设的重要一环;(2)出版流程趋于复合化,实时情景式发表冲击传统出版流程,编校范式将发生集成化、智能化变革,一次生产、多元发布,与其他服务通道相关联;(3)媒体资源的开放获取进一步扩展,精品内容付费获取同时火爆,用户数据资源的获取成为媒体发展的新矿产;(4)媒介的传统边界趋于消解,自助出版,产消合一,媒体资源共建共享、跨时空协作将成为趋势,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改变媒体发展模式。编辑出版从业者只有审时度势、相机调适,才能以其强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活力把握社会话语权、引领互联网生态发展。

关键词:

编辑出版;
消费明星;
用户生成链接;
实时情景式发表;
智慧认知网络;
群体价值;
语言智能助理

收稿日期:2016-12-28

作者简介:张福平(1967—),女,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

1960年代,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曾指出,信息和信息的传播是使社会得以连接在一起的“黏合剂”。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信息传播样态,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资本分配方式和社会动员能力。因此,一个社会具有主流影响力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手段的任何重大改变,都会左右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构造逻辑和运作法则,使社会在要素连接、资源重组和运作方式方面呈现出新态势、新格局和新构造。互联网这一全新高维媒介的出现与发展,以其独特的社会组织与结构方式,一改传统上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改变了人们传递信息、鉴赏文化的渠道和方式^[1],也在深层意义上改变着编辑出版格局。进入数字时代的媒体对社交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用稿遴选观、发表出版观、传播发行观、媒体发展观等都将发生改变,编辑出版在自我调适过程中也以其强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活力改变着互联网生态。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现有技术发展与相关研究,对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动态予以综述,并对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予以展望,以期为业界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观察视角。

一、社交性上升到突出位置

数字时代,人们的交往处于即时在线状态,个体被嵌入人际传播的网络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边界变得模糊^[2],传媒被镶嵌在日常生活之中,社交元素、社交产品成为传媒发展的要素指标^[3]。社交性业已成为数字传播新取向,媒体拥抱社交传播已成为趋势与浪潮(见图1)。

目前社交媒体已经超越搜索引擎,成为互联网第一大流量来源,基于社交媒体建构的以人为节点的关系网络越来越明显,无社交不传播甚至成了规律,泛社交成为趋势。^[4]媒体要掌

握社会沟通的话语权,就要在强化产品专门性、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更关注社交平台对于媒体内容的宣传与价值放大器作用,关注与用户阅前、阅中、阅后的多媒互动和用户体验,把社交性置于突出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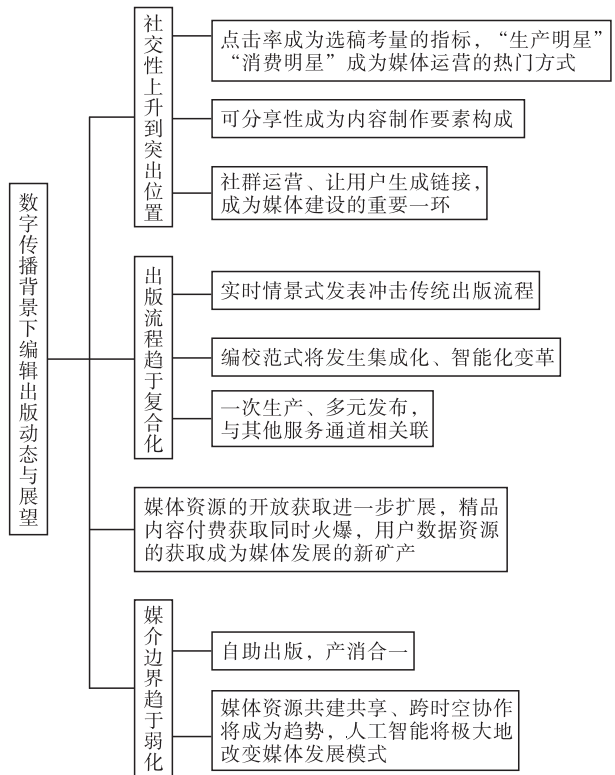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传播背景下编辑出版动态与展望示意图

1. 点击率成为选稿考量的指标,“生产明星”“消费明星”成为媒体运营的热门方式

随着文化要素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平台相互渗透,越来越多的文化内容开始以互联网的方式去制作和运作,颠覆了原有文化内容的创造模式,激活了多元化文化需求,产生大量文化内容服务市场。^[5]比如料理心得、记录孩子成长过程之类的内容,以前看似很个人化的点滴素材,在互联网上以其特有的价值、趣味和感动而带来很多点击率,这类生活、时尚和娱乐等强社交性内容颇受媒体编辑欢迎,传统品质内容被挤压。此外,鉴于名人风光无限而产生商业价值,“生产明星”“消费明星”(比如大V专栏、达人号),做爆款产品与标杆项

目,成为许多媒体机构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一种热门运营方式。

2. 可分享性成为内容制作的要素构成

众媒时代,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联产生意义,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的传播和连接方式,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的线性传播顺序^[2],传统信息传播架构正为贴近生活、注重互动的社交媒体所消解和重构,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架构依赖于强社交链^[6],传播入口移动社交化,社交分享在媒体消费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交属性突出、带入性强的网络直播、电子竞技、在线演艺等新兴内容,对新一代用户吸引力极大,成为新兴流量入口。^[7]网络直播的临场感、进入感带来社交参与,就连“起哄”都能构成二次“发酵”,带来更多的关注,生成第二层内容(围观热点)——对热点的态度又构成新的内容……“反常”也成就价值,即社交和传播意义^[8]。未来,现实与虚拟两种环境、不同虚拟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新的服务拓展维度。^[9]因此,为吸引用户关注与参与,定义潮流、紧追潮流、领先潮流,增强内容本体之外的增值信息与功能,媒体编辑开始扮演产品管理经营者的角色,较以前更关注可分享性,以多媒体思维进行内容创制,青睐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个性化表达,更愿意选择那些活泼的文字和图片、视频/直播等便于可视化呈现的内容进行传播。

3. 社群运营、让用户生成链接,成为媒体建设的重要一环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有效、有趣、有用的信息。用户对品牌的感知已经不仅仅限于功能、形象感知,而是转向对品牌的故事、温度的感知,需求族化,互联网内容产业逐渐向粉丝经济过渡。^[7]以媒介为基础的生活社区和知识社区将是未来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将受众联结为一个特定社群,经营粉丝进而运营知识社区和周边产品,将是数字传

播中的经常性工作。^[3]因此,编辑出版者更加注重人际关系渠道建设,比如通过界面设计邀请读者进行互动,主动介入自媒体,关注社群运营与亚文化建设。从起初通过人与人、人与服务、人与商业链接的“电商+社群”模式,发展到跟用户充分沟通、交流与协作,比如通过制造话题—形成热点—扮演受众进行转发、拍砖、点赞等,引导受众积极参与制作和扩散^[10],或者将产品或项目案例化、故事化,在多向交互的社群传播中将品牌营销转向感性的情感唤起和价值认同,使用户生成内容与链接,用户自主生态传播^[11]。社交团队日益壮大为媒体建设的核心力量,编辑出版工作的对象范畴进一步扩大。

二、出版流程趋于复合化

1. 实时情景式发表冲击传统出版流程

数字传播时代,读者乐于在一个个场景中阅读,实时情景式发表将冲击传统出版流程,出版流程趋于复合化,呈现为一种开放、可交互、沉浸式的多维资讯交流环境。本着“精准、个性、思维、创造”的宗旨,为让用户获得适宜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和美好的发展体验,出版不再是静态的仓储,而是社会性的开放流动、自组织、分布式连接和层进进化的智慧认知网络与个性化发展空间。^[12](1)文章不必等系统化后再发表,碎片化短文、小发现、新思路可随时发布,研究性、解释性和大数据文本都将受到重视,内容生产的机器化、智能化与分布式的程度将大大提高。(2)文章可基于云技术不断修正、实时更新,互动评价与延伸探讨同步展示,读者与读者、读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之间可实时交流,互动反馈的传感化与智能化水平更高,阅读的交互性、社交性将更强。(3)可以智能标注,随时添加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实现知识的无缝多维集成。(4)用户既是内容消费者又是内容生产者,可以通过数据加工分析系

统构建用户知识地图,洞察其在每一个知识点上的知识、能力和素养,从而为其提供个性优势挖掘导航、精准推荐所需资源与阅读社区。(5)发表的内容既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过程演示(比如手术过程);可多场景切换,也可运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读者带来立体沉浸式阅读体验*,语音交互、手势交互适应更多场景,甚至带来自己不见纸本也可以有亲自翻阅的体验,内容传播的泛在化、智能化与阅读体验的临场感增强。(6)实验过程网络视频直播,以其快速、分享、集中的社交本质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用户与初创者可实时提问、互动、吐槽,创设不断变化的实验路径,呈现不同实验结果,失败的实验未必是真的失败,即使是失败的实验也有发表价值,能为他人提供借鉴。(7)借助3D打印技术可即时打印科研小试成果,内容首先以网络版的形式输出,链接跨语言大数据集成平台(通过扫码体验多媒体视频、音乐、互动交流、即时评价、远程链接、众筹智慧),然后按需印制纸本——鉴于数字资源是一种能够帮助读者进行内容搜索或帮助提升阅读体验的UI、一个用户友好的注释工具,纸质书刊与数字资源融为一体的书刊形态将更为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可创设更加具象的表现形式,能极大地丰富人们在观察性、操作性、社会性问题与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阅读体验,前景可期:能超越时空和人们的生理感官限制,创设当下不存在的场景,扩展人类的感知范围,将抽象的概念和过程转化成人们所能感知的体验,帮助人们思考和想象,提高理性认识;延展呈现内容,提供生动的交互体验,让用户在虚拟环境中去观察、探索,加深其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兴趣,引发新的联想,进而研究设

计自己的虚拟项目(也可由多个用户共同通过虚拟化身互动参与),融认识、探究、创造、合作于一体,在阅读中创造,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信息加工、意义建构的主体,探索出新的可能作为元内容的延续与补充,形成个体智慧聚变的节点,而不仅仅是获取和存储^[14-15]。

2. 编校范式将随之发生集成化、智能化变革

首届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高峰论坛分论坛提出:借力互联网,重构网络理政新范式,从网络问政转向网络理政——前者的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客体是网民,主动权在官方手里;而“理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在此转换过程中,人民从被动应答转到主动参与。这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体现的是开放、安全、服务、回应和协商的理念。当互联网对传统的科层制结构造成种种冲击之时,参考了科层制构建模式的传媒制度也将发生一系列变革。^[16]同治理范式转变相似,编辑出版也将出现基于多平台构架的网络众筹式的编校革命。由于信息的采集、储存、加工以及产品形态、商业模式、组织架构等方面都互联网化^[3],出版者未必要拥有自己的专属成员才能进行编辑校对工作,他可以在多个行业社群发布预出版的文稿,通过奖励动员不同专长社群成员参与批注修订,再经由机器整合呈现方式编发,正式出版的文本在变动部分有特别的标记,如果读者愿意,可点击查看原文表述和作者的辩驳。这既避免了少数编校人员因受知识素养限制对文稿驾驭的不确定性,也避免了武断处理导致的对文稿原意的曲解,同时也解决了同行评议问题,还进行了预传播。尤其是,受众自产内容与用户分享内容的集成链接,可使非创新内容即刻暴露原形,出版生态自然得到净化。

* 全球首个运用 Vivepaper 创新技术打造增强式 VR 阅读体验的 VR 杂志《悦游 Condé Nast Traveler》已经面世,扫码即可看 VR 视频^[13]。

随着机器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将海量数据投入到算法中,系统自主学习,成为“认知智能体”,自动执行编辑加工任务,这将进一步解放编辑出版生产力,真正实现编校智能化、自动化。

3. 一次生产,多元发布,与其他服务通道相关联

互联网引发了网民阅读从PC端向移动端转移,屏读越来越成为全民阅读的主要方式;“万物互联”^[17],机器和各种智能物体都可能媒体化,阅读的多场景、多任务、碎片化、个性化、交互性和社会化趋势加剧^[18],人与内容的连接更加紧密、多元。数字时代的编辑出版要更注重内容资源的整合和增值化,注意挖掘内容营销的潜力和空间,寻找内容信息与现实世界的契合点,策划吸引用户的引爆点,通过多元的内容资讯、丰富的信息表现形式和专业化的信息解读吸引用户,生产出更多适应不同受众的文化产品,使产品个性化和用户分众化。

(1) 优化移动终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4.0%,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国人获取信息与阅读的重要方式。^[19]移动设备业已成为数字时代上网的默认配置,人们对手机越来越依赖,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手机出版将持续发展,优化移动终端已成为产品到达用户的关键步骤^[20]。

(2) 提供跨设备多元内容。用户不再仅仅拥有传统媒介,还将拥有手环、智能手表之类的可穿戴(有声、可视)阅读器和智能汽车等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为用户提供多屏、全屏、跨屏/跨设备的多元内容体验与服务,将成为媒体赢得用户的重要手段。不断进步的传播技术正在使得内容需求的微分化和个人化成为

现实,而如何满足用户全媒介、全屏幕、全时空的个性化动态内容需求,会成为数字内容生产和分发的关键。^[21]

一些出版商已经实现了内容的分解和在不同格式及设备存放烹饪、手工、金融、养生等书籍的纸质版、数字版文件内容。^[22]有的则针对不同人群,以读者为核心创作出版,推出不同的版本,比如适应轻阅读的精华版,适应检索、研究、教育的碎片版*,让看书、听书等有机融合的多媒体版,结合VR技术和AR技术的立体版,基于网站、APP等的门户版,以及能点击链接直接购买相关产品的百科工具版等。^[24]

碎片化传播将越来越普遍,鸿篇巨制将可能被切割成诸多可读性强甚至游戏化、娱乐化的小块进行个性化多维传播,把信息关键点、核心内容抽出来,简洁明快地呈现给读者,并与其他服务通道相关联(比如以连载形式推送、加相关链接^[25]),为用户提供“打包”服务,满足用户多样化、便利性、及时性需求,实现产品标准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统一,一次生产、多元发布将成为内容运营的常态。

三、媒体资源的开放获取进一步扩展,精品内容付费获取同时火爆,用户数据资源的获取成为媒体发展的新矿产

数字时代,出版的核心是聚合,就是将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聚合到一起,推送给用户,给用户以最佳的体验。^[26]随着信息传播互联网化的推进,对媒体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或是媒体社区而非出版物,向海量用户推荐内容、吸引用户关注、提高用户黏性更重要。所以媒体不再单单是做内容,而是向社群与服务延伸,通过培育、

* 比如,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联合出品的《中国关键词》,以中文词条的形式专题编写、解读、多语种编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3],反响很好。

挖掘、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获取用户、运营用户,从过去的营销产品转变为营销知识信息服务:基于数据分析,掌握用户的兴奋点在哪里、热点趋势是什么,发掘营销点,为其提供增值、趣味、有价值的内容或者服务,使其愿意持续关注,这无疑会对增加流量、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吸引更多的目标用户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27]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流量即内容,许多机器写作就是基于用户数据的内容生成;另一方面,基于智能服务平台的用户数据积累和计算挖掘更具价值,有了这些样本资源,有助于分析洞察用户,创造用户感兴趣的产品,连接不同行业资源,实现宽领域服务,进而将个体价值转换成群体价值,拓展媒体生产思路与空间。因而媒体资源的开放获取、用户免费-电商广告商付费的信息传播模式,或者像亚马逊 Prime 那样将各种类型的服务(音乐、电影、视频、外卖等)置于同一个会员计划中,将人们愿意为之付费的服务和不愿付费的服务捆绑销售^[20]等模式,将进一步扩展。

与此同时,用户需求个性化凸显,用户族群不断裂变,促使移动互联网行业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于是,信息生产的实时调节、个性化精准定位与长远规划成为必然,市场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针对特定用户标签的内容付费产品^[28]:根据每个用户特定的场景、特定的行为习惯,为他们量身订制一些信息,供需精确匹配。这种针对用户特殊阅读需求进行的定制出版与定制关联服务将成为趋势。^[29]

四、媒介的传统边界趋于消解

1. 自助出版,产消合一

移动互联网使我们进入一个“泛媒体时代”,向公众传播信息不再是专业媒体的专利,

任何人和机构都可以自建媒体,生产信息并向外发布^[18],个人化的信息只要得到认可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裂变式传播,正是这种信息节点间自由传播、平等对话的链接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认识自我、了解世界、参与社会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参与的价值回报激发分享的欲望,大众的个性化出版将不断呈现,并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渐次显现出其影响力与动员力^[30],传统的以大众媒体为传播中心的不平等的、单向的媒介生态结构被打破^[1]。由此,诸如“淘宝模式”“众包模式”“社交出版模式”等不同数字自助出版样态日渐兴起^[31]，“个人+平台”将是未来社会化出版的重要方式^[32]。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与社会功能业已被弱化,传统媒体所主导的信息偏好逐渐被解构,尽管传统媒体品牌价值依然是其核心资源,但媒体品牌价值凝结的忠诚度降低,包括期刊在内的传统媒介传播由政府专有许可的垄断性地位被动摇^[3],出版门槛变低,作者直接找独立出版人,依托电子书平台规模化生长*。

数字出版时代,以网络技术为主的数字出版网络平台,实现了用户与出版生产者等之间的无缝对接,用户不再是被动的受众和单纯的消费者,而是可以通过参与内容资源开发成为信息与知识的“生产-消费者”^[3](比如通过互联网集合大众评价,评分高的排前边,这就形成了用户说话体系),让用户参与创作^[34]成为媒体的共识。相应地,内容生产的组织方式从“他组织”转向“自组织”,共同创作,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边界消失,产消合一。^[35]美国数字出版行业最成功的尝试和发展模式是对内容的众包^[22],如《赫芬顿邮报》、“她生活”、维基百科等,它们的成功秘诀就是把用户变成内容

* 例如作者可直接通过亚马逊的 Kindle Direct Publishing, 当当“自出版”平台, 或中国出版集团的“诗词中国”这类即时交付的创作、传播移动平台出版内容并发行推广^[33]。

创造的深度参与者。^[36]

2. 媒体资源共建共享、跨时空协作将成为趋势,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改变媒体发展模式

互联网的实质在于让用户创造价值。伴随社会传播技术门槛的降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专职的网络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应运而生,个人成为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大众的知识通过互联网聚合,从而实现信息的生产、分享和价值创造^[1],个人构建的自媒体和个人IP也会由于成为传统媒体的社会协作对象而受到资本的关注。同时,志趣相近或目标一致的媒体间合作日益加深,资源共享、相互依存、协同攻关、合力推进,从而推动编辑出版快速、优质、均衡、集约发展,集团化、集约化、集群化既是必然趋势,也是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专业服务水平的必然路径^[37]。其中,既有出版、发行、信息服务等机构的整合,也有出版、音频、动漫、网络游戏、电影等不同业务模式的不断交融、叠加^{*}^[26],书刊构思创制之初就考虑书刊元素与影视、游戏、动漫等多媒体元素的融合,以适应网络时代的阅读特征,吸引大众阅读,并为后续开发相关文化创意产品、生成大量相关产品集群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与外界相关行业合作、寻求获取利益增值的伙伴,跨界融合,创新产品与服务,开展全媒体出版、全版权运营,形成垂直行业的全产业链运作。出版产业的大内容产业、大文化产业集群将不断涌现,出版产业跨地区融合与国际化合作也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31]

此外,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用户分析能力

将成为出版者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媒体融合项目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将会越来越多。社会资本的进入,有助于出版传播业更好地利用专业技术工具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从用户的关注点、兴趣点出发,提高用户分析与匹配的场景化、智能化与精准化水平,以便提供符合用户需求的价值内容,进行兴趣推荐与个性化分发,围绕品牌进行产品延伸和业务拓展。如此,技术外包、增值服务和跨界融合等将成为数字化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基于各种技术和数据驱动的内容创新、出版传播将不断增多,以对海量数据进行采集、挖掘、统计和分析为特点的机器人内容生产,将智能算法、语义技术、文本分析法、矢量空间文档模型等计算思维应用在编辑出版中的计算出版等将日趋成熟。比如,借助传感系统开辟信息采集新维度,借助人工智能实现自然语言的智能化搜索与互动,语音智能助理之类的协同机器人通过场景导入、与用户聊天,激发用户的好奇心,促使其兴趣盎然地使用媒体资源,并辅助用户不断优化学习认知路径。

五、结语

互联网以其强大的社会性、开放性、协作性构造了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领域的一系列新常态,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数字时代社会传播的新格局新态势,并在治理逻辑、运作模式方面实现范式创新,才能勇立潮头、推动发展。基于上述编辑出版动态分析与趋势展望,可以断言,编辑出版的社会评价观、

* 比如喜马拉雅FM与中信出版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果麦文化、企鹅兰登等出版机构在有声改编、IP孵化、版权保护等方面达成深度合作,助力打造由出版社电台和作家电台组成的出版社电台集群;通过粉丝效应迅速树立出版社品牌,可通过网友打赏等方式变现,还可利用声音辨识度打造文学作品中的专属角色,若再将此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或动漫,观众都能快速识别^[38]。

** 比如《恐龙世界大冒险》《宇宙星空大冒险》等故事、文字、绘画、知识都不错的书,被易视互动转化成VR、PC端的互动游戏^[39]。

编辑角色观与编辑素养观必将随之发生改变。编辑出版从业者只有审时度势、相机调适,才能切实把握社会话语权,以更大的社会能量引领互联网生态发展,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参考文献:

- [1] 喻国明.“互联网+”是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EB/OL]. (2015-08-15) [2016-12-2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822/21/26799112_494130144.shtml.
- [2] 陈力丹,宋晓雯,邵楠.传播学面临的危机与出路[J].新闻记者,2016(8):4.
- [3] 李频.中国期刊数字传播转型的认知起点和可能的实践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2016(5):20.
- [4] 谭天,张子俊.社会化传播——社交媒体发展带来的传播变革[EB/OL]. (2016-12-18) [2016-12-25]. <http://mp.weixin.qq.com/s/QMD3LjNLOXGI54X7CQ-h6w>.
- [5] 腾讯研究院.新目标、新使命、新格局——腾讯“互联网+”文化产业智库研究报告(二)[EB/OL]. (2016-05-16) [2016-12-2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511/18/31721317_558290725.shtml.
- [6] 企鹅智酷.2016微信用户数据报告完整版:媒体人来了解你的读者[EB/OL]. (2016-03-24) [2016-12-25]. <http://oicwx.com/detail/849595>.
- [7] 腾讯研究院.正版与IP,直播与VR:2016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全景解读[EB/OL]. (2016-08-01) [2016-12-25]. <http://www.niaoge-biji.com/article-11743-1.html>.
- [8] 张泉灵.只有改变才能看见未来[EB/OL]. (2016-07-17) [2016-12-25]. <http://mt.sohu.com/2016-0717/n459655113.shtml>.
- [9] 企鹅智酷.智媒来临:2016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EB/OL]. (2016-11-21) [2016-12-2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21/14/22081874_620008005.shtml.
- [10] 余婷,陈实.从“互动”到“卷入”——新闻入口移动社交化背景下美国媒体社交团队发展趋势探析[J].新闻记者,2016(4):59.
- [11] 姜钰.数字出版的三个角度——数据分析、数字营销和用户连接[J].出版参考,2015(6):36.
- [12] 余胜泉.“互联网+”时代的未来学校[EB/OL]. (2016-12-23) [2016-12-25]. ndedu.gov.cn/html/xwzx/jyxxh/2016/12/26/0dc05726-d127-49d4-b174-d40aac406057.html.
- [13] 新浪VR.全球首本VR杂志面世 扫码即可看VR视频[EB/OL]. (2016-10-28) [2016-12-25]. <http://vr.sina.com.cn/news/js/2016-10-27/doc-iffxfysn7846136.shtml>.
- [14] 张渝江.他山之石·虚拟现实的教育价值[EB/OL]. (2016-07-22) [2016-12-25]. <http://qoofan.com/read/enyakeW5nW.html>.
- [15] 高媛,刘德建,黄真真,等.虚拟现实技术促进学习的核心要素及其挑战[J].电化教育研究,2016(10):77.
- [16] 人民网.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EB/OL]. (2016-12-19) [2016-12-25]. <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2411.html>.
- [17] 正略TMT研究所.世界互联网大会透露哪些新趋势?看大佬们谈未来[EB/OL]. (2016-11-17) [2016-12-25]. <http://mt.sohu.com/20161117/n473482763.shtml>.
- [18] 张新华.移动互联环境下的融合新发展——2016年我国数字出版的四个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16(1):15.
- [19] 搜狐.李国庆:未来阅读的三大趋势[EB/OL]. (2016-12-15) [2016-12-25]. <http://mt.sohu.com/20161214/n475816770.shtml>.
- [20] 中国报业.2017年数字媒体十大趋势展望[EB/OL]. (2017-01-04) [2017-01-0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104/14/22081874_620008005.shtml.
- [21] 数字出版在线.“互联网”数字内容产业新范式

- [EB/OL]. (2016-05-16) [2017-01-0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729/14/7041826_579327271.shtml.
- [22] 约翰·罗兹维拉. 寻找数字出版的新方向[EB/OL]. (2016-05-01) [2017-01-05]. <http://m.duxuan.cn/doc/14702769.html>.
- [23] 中国青年网.《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图书24日在北京首发[EB/OL]. (2016-08-25) [2016-12-25]. http://wenhua.youth.cn/xwj/xw/201608/t20160825_8589177.htm.
- [24] 李国庆. 寻数字阅读时代, 供给侧的战略转型[EB/OL]. (2016-07-25) [2016-12-25]. <http://www.tushulian.com/chuban/5933.asp>.
- [25] 迈克尔·科兹洛夫斯基. 数字出版市场中的最新热潮——连载电子书[EB/OL]. (2016-10-28) [2016-12-25]. 陈大猷, 译. <http://www.cp.com.cn/Content/2016/10-26/1058495139.html>.
- [26] 尹琨. 年度国际出版趋势报告·中国分报告. [EB/OL]. (2016-08-11) [2016-12-25].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05978.html>.
- [27] 余祥草. 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应用于教辅出版之我见[J]. 出版参考, 2016(4):40.
- [28] 易观智库. 易观智库20大年度分榜单[EB/OL]. (2016-01-28) [2016-12-25]. <http://chuansong.me/n/2266859>.
- [29] 章红雨. 2014—2015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J]. 出版视野, 2015(4):10.
- [30] 中国理论网. 2015年国内社会科学理论学术研究报告观点要览[EB/OL]. (2015-12-30) [2016-12-25]. http://www.ccpsh.com.cn/ywrd/syxw/201512/t20151229_220019.htm.
- [31] 秦宗财. 2015年我国数字出版研究综述[J]. 现代出版, 2016(3):19.
- [32] 卢俊. 数字时代, 出版的下一轮可能[EB/OL]. (2016-09-27) [2016-12-25]. <http://mt.sohu.com/20160928/n469333716.shtml>.
- [33] 曲祯朋. 看看中版集团、凤凰集团的数字出版之路: 战略和实践[EB/OL]. (2016-09-20) [2016-12-25]. <https://sanwen8.cn/p/4d9duVT.html>.
- [34] 张福平. 碎片化阅读背景下全民阅读的推进——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对比分析及融合探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43.
- [35] 段永朝. 传受合一: 媒介融合的思想基石[J]. 新闻爱好者, 2015(7):12.
- [36] 吴亮芳. 数字出版众包模式的生成原因解析[J]. 出版参考, 2016(2):30.
- [37] 李建臣. 数字文明与出版业的五大融合[J]. 出版发行研究, 2016(9):1.
- [38] 数字出版动态. 付费听书热潮来袭, 这到底是不是出版社的“菜”? [EB/OL]. (2016-09-22) [2016-12-25]. <http://mt.sohu.com/20160921/n468863082.shtml>.
- [39] 岳雅楠. “VR+教育”市场正在孕育并期待释放[EB/OL]. (2016-10-09) [2016-12-25].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07132.html>.



引用格式:向飒. 新媒体时代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下的盈利模式分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60-64.

中图分类号:G23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60-05

新媒体时代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下的盈利模式分析

Analysis of the profit model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iodical digital management in the new media era

向飒^{1,2}

XIANG Sa

1.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2. 郑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期刊数字化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具有盈利点,各单元应具有全局观念,各操主业,明确分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合作,以谋求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和谐发展和产业链整体利润的提升。要实现期刊数字化产业链的盈利模式创新,期刊社可通过新媒体平台,构建期刊“三次售卖”盈利模式——卖新媒体载体、卖新媒体广告与卖新媒体延伸服务。通过内容开发与重构、新旧媒体融合、增值服务路径进行创新,从而形成能够多元化经营并能够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使传统媒介产生新的造血功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提升自身的传播力。

关键词:
新媒体;
期刊;
数字化转型;
盈利模式

收稿日期:2015-08-07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2016-ZD-021);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2015BXW004)

作者简介:向飒(1969—),女,湖南省长沙市人,郑州大学编审,硕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化、网络化出版与新媒体。

当前,我国期刊的数字化经营转型已经成为关系到出版业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期刊数字化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由单一媒体的经营模式转变成多种媒体经营模式。在“互联网+”的加速推动下,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可视化技术、虚拟技术等新技术对数字出版产业支撑作用的不断加强,科技与出版的融合不断深入,在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的基础上,科技将促进出版业深层次的内容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与业态创新,带动出版业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推进出版业转型升级,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当前,随着社会价值多元化发展和受众的不断分化,出版产业的新业态已基本形成,正在向在线期刊、开放存取、数据库、手机出版、微信公众号等形态发展并逐步完善,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龙源期刊、超星等为代表的数字期刊企业已经形成品牌效应。2015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达到4403.85亿元,其中移动出版收入为1055.9亿元,数字出版产业收入在整个新闻出版产业收入的占比由2014年的17.1%提升至20.5%。2015年,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74.4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6.66%,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1.69%。^[1]

目前学界关于期刊数字化经营的盈利模式研究,一般以宏观性、介绍性、描述性的研究居多,主要集中在营销渠道的表面,相关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忽视了对深层次上数字化产业链价值创造的内在机制重要性的探讨。而且,实践中多数期刊社也仅仅认为数字化经营发展和盈利即是期刊上网加入数据库的收入,对作为期刊数字化产业的核心部分——盈利模式和盈利机制创新——重视得不够,这使得国内数字出版业一方面在产业规模上呈现出“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在产业链协作整合中盈利模式的

组织构架不明晰,价值增值不明显,因而在“质”的提升方面相对弱化。我们认为,除传播技术之外,盈利模式的组织构架和盈利创新依然是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的核心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在全面分析期刊数字化经营的“上游—中游—下游”的盈利卖点的基础上,提出新媒体环境下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的三种盈利模式构架,以供业界参考。

一、期刊数字化经营模式产业链的结构分析

出版产业链是出版相关方基于出版价值链增值所组成的联盟。我国期刊数字化产业链条以创作者、内容提供商、技术设备服务商、平台运营商、销售商、终端用户等环节构成基本结构^[2]。其一,对整个产业链上游(创作者、内容提供商)而言,盈利可源于作者,比如收取版面费、稿件处理费、服务性经营活动等;或源于读者和企业等,比如发行销售等。其二,对产业链中游(技术设备服务商、平台运营商)而言,盈利主要是对获得的源数据进行加工和整合的二次文献开发和利用,以及广告服务销售等。其三,对于产业链下游(销售商和终端用户)而言,盈利主要是在新媒体终端上的发行,也包括服务性经营活动与相关延伸服务性经营活动,如专题培训、研讨会、推荐会、产品评价会等^[3]。可见,期刊产业链涉及的单元多,结构复杂,其“上游—中游—下游”都有盈利点。然而,在产业链上游,传统出版单位对数字化技术不了解,对数字化经营转型目标不明确;在产业链的中游,大型数字出版商具有很大的雷同性,差异性特征不明显;在产业链的下游,数字化期刊的营销模式过于单一,没有形成多元化、专业化的营销市场。期刊数字化产业链存在各环节收益分配失衡,进而影响协作关系的形成,阻碍产业整体发展。期刊和数字平台运营商的合作收入与

邮发的收入都很低,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陈旧、发行渠道单一,覆盖面小、影响力弱,成为阻碍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瓶颈。因此,一个和谐的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各单元应具备全局观念,各操主业,分工明确,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合作,从而谋求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和谐发展和整个产业链整体利润的提升。

二、期刊数字化转型下“三次售卖”模式的组织构架

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要在经营与组织架构上融入新媒体的理念,加快组织架构变革,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数字化的经营模式,这是实现期刊产业链各个单元结构价值链环节增值并盈利,进而提升期刊竞争力的基础与关键。传统的“三次售卖”盈利模式为卖内容、卖广告、卖品牌。第一层次是“卖内容”,是对期刊内容本身的销售,即期刊的订阅销售。第二层次是“卖广告”,是以期刊读者群为受众的广告刊登,即广告销售。目前,国内期刊广告经营的模式主要有基于产品本身的经营和基于广告的经营。第三层次是“卖品牌”,即利用品牌优势资源,发展多层次的衍生产品,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市场化,如发行特刊或增刊、图书和光盘,建立数据库、网站、会展、品牌授权等。

我们所提出的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的“三次售卖”盈利模式组织构架,是基于传统“三次售卖”盈利模式的提升和发展,是优化组合了传统纸媒和网媒的优良基因,充分吸收传统媒体的核心功能和线下优势与移动网媒的社交功能和线上优势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一层次是“卖新媒体载体”,即卖多元化业态内容和新媒体载体,用户通过电脑、阅读器、手机,以及在公共场所的机场、车站、高校、银行、医院、办事大厅等场所触摸大屏阅读。第二层次是“卖新媒体广告”,广告可以做成音频、视频、360°旋转,

通过分享链接、互动产生价值,广告与期刊内容粘在一起,用户看期刊内容就会看广告,互不分离。第三层次是“卖新媒体延伸服务”,即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信息流汇聚、公信力强、形态多样化等核心优势,利用网络杂志、社区、论坛、微博、微信、二维码、网络视频等新兴媒体形式,把服务卖给用户。期刊社等出版机构的“三次售卖”盈利模式,就其本质而言,是期刊社在经营过程中产业链各个基本结构单元盈利的构建、整合与延伸过程。

三、新媒体时代期刊数字化转型下的盈利模式

进入新媒体时代,期刊业必须由过去的重视内容生产转变为重视市场营销,理清思路,探索如何利用新媒体制定明确的内容生产和产品营销战略,完善期刊出版市场盈利机制,以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新技术催生新媒体,新媒体推动出版业生产和营销方式的革新。微博、博客、视频、电子邮件、手机应用软件等,已经被国内外出版业广泛运用,并成为期刊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外期刊数字化经营的盈利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探索期刊的网络增值模式、加强内容的深度开发与制作上的机制创新、推动新旧媒体融合发展。如国外著名出版机构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荷兰爱思唯尔出版社通过 Springer Link 和 Science Direct 等在线平台实现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英格拉姆内容集团通过内容资源创新实现经营发展;美国的 Luniverse.com 和 Xlibris.com 两大网站,其服务收费占到了其总收入的大部分。

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的最终目标就是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可视化技术、智能技术创造提升传统媒体,使其成为现代化的、综合性的新型媒体,因此期刊社必须通过开发多种新媒体经营途径,重视产品业态的多样化与衍生产

品的深度开发,以及加长和加粗产业价值链上的增值服务,以实现其盈利模式创新。

1. 重构创新内容盈利模式

在期刊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挖掘、开发、重构、增值内容的价值,已成为数字化出版产业盈利的关键。在内容生产上,应重视原创,以满足受众对高品质、多层次、个性化信息产品的需求为目标,提倡深度加工,从选题策划到组稿编辑都必须坚持高标准,通过信息整合重构创新生产模式,在内容生产和编辑出版上实现创新。可通过信息的结构化加工和数据库存储来突破单一作品和媒体的传播局限,把内容分解之后再聚类传播,以实现个性化的按需服务,构造信息社会出版新业态。期刊社应学会利用自身的内容资源优势开发和出售数据库,实现内容的多层次深度开发,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互动性和聚合性优势,利用跨媒体出版、数字复合出版,把期刊内容转化成图书、讲座、视频、音像制品,赢得产品利润。^[3]这种以自身内容为基础,采用声、光、电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多媒体形态复合、多种制作技术手段复合与多种媒体发布,实现作品“一次创作、多样展现”的创新内容盈利模式,可以使刊物信息的效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4]

例如,英格拉姆内容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和信誉度最高的纸本和数字内容的发行商,也是通过内容创新经营模式的典型。为了解决信息时代出版发行业发展瓶颈问题,英格拉姆内容集团通过资源整合、机构重组,创立了专业细化、分工明确的六大分公司;通过汇集海量数字内容资源,建立内容信息数据库,形成内容出版的盈利创新模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英格拉姆内容集团电子图书已达13万多种,可通过Course Smart设备在线浏览8万种电子教科书,且经出版商授权的可按需印刷的数字资源达到60万种,每年有近25万种数字资源品种更新

等。^[5]国内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构建了综合性数字处理平台,通过资源整合及内容数据库的新媒体产业化经营,衍生出不同传播形态的新闻产品,在内容产品的再生产和增值经营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6]

2. 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盈利模式

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是:媒体→传播→用户;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是:用户↔传播↔用户。也就是说,传统媒体的传播链是单向的,内容只能由媒体发布,通过传播为受众所接受;而新媒体上的传播链是双向的,用户既是内容的接受者、分享者,也是内容的创作者、评论者。传统媒体必须加强与新媒体的深度合作,利用微信、微博、APP等新媒体形式促进期刊销量和浏览量的增长,以下4种是一些具体模式。

(1)与大型知名数字出版商合作模式。期刊可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龙源期刊、超星等集团公司合作,通过专业的制作团队进行资源整合和知识服务,以提高期刊内容使用效率,形成信息量巨大、制作加工专业的数据库,这样会使订阅量大幅增加,拓宽受众覆盖面。^[7]

(2)期刊信息服务平台模式。期刊可通过由技术平台、运营平台、资本平台搭建起来的信息服务平台在全媒体平台传播,通过“内容+平台”的方式,对期刊内容进行适合网络传播特点的再编辑加工,以拓宽传播空间和销售市场。例如,新华文摘学术网是新华文摘杂志纸质版的延伸;人民出版社读书会,是为全民阅读服务的,可以给读者、编者、作者三者提供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在线平台。另外,还有《家庭医生E刊》系列、ZCOM平台上的《瑞丽》系列(《瑞丽·家》《瑞丽·裳》《瑞丽·妆》三部曲)、《中国国家地理》、《电影世界》、《IT经理世界》、《销售与市场》等,都是以平面媒体为基

础,实现与新媒体的成功对接。^[7]

(3)手机杂志模式。目前电信运营商已经将手机杂志 APP 作为其移动阅读业务的重要构成,作为第三方智能手机上的一种应用程序,APP 上的每一种应用程序都拥有很多的使用者,杂志在 APP 上的传播比传统的互联网更有效^[8]。手机杂志 APP 正逐渐呈现出“图文+多媒体+互动”的富媒体形态,在内容传播和产品创新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4)自媒体发展模式。以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SNS 应用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已成为互联网产业链上重要的内容生产者,近年来,其在数量和规模上已经出现了几何式增长,市场和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凸显。根据腾讯发布的数据,目前微信公众号已突破 1000 万个,全国微信用户已达到 6 亿,很多期刊都已经有了微信公众号。^[9]

3. 增值服务盈利模式

期刊业要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必须保持对新技术、新载体的灵敏嗅觉,通过开展多种延伸服务经营,将自己原来的“内容提供商”角色转变为“服务提供商”角色,时刻以用户为中心创造价值,向用户提供专业化和多元化服务,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服务性商业模式,包括定制服务、信息服务、活动服务、平台服务、组织服务等。^[10]期刊产业链连接着娱乐、体育、时尚、商贸、服务等诸多行业,我们可以通过加粗、加长产业链方式,将收入模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如开展期刊订阅、开放存取、按次付费等项目,增加衍生产品、线下增值服务与按需出版等多种服务,以及广告投放、会员制度、培训活动、会议活动、讲座视频、商品推介和业务咨询等。学术期刊编辑部可以通过与审稿专家的良好合作关系,为相关企业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产品论证会等,请相关专家为企业的发展把脉,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供决策咨询服务。^[11]另外,

期刊出版者应积极在手机杂志中增加互动环节,向广大手机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如英格拉姆内容集团公司通过“按需印刷,定制服务”,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价值;美国《好管家》杂志社设有食品、日用百货、家电等多个试验室,试验对象通过对商品严格的测试并进行安全、质量、优缺点等方面的认真评价,将结果及时地告知读者和有关商家。^[5]

四、结语

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下的盈利模式创新问题,是基于当前媒介融合的数字化发展环境下构建新闻出版强国的战略目标下提出来的。从媒介的实践层面来看,建立媒介融合环境下长效的期刊数字化盈利模式,是解放期刊出版生产力的关键所在。通过积极探索期刊数字出版领域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变革,可提供优质专业的出版内容和服务,实现出版业的数字化战略转型,解放出版生产力。基于期刊数字化产业链的盈利模式创新,可通过新媒体产业平台,构建期刊“三次售卖”盈利模式的组织构架,从内容开发与重构、新旧媒体融合、增值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以形成多元化经营并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使传统媒介产生新的造血功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提升自身的传播力。

参考文献:

- [1] 魏玉山. 2015—2016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J]. 印刷杂志, 2016(7): 20.
- [2] 于春生. 数字期刊产业链价值创造与收益分配[J]. 中国出版, 2012(9): 33.
- [3] 向飒. 媒介融合中期刊经营模式转型的突破点和路径选择[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 179.
- [4] 张雨晗. 全媒体出版: 现状与未来[J]. 现代出版, 2011(3): 16.

(下转第 103 页)



引用格式:裴萱. 从大众文化到生活美学——1980年代审美感性与主体重建的逻辑框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1): 65-76.

中图分类号: J527; B83-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1-0065-12

从大众文化到生活美学

——1980年代审美感性与主体重建的逻辑框架

From the mass culture to life aesthetics

—The logic framework of aesthetic sensibility and main body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80s

裴萱

PEI Xuan

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1980年代的“美学热”和“文化热”不仅构成了以审美反思意识形态、以人性反思历史的理论脉络,更促成了以感性表达和生活性特质为内核的大众审美文化的产生。大众审美文化肯定了主体感性经验的合法性存在,形成了从审美经验到生活美学再到主体重建的逻辑框架。大众审美文化一方面彰显了主体对于自由和感性的希冀,另一方面对长期处于理性压抑状况下的人性也是一种反叛与调整,从而与知识分子的美学理论探索一同构成了新时期的文化启蒙。而现代文学也开始向生活化、通俗化和多元化的谱系转型,在解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的同时确立了主体的存在价值。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和文学艺术世俗化的进程也带来了生活美学的勃兴,并与知识分子的“美学热”构成了遥相呼应的同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感性启蒙的美学价值景观。

关键词:

大众文化;
美学热;
主体性;
生活美学;
感性启蒙

收稿日期: 2016-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ZW002);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CWX027);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6—qn—08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6M592277)

作者简介: 裴萱(1985—), 男, 河南省郑州市人, 河南大学副教授, 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

1980年代的“美学热”^[1]和“文化热”不仅构成了“以审美反思意识形态、以人性反思历史”^[2]的文化脉络,更是促成了以感性表达和生活性特质为内核的现代主义文艺作品的出现,肯定了主体的感性经验的合法性存在价值,形成了从审美经验到生活美学的逻辑框架。现代中国美学的奠基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曾发表一系列论文,肯定了感性思维为人的自然本性^[3],并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冲破了政治藩篱。感性的思考方式不仅仅具有人道主义和美的普遍性价值,更是成为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中的关键性元素。感性问题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充分肯定感性在审美中的关键作用。关于感性思维的探讨已经成为1980年代“美学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试图回归美学感性的价值取向。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就曾经认为美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4],康德也认为作为鉴赏判断的美是无功利的感性愉悦^[5],黑格尔将美界定为理念的感性显现^[6]。可见,美学问题一开始就与感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成为对抗世俗生存和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因素。1980年代初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掘,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从主体实践的角度对感性的再发掘。对于主体的审美感知而言,感性不仅仅构成了体验美和生发美的关键途径,更成为反观主体性存在的对象化路径。我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吸取了康德先验的“知、情、意”三分法,将凝聚在主体实践活动之中的文化和符号体系通过积淀的方式再现了不同的心理状况,而理性的积淀正是感性的彰显,并且表现为自由和快乐的感觉,审美的体验由此产生。李泽厚在其后期理论中又通过感性提出了“情感本体”^[7],以对抗无所不在的工具束缚和理性规约,这也进一步完善了实践性主体论的内涵。高尔泰通过“美是自由的象征”^[8]的论述,更是大大扩展

了感性的力量,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爱、温暖、信仰、感情等都纳入感性的范围,并认为其最终促使了人的自由的实现。同样,我国著名美学家刘纲纪也认为,“美是自由的感性表现”^[9],感性和理性共同构筑了主体的发展与实践能力的提升,而人的感性活动也经历了“由善到美”的过程。由此,感性成为了美学理论中探讨的关键话语,从人道主义和人性作为“美学热”的生成契机,到主体性实践美学作为“美学热”的主导内涵,都一方面肯定了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存在价值,一方面也印证了感性话语对审美和自由的关键作用。理论上的促进引发了文学活动和审美实践的变革,一时间,从诗歌到小说,从绘画到音乐,都体现出主体化、感性化,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意识流、意象、变形等审美特质,从而成为1980年代初期我国文艺领域的一道亮色。

就社会文化思潮而言,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潮流,高度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重心和千篇一律的社会审美面貌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生活的逐步敞开、个性追求的向往与感性世界的全面展开。这些不仅仅给予普通民众以感性舒展的空间,更带来了多元化、自由化的文化风格。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甜蜜蜜》,从《红灯记》到《少林寺》,简直有恍如隔世之感,题材、思想、内容、风格、形式、人物塑造、价值理念等都与之前完全不同,封建保守的传统观念突然间被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所冲击,人们也在从刚开始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转为“满面桃花迎客来”。新感性带给人们的个性舒展、情感交流和美好生活,使人们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生活憧憬的热望。迪斯科、披肩发、太阳镜、行为艺术、朦胧诗、星星画展、颠覆、暴露、戏仿等,构成了新的文化与审美的表征。长期受到政治“禁欲主义”影响和高度规训的人们解放出来了,鲜活的生命冲动、自由的情感体

验、时尚的色彩追求和多元化的审美诉求,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而“美学热”的兴起又给予人们的感性诉求以理论上存在的合法化空间。社会思潮的影响给予现代派文学以扎实的土壤,感性成为生命释放的主要形式。就目前的大众审美文化研究而言,学界更多地将视角集中在具体的文化表征、西方文化工业理论与哲学层面的理论辩证研究等方面,相对忽略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异质性、生成性等因素,表现出对中国本土文化意识研究的淡漠。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众文化的产生源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浪潮,并且在“美学热”的推动下不断延展。文学领域世俗的转向、通俗文化的生成、感性话语的释放、主体欲望和个体自由的彰显,这些不仅构成了1980年代大众文化的基本特质,更影响和制约了当代审美文化的面貌;而由此引申的生活美学则成为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形态,在学科互涉、话语播撒的文化景观中释放理论活力。本文拟通过对1980年代大众文化与生活美学的谱系学考察,反思和审视当下审美文化的历史走向,以期有助于建构全新的文学和美学场域,发掘大众文化与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横向交融关系,进而把握中国大众文化的异质性特征,增强理论介入和阐释现实的力度。

一、大众文化:感性话语的释放与审美伦理的彰显

1. 感性话语促使大众文化的兴起

进入19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和通俗审美文化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并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大众审美文化以其通俗性、自由性、开放性、感官化的特质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其兴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学热”所倡导的人性、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实践话语给予

了感性和主体以合法性存在的理论基础,现代派文学、诗歌和艺术对身体和感性的发掘也进一步启发了文化的世俗性。当褪去“先锋”的光环之后,感性的身体话语便以“黄金脐带”的方式更加密切了与大众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1980年代言情、武侠小说、流行音乐和电视剧盛行的内在原因。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收录机、电视机等悄然进入千家万户,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也使得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逐步侵入人们的精神领域,市民阶层也在此种语境中逐步兴起。人们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感性自身和“主体小我”,摒弃宏大的集体价值取向和历史话语,进而实现对“自我”的追寻。与知识分子精英化的知识启蒙不同,普通大众选择的则是感性化与通俗化的审美文化,并以此来试图对抗“文革”时期的崇高理念和价值取向。正是在此背景中,大众文化产品也从海外和港台引入中国,并逐渐本土化。从邓丽君的情歌《甜蜜蜜》到《上海滩》《霍元甲》等电视剧,从琼瑶、三毛的言情小说到金庸、古龙的武侠世界,都纷纷以迅猛之势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摇滚乐和商业电影的勃兴则给予了大众文化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神奇虚幻的武侠世界,爱恨情仇的通俗故事,以及彰显自由的个体化英雄,都构成了对政治化、公式化和集体化审美样态的反叛,并且以更加通俗、更富人性的手法彰显了感性和自由的力量,也因此赢得了广大群众的青睐。可以说,大众审美文化、通俗文学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文学等一同构成了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的潮流。其实,大众文化当时依然处于政治/世俗、集体/个体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之中。大众文化作为娱乐性和消遣性的通俗商业文化,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文化工业的产生而出现的文化,其虽然具有彰显平民意识的个性解

放精神,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俯就市场的媚俗取向。而在1980年代前中期,大众文化以其感性和身体化同样具有对抗集体规约和宏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味,世俗性的价值取向也有利于拆解乌托邦神话之后的价值重建。所以,当大众文化以政治规约的对立面出现之时,其本身也就具有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美学意味。言情小说中俗套的爱情桥段和赋歪的叙事场景成为政治规训之后的人性彰显,武侠小说的天马行空和英雄救世也符合个体不断膨胀的话语权展示,甚至摇滚乐的标新立异和原始欲望也被看成是对“文革”的愤懑和政治规训的解构,这也恰恰是大众文化出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责任。

大众审美文化一方面彰显了主体对于自由和感性的希冀,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争议,而这些依然是由其感性的内涵和世俗性的审美价值取向所决定的。邓丽君的歌曲作为“极权主义解冻后的一株茉莉花”,以其清新感人的人性价值取向和真挚情感给长期以来沉闷、僵化的文艺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其歌曲以民间小调的形式再现了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世事沧桑,咏唱着爱情的美好和生活的自然;歌词中鲜明的生活化意象也比比皆是,朦胧的月光、静谧的小城、温暖的春风、甜蜜的笑容、鸿雁的归来、清澈的溪流等,与以往的“斗争哲学”歌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感性的人性和人情的向往取代了抽象、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教条。比如,歌曲《甜蜜蜜》就充满了对人情感性的描绘:“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前四句虽共计23个字,但有着大量的叠句,既如同恋人之间的喃喃细语,又仿佛婉转缠绵的时光,让人体验到纯真爱情的美好。同样,在其他脍炙人口的歌曲中,感性的审美体验和清丽的

意象也举不胜举,《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在水一方》等,都如同意象派诗歌和印象派绘画,清新自然,充满淡淡的哀伤,百转千回,欲罢不能。而金庸、琼瑶和三毛等港台作家的武侠小说和言情文学,更是将主体化感性的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因而在群众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小说的核心正在于彰显了主体的自由,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出神入化的武功使其获得了“成人童话”的效果,游侠、大侠、怪侠、情侠等都以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游走于天地之间,郭靖、杨过、黄蓉、袁承志、韦小宝、李莫愁等一些人物,形象鲜明、敢爱敢恨,一时成了武侠中的经典人物。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言情小说中的纯爱风格,为爱痴狂的少男少女们摒弃名利、自由洒脱地投入到“爱”的乌托邦世界中。尤其是三毛对奇特爱情、异域风情的真实呈现,增强了爱情在文学中的内涵和人文意蕴,其悲天悯人的情怀更是凸显了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摇滚乐天马行空的自由、迪斯科热烈奔放的舞蹈、商业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都诉诸感性话语的张扬,倡导普通大众层面的个性解放。所以,大众审美文化整体呈现感性的自由化特质,是与知识分子的“美学热”启蒙息息相关的。

2. 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

大众文化的感性原则不仅是对长期理性压抑状况下人性的反拨与调整,更是同知识分子的美学理论探索一同构成了新时期的文化启蒙。其实这仍然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美学热”启蒙中的话语裂隙。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初期以人道主义、人性和“美学热”等重新实现了自身的话语权和审美文化启蒙,实践主体性、文学主体性、人道主义、形象思维等一系列文学和美学上的重要概念、范畴,都导向了人自身的历史生存,也重新担负起了政治批判和文化启蒙的重任,并且实现了人性思潮在

边缘化领域的持续发展。虽然在“美学热”“手稿热”中肯定了感性和身体的因素,但是知识分子精英话语本身是以理性的形式出现的,所谓的感性因素也必须服从于理性的启蒙需要。这样,精英话语本身就出现了裂隙,它们要想以感性作为工具来批判政治意识形态,实现美学的启蒙,就必须高举起理性的旗帜,感性因素因此被压抑、排斥至理性启蒙的规约之下。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先锋画等依然是精英化的理性反思,虽然其中也具有感性和身体的元素,但并没有真正落实到社会大众中来。大众审美文化正是在此契机中应运而生的,其将理性理论中的感性原则以轻松愉悦的方式进行实践,弥补了过于严肃的精英理性启蒙。而1980年代的一系列大众文化现象以其通俗性、生活性、感官性和娱乐性的特质完成了感性在普通民众层面的话语释放,也使得“美学热”的精神理念更好地渗入社会生活之中。所谓产生于现代与后现代时期的大众文化,虽然其以批量复制和市场营销的方式满足了商品和艺术的双重需要,但是其生活性和感性的特质是核心,美国文化学者杰姆逊就曾明确指出媒介和大众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特质^{[10]3}。文化产品虽严格遵循其他商品的市场流通逻辑,有着严格的生产、传播、消费的脉络,却忽略了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异质性,“那么在现在的社会里,这种文化与工业、贸易、金钱不正是紧密相联的吗?所谓媒介、大众文化和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文化工业’,难道不是像生产汽车一样制造出来的吗?因此,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文本’”^{[10]3}。大众文化在文化工业中产生,它以普通大众为基本接受对象,并以大批量复制的影视、广播、印刷等传播媒介实现模式化和平面化的文化产品生产。传统艺术中独一无二的光晕效应和精英话语已经逐步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与生活融合建构的平民审美

价值取向,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11]。在现代技术条件和消费市场的影响下,流行歌曲、摇滚乐、肥皂剧和畅销书等,通过批量复制和商业运作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也逐步泾渭分明、相互分离,并且纳入资本和市场流通的框架之中。这样,大众文化就从精英启蒙话语的裂隙中应运而生,并在生活和市场的维度上进一步剥离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构建出崭新的个体化感性面貌。在“文革”的“左”倾政治统摄时期,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处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规约之中,它们只能服从于宏大叙事的需要。19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和“美学热”“手稿热”的浪潮,破除了思想层面的禁锢,知识分子重新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语境中;而伴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崛起,大众文化的流通和传播同样打破了政治的规约,以市场伦理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准则,并以感官性和通俗性使得普通民众沉浸其中,获得了另类的话语权。大众文化自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兴起以来,与精英文化一同构成了美学意识形态的反抗话语,并以锐不可挡之势不断消解精英文化,最终造成了“美学热”被边缘化的历史景观,审美也逐步走向了日常生活,“各种物质—技术的方式,压抑着人性的实现。而艺术,作为充满了各种想象力、可能性的‘幻象’世界,则表达着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表达着人性崭新的局面”^[12],但是其对于人的自由和感性的彰显是一以贯之的。据统计,1980—1998年,中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从原来的106家、38家增长为1244家、880家,分别增长10.7倍、22.2倍;电视人口覆盖率从49.5%增至87.5%,有线电视网已遍布中国绝大部分城市^[13]。可见,大众文化借助于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市场消费的不断增长,获得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空间。

1980年代,大众审美文化刚刚兴起,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质。一是接受大众审美文化的群体十分广泛。因为1980年代初期的大众文化产品数量上还并不是很多,几部通俗电影、几首流行歌曲往往能持续产生若干年的轰动效应,真正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电影《少林寺》《小花》等商业电影虽然被冠以通俗的标签,却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经典,甚至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二是大众文化文本往往呈现出类型化的特质。1980年代初期,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还不是特别明显,正方与反方、逆境与顺境、爱情与背叛等往往具有固定的情节发展模式。比如,在琼瑶的言情小说中,故事情节就呈现出同质化的特点,高大帅气并且富有的男主角和平凡纯洁的女主角之间经历相识、相爱、误会、背叛之后,再次重归于好,《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一帘幽梦》等作品都是以此脉络展开的。同时,众多的武打电影、武侠小说、警匪破案和家庭伦理剧等也都被打上了类型化的标签。但是,普通民众依然沉浸在浪漫凄婉的爱情故事中不可自拔,在人性和爱情的梦幻中完成了从政治符号向个体生活的转型,这也构筑了1980年代大众文化的独特景观。三是这时期大众文化的生活气息和感性色彩浓厚,并具有思想解放和主体性价值确立的意味。比如,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期,伴随着邓丽君的歌声,许多青年人开始在公园或者街头跳起迪斯科和交际舞。他们往往在茶余饭后,手提录音机、身穿喇叭裤,随时随地就可以跳上几段。这些也曾被思想保守的父辈们斥责为“垮掉的一代”和“伤风败俗”,但是大众愈加喜爱此种消弥了生活与艺术距离的生活艺术。街头的涂鸦绘画、肥皂剧、时装展览、流行音乐等,都肯定了主体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体验,从而使艺术走下了被顶礼膜拜的神坛,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谈资。人们在狂欢的同时得到了休闲

和愉悦的满足,从沉重的乌托邦幻象、历史使命和理性精神中解放出来,以丰富多彩生活世界的构建,实现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个体性的自由。当然,大众文化在1980年代初的兴起也引发了较多争议,主要的仍然是其“以颓废和消极的情绪宣扬了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此种批判是建立在“政治/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上的。但同时,更多学者依然对大众文化秉承肯定多元和积极支持的态度。大众文化出现在精英文化与政治规训对抗的语境之中,自身不断丰富和完善,并最终实现对个体主体的关照和多元化的审美价值选择。其实,大众文化本身也并非都是俯就市场的通俗之作,它依然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正与1980年代初期中国的文化语境相吻合,感性解放本身构成了启蒙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审美文化的狂欢也直接指向了国家政治意志的规训。美国文化学者斯图瓦特·霍尔曾经指出,对大众文化的“解码”立场决定了其功能和价值。比如,对电视节目传播的解码立场就具有霸权性立场、协商性立场和反抗性立场三种立场,而反抗性立场则伴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发展,进而成为民众反抗意识形态规训的阵地和空间,从而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1980年代初期的大众审美文化正体现了民众对反抗性立场的确认与坚守,实现的是主体的生活自由和生存价值。当然,该时期的大众文化的发展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它将在1990年代新启蒙的落潮和知识精英梦想的破灭中,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

二、文学转型:世俗化转向与主体自由彰显

1. 文学的世俗性呈现

大众文化兴起的同时,新时期的精英文学

也开始了世俗化审美追求,并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文学等共同构成了人道主义和人性话语的面貌。如果说,反思文学是知识分子以深沉的道德反思和人性力量完成文学的现实主义启蒙,现代派文学是以激进的立场完成从内容到形式的文学主体性改造,那么,世俗化文学文本的出现则是知识分子放下居高临下启蒙的姿态,以与日常大众平行的视角关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和瓶瓶罐罐,让边缘群体、下层居民、江湖民间、日常生活等都纷纷进入创作者的视野,其在对日常生活和世俗欲望的肯定中完成了生活美学和审美文化的建构。其实,文学中的世俗化趋向是与大众文化相呼应和契合的潮流,它们都指向了个体的平凡生活,从而消解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比如,刘绍棠的乡土题材叙事正是秉承了朴实、自然、亲切的审美风格,在对普通生活场景的描绘中完成对人性和人情的体察。其实他在1979年创作的《芳草满天涯》中还带有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话语,伤痕文学的色彩稍显浓厚,例如主人公碧桃对“右派”孩子的收养与教育就体现出人性的高尚和无私,作者借此来抚慰政治压迫带来的伤痛。而1980年代以来,刘绍棠进一步“降低”自己的身份,试图消解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其将视角转向了传统道德和民间人性,以充满乡土气息的叙事和传统的侠义形象塑造完成了世俗化文学的转型。如《瓜棚柳巷》中的柳梢青、柳叶眉父女,《渔火》中的春柳嫂,《豆棚瓜架雨如丝》中的老虎等,他们重情重义、侠肝义胆,既有民族大义,也有铁血柔情;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和地域乡土的淳朴语言,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些文学作品几乎完全放弃了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反思政治的精英话语,而是以大众化和世俗化的人性塑造呈现出自由自在的“民间放歌”。总之,这一时期个体的平凡生活构成了

文学创作的重要一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颇具号召力的审美风向标。在此基础上,文学世俗化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放大,另一方面则是对游戏人生和世俗欲望的肯定,它们共同呈现出了形形色色的大众生活景观。

2. 文学的日常生活表达

在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代新时期的文学表达中,宏大的政治革命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构成了文学内容的主体,而个体的情感表达和日常生活成为被遮蔽的领域。伴随新时期以来大众文学的发展,“日常生活”在1980年代逐渐成为大众所关注和肯定的焦点。乌托邦神话坍塌之后,人们以更加务实的精神试图修补早已被政治冲撞得千疮百孔的日常生活,从而回归“万家灯火”的亲情温暖和“好人一生平安”的伦理重建中。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们从日常生活叙事的视角展开了对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铺陈。

从内容上来说,日常生活叙事将视角聚焦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价值取向和情感意识,以平实的生活呈现和细节描写凸显主体,进而加强了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群体意识。诗人于坚在《尚义街六号》中就是通过类似摄像机记录的方式,描写了昆明及其市民的日常生活状况,推进了平民文化和文学世俗化的进程,而其中又充满了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他已经成名了,有一本蓝皮会员证/他常常躺在上边/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怎样小便,怎样洗短裤/怎样炒白菜,怎样睡觉,等等。”^[14]诗歌中有一群人来过尚义街六号,但留下了一些东西之后又走了。人生的聚散无常,回忆中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琐屑无聊和理想中的怀才不遇,都在平实的语言描绘中呈现出来。其以原生态的生活化口语入诗,有一种淡淡的自我解嘲的意味;一直以来为诗歌

所重视的美与丑、崇高与低俗、理想与现实、宏大与自我等二元反思的结构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庸俗平民哲学。而同样,陆文夫的《美食家》作为“小巷文学”的代表作,其以小人物朱自治一生的美食经历为线索,展开了沉浮与曲折的历史画卷。作品从中国传统“民以食为天”的美食文化的细微处着眼,从“吃”的角度告诫国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从中国人没饭吃时就惨了的角度来写”^{[15]125},表达了保护传统美食文化的主题。在朱自治的个体经历中,作者淡化了对其政治背景的描绘,而是将时代风云同饮食的变化联系起来,与孔碧霞的结合也是因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美食的缺失而引发的。在新时期,朱自治的实用主义生活观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人也意识到保护传统美食文化的意义。这样就使得作品对生活的呈现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情怀,正像陆文夫所言:“我们这一代人太过忧国忧民,一看到现实社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作品中反映……其实我对苏州各式各样的民间行业很熟悉,也很有兴趣……我也想向民俗这方面发展,写出真正的文学。”^[15]而刘震云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代表,更是以其新写实的态度完整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在《一地鸡毛》中,变馓的豆腐、夫妻间的争吵、送小孩子上学、给幼儿园阿姨送礼、菜场买菜等,都构成了文本描绘的对象,其主人公小林的生活似乎就是被工作的压力、物质的需求和自我安慰、自我逃避所层层包裹。这也正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尽管有时会有些坎坷、卑微和无奈,但生活总要继续、工作岗位仍然需要坚守,而人的斗志和锐气却在物质化和现实化的现实生活中一点点地被消磨。那么这究竟是对理想的放逐,还是对社会的无奈反抗呢?可以肯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已经在生活的审美场景中彻底解构。

从形式上来看,日常生活叙事消解了“从现象到本质”的历程,也放弃了审美化的艺术呈现,而是以自然本真的状况、类似口语的语言和“零度写作”的艺术形式,再现了人们在物理时空中的生活细节和现实场景的喜怒哀乐,以及生命体验中的自嘲自讽。比如,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零度写作”,正如同摄像机一般将日常生活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最大限度地消泯创作主体对文学本身和形象的干涉,呈现出自然本真化的色彩、声音和动作。作为最早阐述“零度写作”的学者,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主要立足于打破意识形态对语言的干涉,认为语言作为话语和权力的载体,很容易渗进文学文本之中,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作家的道德选择、政治意图也正是因为语言才得以在文学中彰显。而作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转折的重要理论家,他坚定地认为语言的自由可以通向文学的自由与主体自由生存的精神家园^{[16]106-108}。所以,“零度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16]102},类似于新闻题材的冷静与客观,并总是试图在二极对立的语境中找到中性和第三项的话语模式。在此种写作中,不存在道德伦理的判断、政治意识形态的宣扬、神性的启蒙,以及建立在理性霸权之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规约,尽力消除外在因素对文本的干涉和创作主体对文本的过分介入,从而达到消解现代性的霸权和主体的无限膨胀的目的。语言既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也可以实现后现代人性的自由彰显。而刘震云等作家的“零度写作”恰恰是还原生活本来面目的“纯真之眼”和“生活之流”,在客观、冷静和口语化的语言中,透露出小人物的主体性生存状态,给个体主体性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合法化的存在空间。

3. 文学的个体欲望彰显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注重表达生活的同

时,也肯定了主体的世俗欲望和多元的人生观、价值观。宏大的乌托邦理想神话坍塌之后,人们对金钱、物质和财富的追求,对个体欲望的放纵,对游戏人生态度的肯定等,曾被斥责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东西,在1980年代纷纷涌现了出来。身体和生活的自由在1980年代初步显露,并逐步构成了文学通俗化的另一个脉络。王朔的“痞子文学”在1984年《空中小姐》发表后开始逐步盛行,随后的《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爱你没商量》《橡皮人》《顽主》等,都通过大众消费的形式实现了畅销,通俗化的叙事和痞子形象的塑造让人们耳目一新,带有叛逆色彩的主人公似乎已经取代了“高大全”式的英雄,成为大众世俗生活的偶像。例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我”——张明,可谓地地道道的痞子式人物,他没有宏大的理想志向或者是道德规约中的信仰仁爱,其行事的标准和原则正是自身的潜意识释放和身体性诉求,其传奇经历构成了许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原始生命力流动的奔放与自然。正如王朔对《爱你没商量》的阐释,“不要搞追求,不要搞政治指涉,俏皮话也不要,就要一个悲悲切切、揉碎人心的情歌小唱”,“大众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唯一尺度”^[17]。调侃和戏仿既成了王朔写作的特色,也构成了其文本反叛性和破坏性的内核,正如他本人所总结的:“两路活儿,一路是侃,一路是玩。”在他的笔下,社会场景可以混乱无序,主人公形象可以是痞子,爱情可以不负责任,暴力可以如动物般凶猛。也许王朔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方式,却意外地起到了反抗话语霸权和消解政治规训的作用,使得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可以说,王朔的文学在街头巷尾被人热议的同时,也使得后现代多元化审美空间得

到释放。与王朔商业化的审美价值取向不同,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和阿城的《棋王》则是将人生态度和世俗理念融汇至富有乡土气息的小农意识和具有生活哲学的朴素理念之中,给人以另类的世俗化审美感知。陈焕生一路卖油绳、买帽子、感冒发烧、住招待所、自我安慰和吹嘘的经历,形象地反映出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面对新时期商品浪潮的精神状态,他们善良、淳朴却又浅薄、狭隘,其付出5元钱住宿费前后的变化,更是符合一个世俗平民百姓的精神价值取向。最终,“精神胜利法”给陈焕生以自豪的资本,富有戏剧气质的描绘也使得日常生活焕发出反思的力量。阿城的《棋王》则将世俗生活上升至一种隐忍、自足的生活哲学,似乎一饭一粮、一言一语、一棋一子、一柔一刚中都蕴含了生命的神圣,这也使得主人公王一生具有了更高层次的魅力。在他看来,政治的风云变幻不及棋盘上的你来我往,时代的荣辱兴衰不如朴实的箪食瓢饮,世俗化的生活同样可以焕发出形而上的光彩,这也是文化寻根的应有之义。无为方能无不为,柔方能克强,而文本在王一生同9个下棋高手的对决中,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上升至极高的境界,这也正是对生命自由和个体自由的最好阐释。

三、生活美学:主体话语的彰显与知识分子启蒙思想的表达

1. 文学的反思与生活美学的生成

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和文学艺术世俗化的进程也带来了生活美学的勃兴。无论是文学对日常通俗生活“一地鸡毛”式的描绘,还是现代艺术对主体身体的发掘;无论是摇滚乐、肥皂剧等大众审美文化的市场消费伦理和文化生产,还是精英文学的新写实和个性解放,都实现了美学层面的重新调整与变革,使得主体性彰显的生活美学得以建构,“当代艺术也以‘反美

学’的姿态走向观念、走向行为、走向环境”^[18]。当然,此语境中的“生活”是以主体为核心的,以人的感官性、生存性为基础的活生生的生活状态。其实这是与“美学热”中的形象思维、感性话语和实践主体论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只不过是将哲学家与美学家在思想层面的理论转化成了现实中可触可感的美学样态。在“美学热”的讨论中,感性曾一度构成了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基础,也成了美学生发的前提;而一旦感性被运用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它就成为以身体化和感官化为核心的美感体验,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超验存在,不再是诸如现代艺术的“孤芳自赏”与“审美区隔”,而是在对大众文化“震惊”般的体验中获得“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19],这便是触发美感产生的第一个层面。审美以其广泛的形式渗透到电影电视、流行歌曲、通俗文学之中,并带给接受者以感性直观的视听冲击和文学想象,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1980年代的生活美学有着其自身独特的话语场域与历史使命,更是以其学科互涉和跨学科性获得了与“美学热”同构的意味。众所周知,“美学热”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式理念,具有强大的美学意识形态指向性和反叛政治的意味;同时美学也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巨大阵地,他们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试图重掌启蒙的话语权,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创造性理论成为了“美学热”强大的推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学对于思想解放的意义,远远大于美学学科自身建构的价值,美学的感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意识形态功能等,都构成了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潮流的重要内涵,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反思、批判和改革的先导。在此语境下,美学自身的学科属性已经湮没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中。这样,1980年代“美学热”中的“美学”其实也具有了前学科的公共性,文学、

哲学、历史、文化、建筑、服装、艺术等,都纷纷纳入美学的范畴。这也是中国特定历史语境所造成的结果。当然,这一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1987年以后,伴随着学科分化浪潮的推进,美学在1990年代逐步被边缘化,“美学热”趋于消退。所以,1980年代的“美学热”浪潮“还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性思潮存在,尚未与学科体制取得联系”^{[2]110},启蒙、感性和人道主义分别构成了其价值取向、理论根基和生成因素。知识分子和美学家们并没有对美学学科的逻辑框架、研究对象、历史属性和发展脉络等进行清晰的勾勒,也并没有从学科属性的意义上完成美学的现代化工程,而是将其看做思想转型、感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理论载体。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以及关于“异化”问题、“自然的人化”问题与人道主义的争论等,呈现更多的是美学的价值与意义,而对感性的自由和人性的追寻是美学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启蒙的姿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话语权的释放。一位美学教授曾经热情地回忆起“美学热”的盛况:“首届中华全国美学会议(1980)在昆明刚结束,美学家李泽厚就应邀顺道来讲学……前去听讲的文理科同学都有。讲演时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窗玻璃也被挤碎了)。”^[20]可见,“美学热”给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和人性反思。

1980年代生活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呈现则同样具有独特的意义。在后现代理论中,生活美学是伴随着消费文化和“艺术自律终结”的文化景观同步出现的,“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10]147},所谓的工业文明、理性霸权和主体膨胀已经使人们感到疲惫不

堪,而现代艺术和审美自律的精英化取向也产生了内部的分裂,审美现代性更是无法切断与资本主义市场伦理之间的“黄金脐带”,所以后现代的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和波普艺术等,都加强了与生活 and 感性的联系;文化工业和审美消费也促使了美学向普通大众播撒效应的实现。但是对于中国新时期的生活美学而言,它并没有经历现代化的工程改造,市场经济和文化工业也仅仅是处在起步阶段,所以1980年代的大众审美文化和生活美学就呈现出主体性建构与解构并存、启蒙与感性共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纠结缠绕的多元化局面。我们可以从朦胧诗对文学语言表达的探索,感受到身体语言的狂欢;可以在流行音乐、商业电影中感受人性的美好,也能通过文学的世俗化改造反观历史与现实。总之,美学此时处在多元共生的复调话语之中。但通过清理思路可以发现,无论是现代性价值取向或后现代性价值取向,生活美学在1980年代同样给大众以感性的启蒙和人性的彰显,其启蒙的诉求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学自身的分歧。无论是带有探索性质的新潮小说与诗歌,还是通俗化的对生活场景的描绘,其内核依然是大众审美感性能力的张扬与告别历史的人性反思。当“文革”时期的理性、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规约个体主体性的主导因素时,感性、人性、个体和生活就构成了有效反拨政治统摄的大众审美现代性话语。也正是在此维度上,大众层面的生活美学和知识分子的“美学热”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感性启蒙的美学价值取向。

如果说“美学热”完成了新时期哲学思想和美学理论方面的启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局面,那么生活美学和审美文化就是发生在民间和大众层面的感性释放与思想启蒙。我们无法使用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对该时期的审美文化进行区分,

而只能将其纳入“美学热”的宏大话语和功能性的价值评判之中,并继续在人道主义、感性思潮和告别历史的维度审视审美文化的出现和勃兴。由此,1980年代的审美文化也就具有了前学科的多元化性质,通俗的流行音乐、迪斯科舞蹈、港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商业化电影与新潮小说、女性文学的身体表征、意识流诗歌的意象,共同构成了以生活感性体验为核心的审美文化面貌,使得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共同参与到感性的启蒙之中,这正如德国后现代哲学家韦尔施的定位:“它正在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审美活动,当然这里所指的‘审美’不只是指美的感觉,也是指虚拟性和可塑性。”^[21]生活美学和审美文化在1980年代更多地彰显了自由、多元、感性和身体的一面,商业因素和消费伦理在当时还没有大规模地渗入文化领域之中,这就保证了通俗文化具有特有的经典化与启蒙化气质,所以邓丽君、金庸、琼瑶、《小花》、《少林寺》等也成为一代人的特有记忆。最终,1980年代的审美文化和生活美学同“美学热”一道,推进了人性启蒙和感性彰显的进程,重建了美学拯救人生灵魂的历史功能。

四、结语

从大众审美文化的勃兴到文学世俗性的探索,从对个体主体感性的表达到生活美学的生成与延展,1980年代的文化进程借助于“美学热”的推动,改变了一元式的审美理论内涵和文艺表达技巧,建构起全新的文艺样态和知识内涵,将个体的主体性话语、感性情感与文化启蒙通过大众文化表征出来,反映了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努力和对美学启蒙的诉求。当下的大众文化,呈现出高雅与低俗共生、文学艺术积极越界、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并存、知识启蒙与自我反思同行的局面,这些都与1980年代所确立的文化特质十分相似,也基本延续了1980年代

的文化和理论脉络,所确立的感性释放原则和美学启蒙理论也正在后现代语境中延展。无论是继承、调整,抑或反思、批判,都透露出审美自身的人性化因素与差异性特质。未来的大众审美文化研究将构成美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维,也是重新发掘美学价值、延展美学功能的重要领域。影视传媒的图像狂欢、赛博空间的自由遨游、艺术设计的新异多变、超文本写作的另类场景等,都会给传统的美学话语带来挑战,大众文化也必将以高速发展的态势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带给我们崭新的思考。对1980年代大众文化发展历史状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在纷纭复杂的文化场域中,找到一条审美感性—美学意识形态—主体超越的理论主线,以不断延展美学的启蒙价值,促使主体在后现代时期获得精神富足与生存自由。

参考文献:

- [1] 裴萱.从“美的规训”到“美的盛典”:1980年代美学话语的谱系转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07.
- [2]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18.
- [3] 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J].文艺研究,1979(3):39.
- [4] 鲍姆嘉通.美学[M].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1.
- [5]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8.
- [6] 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8.
- [7]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34.
- [8] 高尔泰.论美[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45.
- [9]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44.
- [10]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11] 杭之.一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41.
- [12] 李小兵.我在,我思:世纪之交的文化与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74.
- [13] 陈立旭.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审视[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3(3):51.
- [14] 于坚.尚义街六号[J].诗刊,1986(11):6.
- [15] 施叔青.陆文夫的心中园林[J].人民文学,1988(3):125.
- [16]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6-108.
- [17] 王朔.无知者无畏[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21-23.
- [18] 刘悦笛.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406.
- [1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9.
- [20] 王一川.从哲学思辨到文学阐释——我在美学热潮中的经历片段[J].中文自学指导,1996(6):2.
- [21]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0.



引用格式:王津. 成本与收益的复杂错位——杜十娘悲剧的社会心理学透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1): 77-84.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1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1-0077-08

成本与收益的复杂错位

——杜十娘悲剧的社会心理学透析

Complex dislocation of cost and benefit

—Social psychology insights into the tragic fate of Du Shiniang

王津

WANG Jin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公。借助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杜十娘悲剧的成因发现:正是因为男主人公李甲知觉到自己在与杜十娘的关系中,其成本与收益极不平衡,故其内心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不安,最终导致他对杜十娘的背叛。而杜十娘在李甲背叛她之前,其成本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快乐从容;李甲对二人关系的主动终结,使杜十娘成为悲剧的完全承受者,其妓女命运改变途径的狭窄、刚强的个性、两性关系中角色的突转,使杜十娘选择以弃财投江的方式作为对李甲背叛的报复,从而使自己由被动的承受者转变为二人亲密关系结束的主动终结者,由经济、心智的独立走向人格的独立。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李、杜的情感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现实的镜鉴意义:当人们对一段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单纯从道德、情感或性格的角度进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够的,尚需考虑在彼此关系中的投入成本、收益、预期与结果是否平衡,并考虑双方在收益、成本上是否公平,从而及时调整彼此的关系,或者尽可能共同结束关系,以减少对彼此的伤害。

关键词:

杜十娘;
社会交换理论;
公平理论;
亲密关系结束

收稿日期: 2016-03-17

基金项目: 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大学语文教学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 王津(1976—),女,河南省上蔡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公,曾为京都名妓,与绍兴府富家公子李甲两情相悦,赎身随李甲返乡,途中李甲反悔,将其卖给商人孙富。杜十娘万念俱灰,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宝物一件件抛向江中,最后纵身跳入江中。杜十娘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位光辉灿烂的女性形象:古人赞其情真性侠;当代人从经济因素、人性冲突、男权中心等维度对其命运进行透视,称其为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反抗者。杜十娘这一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多元视角的阐释下,内涵愈来愈丰富,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开阔阐释空间的经典人物。综观学界对这一形象的探讨,其议论生发的关键始终是一个:杜十娘悲剧产生的原因。围绕此话题,不同论者从不同视角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不过,已有研究大多从人类学、社会学视角来分析,而较少从社会心理视角来解析。

社会心理学是探讨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如何因他人真实或想象的存在而受到影响的科学^{[1]5},其探讨的核心是社会对人的影响。相比同样关心人们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人类学、社会学而言,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主要关心的不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而是人们如何受他们对社会环境的诠释或解读的影响”^{[1]6}。本文拟借助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杜十娘悲剧的成因,以期为这一经典人物的再阐释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撑。

一、杜十娘和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所知觉到的一段关系的正性或负性程度取决于:一是自己在关系中所获得的收益;二是自己在关系中所花费的成本;三是他

们对自己应得到什么样的关系和他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可能程度的知觉。换句话说,我们‘购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关系,它对于我们的情感货币而言能提供给我们的价值最多。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收益、成本、结果和比较水平”^{[1]353}。不过,“人们并非简单地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他们还要考虑关系中的公平性”^{[1]354}。公平理论认为,当交往双方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大致相等时,人们会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最大的快乐;而不公平的关系则会导致一方感到过度受益或受损,从而双方对这种状态均感到不安,且都具有重建公平的动机。公平理论是对社会交换理论的完善与补充。

1. 杜十娘的收益—成本分析

在遭遇孙富之前,在与李甲的亲密关系中,杜十娘的收益(包含预收益)是巨大的。

首先是从良。杜十娘欲通过李甲摆脱烟花命运,由娼家转为良民,由社会底层跃入上层贵族门庭,实现身份的转换与社会地位的飞升。尤其是后者,对于普通良家女子而言,由下层百姓转为上层官宦世家的妻妾,若无特殊际遇,难有此种命运转换,更何况杜十娘这种被践踏、凌辱的娼妓。从古代娼妓从良嫁人的历史看,进入上层官宦家庭的少之又少,能进入并为上层官宦家庭所容纳者更是凤毛麟角,若非特别遭际或非凡的才色德艺,恐怕难以为此。因此,杜十娘欲“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2]475},的确不是一个小的梦想。故杜十娘若能成功从良,进入李家,将是她最大的收益,所以她亦言“得终委托,生死无憾”。

其次是两情相悦。根据人际吸引理论,两性相吸引有诸多因素,比如时空接近效应、相似性、互惠式好感、外表吸引力与互补性等。人际吸引的相关理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杜十娘

为何会倾心李甲。其一,李甲是“在京坐监”^{[2]463}的国子监学生,父亲李布政提供的丰厚资金使他有时间、有条件长期与杜十娘接触。其二,二人具有诸多相似性。李甲远在异乡,渴求温暖,与杜十娘渴望温情之心相同;杜十娘有“院中若识杜老微,千家粉面都如鬼”^{[2]463}的美貌,而李甲亦“风流年少”“俊俏庞儿”^{[2]463},二人一个漂亮一个风流;杜十娘年芳十九,李甲“风流年少”,二人年龄相若。其三,二人具有互补性。李甲“温存性儿”“忠厚志诚”^{[2]463},此对品尽风月场之冷漠的杜十娘来说,尤为难得。李甲“自幼读书在庠”^{[2]463},经历简单,为人单纯,不同于杜十娘的历经沧桑、工于心机、老于世故;李甲为家中长子,其父“素性方严”^{[2]473},故李甲的性格中存在着较强依从性与奴性,而杜十娘身为京都名妓,是妓女中的上等人,其性格刚烈强势。正是受上述诸多因素影响,李、杜“一双两好,情投意合”^{[2]463},此亦为杜十娘的巨大收益。

从良是杜十娘的最大目的,但两情相悦才是杜十娘婚姻幸福的保障。“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寒”^[3],不少妓女从良后的生活尚不只是如此冷清,更多的还有丈夫的背弃,以及难以融入夫家人际圈子的困境,故一些娼妓会因从良后婚姻的失败而再次沦入青楼女子。所以,对杜十娘而言,李甲的温情、忠厚、志诚等是非常难得的,亦是她未来幸福婚姻的重要保障。

有学者认为,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2]463},自从妓以来,七年之内,为她意乱情迷、倾家荡产者不在少数,为何在李甲之前没有遇到从良对象呢?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述外,尚需注意:其一,李甲虽与杜十娘所经历的其他嫖客一样均以财买色,是钱色交易,但李甲的身世、经历、性情,以及他与杜十娘的诸多相似或互补的

特点,则非他人轻易具备,李甲最不同于其他嫖客者是他性情温存,对杜十娘有一定的真情。其二,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从其“百宝箱”看,即可知其“志”之久,蓄积万金若非假以时日亦难成功。由于老鸨以妓女为牟利手段,所以她们对妓女从良尤其当红妓女从良是严加防范和制止的,“妓女最忌讳说要嫁人。‘嫁得成没有什么,嫁不成一定把客人谣得个个不来,受累不浅’。即使要从良嫁人,也总是秘密进行,谋定后往往是出其不意,断没有预先张扬出帖子通知狎客的道理”^{[4]178}。因此,从良对象之选择一定是慎之又慎的。妓女从良的方式之一是用钱赎身,妓女的赎身费用非常高昂,一般人是出不起的,出得起钱的往往是豪绅富贾、宦宦大族等,但这些人赎妓又常常受阻于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妓女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赎身者少之又少。“有鉴于此,一些工于心计的妓女,很早就瞒着老鸨开始偷偷攒钱,趁自己年轻走红的时候,放出眼力,遇到一个可以终身相托的好心人,就赎身从良,跳出火坑。这便是妓女中通行的‘倒贴’从良嫁人的方式。”^{[4]178}但要攒一大笔赎身费谈何容易!杜十娘直至遇到李甲后方吐露从良心志,是因为她一直在为前途积攒资本。而杜十娘能攒下万金的家底,其所忍受的侮辱,以及与老鸨、嫖客周旋的心机智慧,是可想而知的。

综上所述,对杜十娘而言,李甲可以说是在最适当时机出现的最适当人物,而并非“碌碌蠢材,无足道者”。杜十娘亦没有“错认李公子”^{[2]477},她从李甲那里获得的预期收益是未来将成为李氏家族的一员,组建家庭,由社会最底层跃入上层,并收获两情相悦的真情。当然她实际的收益是李甲的温情回报、顺利脱籍,并在与李甲的关系中处于主动掌控的地位。

从其成本来看,除情感上的投入外,杜十娘投入的经济成本在孙富插手之前,主要是用于

赎身的150两银子、置办行装的20两白银,以及路途所需的50两白银。预期经济成本是寄居吴越的花销与被李甲父亲接纳的投入。从社会学人际吸引的公平理论来看,如果收益与成本接近,那么对于投入者而言,他对双方的关系会比较满意。杜十娘投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和已收益大致上是平衡的,所以她认为她与李甲的关系是稳固的,故而她自信、快乐、从容。告别院内姐妹的欢喜、南下途中夜泊瓜洲渡口的月下清歌等,均是此种心情的体现。

2. 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对李甲而言,他已有妻室,不像杜十娘那样急切要获得婚姻和真情。在孙富之前,他与杜十娘交往的收益主要是满足被拘束的花柳情怀,在异地他乡得到暂时的温暖、虚荣,获得远离严父的虚幻自由,即其收益主要集中于个体生理、心理与情感层面。

从成本来看,在为杜十娘赎身前,李甲已在老鸨那里花费千金,“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也曾费过大钱来”^{[2]464},但此花费并非为了杜十娘的幸福,而只是满足自己生理、心理、情感需求而付给老鸨的报酬。为杜十娘赎身,他只是遭遇借钱被拒的尴尬,三百两银子,杜十娘担一半,柳遇春代为之借,等于他未费分文。而按妓院行规,“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2]465},更何况杜十娘乃京城名姬,所费更高。在关涉杜十娘的这一重大事件上,他除了遭遇被拒的白眼外,在物质上的投资基本为零。但李甲的隐性成本是巨大的。其一,李甲接受杜十娘的风险在于:“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2]472}孙富此话道出了李甲为了杜十娘将要做出的牺牲是以众叛亲离、万夫所指为代价的巨大牺牲。其二,李甲失去了男人对女人的驾驭权与应有的尊严。“大概娼妓负盛名

的,固恃她自身才情色艺,而王孙公子之翩翩裘马,一掷千金,文人学士的诗文酬答,标榜揄扬,亦大有影响。”^[5]杜十娘名满京畿,虽处社会下层,但属下层之翘楚,其才色、名气、阅历、心智与万贯家产等,使她底气十足,其自我效能感非常强^[6],这使她除了对从良命运自信、从容之外,还在与李甲的关系上表现出较为强势的一面。此点在与老鸨的斗智、与李甲的相处中均有明显表现。而与杜十娘的自信、从容相比,李甲则愁苦而自卑,如“公子正当愁闷,十娘道:‘郎君勿扰,众姊妹合赠,必有所济。’及取钥開箱。公子在傍自觉惭愧,也不敢窥覷箱中虚实。只见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红娟袋来,掷于桌上道:‘郎君可开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觉得沉重。启而视之,皆是白银,计数整五十两。……公子且惊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乡,死无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头不敢忘也!’自此每谈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抚慰”^{[2]469}。其中“掷”字显示出杜十娘在分文不具的李甲面前的优势,李甲感恩戴德的话亦反映出杜十娘优越的施恩者态势。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男性掌控经济上的主动权。由于经济的不自立、家教的严苛和社会阅历的简单,李甲在与杜十娘的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这大大影响了他在双方关系中的尊严与自信。

因此,从显性投入来看,李甲的成本虽是极低的,但从隐性投入来看,相比其在社会家庭中丧失一切及其在两性中处于劣势地位,其成本巨大,收益为负。

相比两者的预期收益,李甲、杜十娘在这场社会交换中的收益显然极不相当。“收益是正性的、令人愉悦的关系,它让我们觉得一段关系是值得的并且应该巩固。它包括了我们已经谈论过的我们伴侣具有的个体性格和行为的类型,以及我们能通过与该个体结识所获得的外

部资源(如获得钱财、地位、活动或与其他有意思的人群结识的机会)。”^{[1]353}按照社会交换理论,“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感受取决于他们对这段关系的收益与成本的知觉”^{[1]353}。因此,在孙富出现之前,杜十娘对她与李甲的关系是比较满意的,但李甲自杜十娘提出从良之事起,即自知无力承担巨大的成本代价,只不过懦弱、屈从的性格和对十娘的贪恋,使他在遇到孙富之前一直没有拒绝十娘,但事实上他一直处于焦虑之中,此与杜十娘的从容筹划之自信相比更为明显。例如,最初杜十娘有心于他,“奈李公子惧怕老爷,不敢应承”^{[2]463};杜十娘与老鸨商议好后告知李甲,他说:“我非无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当柳遇春言杜十娘所言乃烟花逐客之计,“公子听说,半晌无言,心中疑惑不定”^{[2]466}。离开妓院在谢月朗家时,李甲尚言:“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辗转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2]468}。

李甲心中始终有一层阴影,经济的困顿、家庭伦理的压力和杜十娘的优势等多重困扰,几乎让他难以抉择。所以,李甲自始至终没有正面给杜十娘以承诺,而无承诺即无责任之担当。此外,我们不能忽略空间距离对人的影响。当时李甲远在北京,处于一相对陌生的环境中,其父和家庭对他的影响相对减弱,杜十娘因与其距离近,对他的影响反而较强;但一旦他离京南下,离家愈近,其父和家庭对他的影响则益强,杜十娘对其的影响则渐弱。李甲原本一直回避的问题随着距家日近而不得不正视,这也是李甲突然翻盘的原因所在。

因此,孙富只是诱因,根本问题仍在于李甲对自己与杜十娘关系中成本与收益巨大不公平的知觉。从人际吸引公平理论来看,李甲在表面上是过度收益者,而从隐性方面来看则是过度受损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过度受损

者会不满意自己在双方关系中的结果,而过度受益同样会使受益者“想要放弃社会交换理论所阐述的那么一个轻松的交易——以微小的成本和工作来换取高额的收益”^{[1]354},因为“公平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标准——如果他们在一段关系中得到的超过他们应得的,个体将最终感到不安,甚至是感到内疚”^{[1]355}。李甲在与杜十娘的相处中,每次从十娘那里拿到钱的时候,总是愧疚的,又不得不感激涕零。因此,尽管李甲在杜十娘从良一事上其成本近乎为零,但过度受益仍然使其感到不安,其心中不仅有家庭老父的阴影,还有驱逐不去的杜十娘给予其恩典的阴影。因此,李甲抛弃杜十娘是必然的,而杜十娘之前完全忽略了李甲的感受,在李甲对之感恩涕零之时,她只是“曲意抚慰”,这不仅不能缓解李甲的压力,反而更增加了李甲的自卑与无助感。

综上所述,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与公平理论,杜十娘的成本(实际投入与预期投入)与收益(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而李甲的显性成本虽低,但其隐性成本则是巨大的,远非他个人所能承担。李、杜虽对各自的收益与成本具有明确的认知,但并不清楚对方的隐性成本与对方对自我成本与收益的知觉,这是导致二人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杜十娘和李甲亲密关系的结束与其角色的翻转

在李甲出卖杜十娘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二人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原本杜十娘独立而主动,李甲则依附而被动,但在李甲与孙富的交易中,杜十娘与李甲的关系则完全颠倒过来,李甲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依附变为独立,成为他与杜十娘关系的主动破坏者,这是男权社会赋予他的权力,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由此可见。但李甲采取如此决绝的做法,仅

用封建礼教的压制与个体人格的缺陷为由是不能充分解释其行为动因的,而人际吸引的社会交换理论与公平理论则能更好地揭示他人的影响如何左右李甲的情感与认知天平。

下面将在上述探讨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李甲的主动破坏行为对杜十娘的影响,由此探寻杜十娘择死的行为动因。社会心理学对亲密关系结束问题的研究认为,当一段关系结束时,人们对关系结束的感受与他们在结束关系的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在分手决策中承担责任较多的被称为“终结者”,承担责任较少的被称为“承受者”,“‘承受者’感觉非常糟糕——他们报告高度的孤独感、抑郁感、不快、愤怒,并且几乎所有的‘承受者’都报告在分手后的几周内体验到各种躯体症状。对‘终结者’而言,分手的沮丧程度、痛苦程度和能够引发焦虑的程度都是三者中最低的。尽管‘终结者’报告感觉内疚和不快乐,但他们体验到的诸如头疼、胃疼以及进食和睡眠障碍等负性躯体症状是最少的”,而“当男性在结束关系这个问题上或是体验到更多的控制感(‘终结者’),或是体验到更少的控制感(‘承受者’)时,他们倾向于‘挥手告别过去’和‘往前看’,切断和他们前任女友的关系”^{[1]375},这是现代西方的实验结论。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古代与现代在分手原因上会有种种不同,但“终结者”与“承受者”所体验到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理当具有普遍性。在李、杜关系的结束上,李甲是完全的“终结者”,因为杜十娘对其谋划毫不知情,尤其从杜十娘单方看,自己手握重金,两人关系稳定,未来充满希望,李甲的陡然变化,不啻为当头一棒,转眼风云。在杜十娘的经验里,这一变化没有任何铺垫,完全出乎意料。而李甲对结束这段关系的反应只是“颜色匆匆,似有不乐之意”“含泪而言”“情不能舍”“泪如雨下”^{[2]473-474},当孙富差家僮到船头候信时,李甲

竟然“欣欣似有喜色”^{[2]474}。我们可以指责李甲的无情无耻,但亦应看到他在结束一段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协调的关系时的如释重负,他为能重新回归到未遇杜十娘之前的家庭关系而欣喜,这可谓李甲对其严父与世俗伦理道德的屈从,也根源于其经济的不独立。李甲不只是对杜十娘背信弃义,他更是杜十娘死亡的主要推手。作为“承受者”,杜十娘所承受的致命打击显而易见。一般而言,女人遭受背叛,大多会本能地反抗,发泄不满,但杜十娘则是“放开两手,冷笑一声”,“时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灯梳洗”^{[2]474},哀莫大于心死。这冷静的背后,正是杜十娘心灰意冷的表现,是暴风雨来临的征兆。杜十娘最终以怒沉百宝箱、纵身跃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除与李甲的背叛直接相关外,还有其深层的原因。

首先,妓女从良艰难,出路狭窄。中国古代妓女的出路无非有年老脱籍、用钱赎身、出家入道、逃走异乡或隐居村落等。除非放弃红尘生活,若要生存,对于年轻的娼妓而言,以男人为依托是必然选择。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可见她对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与家庭的渴望。李甲的背叛,让杜十娘对从良嫁人之路感到了彻底绝望。有论者认为,转嫁给孙富依然是从良,不是一样实现了杜十娘脱离烟花火坑的理想吗?这只是一己之见。历史上“娶妓为妾的以商人居多,因为他们一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娼妓“嫁给商人为妾后,往往不久就会被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商人无情抛弃,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4]181}。所以,一般而言,妓女对商人并无好感,杜十娘也不会选择孙富那样的商人作为归宿。前文指出,李甲是在最恰当时机出现的最恰当的人物,他符合杜十娘的个性要求和她对男性及未来生活的期望,即对杜十娘而言,选择李甲可以说是她认为的唯一出路。再据文本可知,杜十娘应

无亲人,其社会关系主要是妓院人员与嫖客。脱离妓院后,她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李甲,而李甲的背叛,使杜十娘的社会关系断裂。社会学认为,“社会网络即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纽带。一般认为,传统型社会网络是以亲情、宗法伦理为基础的,以个人为中心,依次层层外推至家庭、亲戚、朋友、邻里、社区和同事而构成的一个‘同心圆’式网络,包括血缘、亲缘、趣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这些关系又依次较为松散,所起的维系作用也越来越小,自身的稳定性也越来越弱”^[7]。杜十娘的主要社会关系是业缘关系,她与李甲的关系本身即属于业缘关系。所以,当她离开妓院又为李甲所弃时,其社会关系网络即出现了断裂。而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一旦脱离了社会关系,人将何去何从?因此,死亡是杜十娘的必然选择。

其次,高自我效能感的受挫。杜十娘身处风月场这种被人鄙弃的场合,能积攒下万贯家产足以说明她职业生涯的成功。美貌、才艺、名气、财力,以及复杂处境培养出的丰富人生经验等,使得杜十娘形成强势的性格,自我认知度较高,即具有高自我效能感(当然,此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亦密切相关)。因而,在与李甲的关系中,杜十娘一直是前期双方关系与事态发展的掌控者。事实上,在遇到孙富之前,事情基本上是沿着杜十娘的预期规划发展的。因此,杜十娘是自信的,心理上是安全的。所以,当“见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2]464},在与院中姊妹话别时,杜十娘“吹弹歌舞,各逞其长,务要尽欢,直饮至夜分”^{[2]468}。当李甲不知如何面对老父时,杜十娘则言:“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仓卒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妾于归,彼此安妥。”^{[2]468}对于始终悬在李甲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杜十娘从容应对。当然,杜十娘的从容应对有其现实道理。明代法

律虽对官员及其子孙婚娶乐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但明末官宦人家纳妓女为妾的并非个例,《警世通言·玉常春落难逢夫》中玉堂春就嫁给了原礼部尚书之子。也就是说,李甲之父虽然严厉,但在明末人们对金钱的普遍拜崇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之下,化解李父内心之抵触是很有可能。而事实上,困扰李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礼教,而在于他经济上的不独立(从孙富以千金动之和他目睹十娘抛弃万金时之反应即可看出)。因此,当事态的发展陡然转变时,对一直处于控制地位的杜十娘而言是重大挫败,她所有处心积虑的谋划(包括认识李甲之前即开始的从良筹备),她所有忍受屈辱的痛苦与眼泪,以及她所有的自信与希望,此刻已被李甲彻底摧毁。

再次,挫败下的复仇。杜十娘由两性关系的控制者沦为亲密关系结束的完全“承受者”,预期收益瞬间变为零,收益与成本间的巨大反差,使得杜十娘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完全受损者,个性刚烈的她必然要反击,而对李甲背叛的最大惩罚莫过于毁灭李甲所信奉的价值:金钱与美人。杜十娘本想借助金钱保障自己未来的幸福,但她最终无奈而愤怒地把万贯家财抛掷江中,希望江水冲走自己一生所蒙受的侮辱,赎回自己的清白与真情。她对金钱的弃置,使她同拜金的世俗划清了界限;她对生命的放弃,亦使她同一切肮脏的现实划清了界限。在这一刻,杜十娘不再仰仗世俗而独立起来了,如果说以前她是经济和心智上的独立者,那么现在她则是人格上的独立者。当她纵身跳入滚滚江水之时,她以死昭示了自己的尊严,抗议了封建社会男权对女性的践踏。抛钱跳江的行为,使杜十娘从被动分手的完全承受者的地位上翻转过来。李甲的分手决策是将杜十娘转卖,而杜十娘的分手决策则是与李甲死别,这又是李甲始料不及的,李甲又变成了完全的承受者。杜十

娘一了百了,而李甲则自此终身背负着杜十娘跳江这一壮烈悲剧制造者的骂名!所以“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转忆十娘,终日愧悔,郁成狂疾,终身不痊”^{[2]475}。

三、结语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理论,探讨了李甲、杜十娘两性关系的变化与杜十娘的择死行为,认为正是因为李甲知觉到自己在与杜十娘的关系中其成本与收益间的巨大不平衡,其在二人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故其内心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不安,这最终导致了他对杜十娘的背叛。杜十娘在李甲出卖她之前,其成本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在二人的关系中,前期她处于主动的、安全的位置,对未来比较从容;当李甲主动终结二人关系时,她则成为完全的承受者,其妓女命运改变途径的狭窄、刚烈的个性、两性关系中角色的翻转,使杜十娘以弃财投江的方式来作为对李甲背叛的报复,从而再次从被动的承受者成为亲密关系结束的完全终结者,由经济、心智的独立走向人格的独立,其对真情、尊严、自由的捍卫,使得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女性人物形象。

抛开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人的影响,抛开杜十娘择死的极端行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李、杜的情感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镜鉴意义。如果杜十娘能对李甲进行换位思考,那么在与李甲相处的策略上,她应该想方设法

减少李甲的压力,而对于李甲这种懦弱、单纯而不失忠厚但经济又不独立的人来说,没有比告诉他自己的身家更为有效的策略了。因此,当我们对一段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单纯从道德、情感或性格的角度进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在彼此关系中的投入成本、收益、预期与结果是否平衡,并考虑双方在收益、成本上是否公平,从而调整彼此的关系或者尽可能共同结束关系,以减少伤害。杜十娘与李甲的关系问题,是超越时代、阶层与国别的,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埃略特·阿伦森,提摩太·D. 威尔逊,罗宾·M. 埃克特. 社会心理[M]. 侯玉波,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 [2] 冯梦龙. 警世通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3] 顾青. 唐诗三百首[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15.
- [4] 游东方. 青楼史[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 [5] 王书奴. 中国娼妓史[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154.
- [6] 乔纳森·布朗. 自我[M]. 陈浩莺,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118.
- [7] 胡俊生. 社会学教程新编[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82.



引用格式:张文清,袁同成. 向上感恩与对下抱怨:政府责任变迁中的农村老年福利态度悖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85-91.

中图分类号:D66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85-07

向上感恩与对下抱怨: 政府责任变迁中的农村老年福利态度悖论

Giving gratitude upward and making complaint downward: rural elderly welfare attitude paradox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张文清,袁同成

ZHANG Wen-qing, YUAN Tong-cheng

安徽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要:21世纪以来,国家福利责任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农村老人对中央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双重认可,而是出现了“向上感恩、对下抱怨”的福利态度悖论。其原因是:作为老年福利筹资者,中央政府福利责任的扩大使农村老人直接受益,提高了他们的满意度;而作为福利递送者,农村社区由于财力不强、投入不够、服务质量不高,难免使农村老人产生抱怨。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资金投入力度,并切实提高基层福利递送质量,以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关键词:

农村老年福利;
政府福利责任;
基层福利递送

收稿日期:2016-05-18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3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9AZD040)

作者简介:张文清(1991—),女,安徽省巢湖人,安徽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袁同成(1972—),男,安徽省寿县人,安徽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

一、研究综述

西方关于福利态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两大方面。其一,是对不同福利体制国家公众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例如,Sipetean^[1]通过研究发现,欧盟各国的社会政策之所以各具特色且相对稳定,究其原因,在于其公民对本国社会政策的态度。原来,在不同福利体制下,各国公众因福利意识形态差异而支持各自不同的福利政策,由此实现了本国福利制度的合法化;Larsen^[2]指出,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中,多数人认为穷人应为自己的贫穷负责,而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中,这一比例依次下降;Sabbagh等^[3]发现,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青年学生对老年社会政策的支持率要比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高;Jaeger^[4]指出,福利体制与再分配政策支持率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其二,是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例如,Lipsmeyer^[5]通过研究发现,欧洲转型国家依然保留着许多社会主义元素,民众也保持着相应的福利偏好;Svallfors^[6]则对比了统一后德国东、西部民众的福利态度变化,发现德国西部民众的福利态度一直较为稳定,而东部民众的福利态度则随着统一后政治制度的一体化,也变得与西部民众更为相似。除此之外,Dyck等^[7]还注意到新闻舆论环境对公民福利态度具有明显的形塑作用;Baron等^[8]还揭示了早年社会环境对个人福利态度形成的影响,发现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如果家庭从未获得任何福利,年轻人就有可能反对慷慨的福利政策;Bailey等^[9]则发现,不同群体的居住隔离会减弱人们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学者坚信公民的福利态度主要还是取决于自身利益,其他因素影响都不大。例如,Forma^[10]就指出,有孩子的家庭更有可能捍卫家庭福利制度,而年轻人则会反

对削减研究津贴;Petersen^[11]则发现,有7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对日托中心的支持率较高,而有7岁以上孩子的家庭更有可能支持学校教育;Hasenfeld等^[12]甚至还进一步提出,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实际上是自身利益与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认同的函数,比如在经济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又认同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群体自然就会支持福利国家制度。

国内关于福利态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特定群体对国家整体福利供给满意度的研究。例如,彭国胜^[13]对贵州684名农村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在福利基本价值观上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万国威^[14]看到,尽管儿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儿童群体内部之间,存在着福利期待水平上的显著不同,但其社会福利态度的内部结构并无本质区别;薛君^[15]则发现,我国80后青年虽然认同个人责任,但也希望国家在福利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保障普遍的公民权利。二是特定群体对某一福利政策实施满意度的研究。比如,薛惠元等^[16]通过考察农村老人对新农保政策的主观感受,发现大部分农村老人赞同新农保政策,但也希望其待遇水平能够进一步提高;亓寿伟等^[17]则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对各种医疗保险的满意度较高。

19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福利供给中出现了过度重视市场机制而忽视政府责任的趋势,农村老人从国家获得的福利供给较少,国家福利供给的统筹层次和互济水平都较低,这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晚年的生活质量。2000年以来,随着对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政策的重新审视,国家逐步加大了农村老年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初步建成了包括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农业生产补贴等在内的综合性农村社会福利体系,打破了农村老年福利供给单

纯依靠家庭的局限。农村老人对不断健全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是否满意,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国外研究发现,除了问卷调查以外,焦点小组等定性研究方法,对于福利态度的探索性研究也十分有效^[18]。因此,我们选取皖南、皖北、皖中地区6县区8个社区的34位老人(其中女性老人19人,男性老人15人;60~70岁的老人16人,70~80岁的老人10人,80岁以上的老人8人)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的选取方法是:首先培训8名访谈员,确定1个访谈员调查1个社区,其中除1名访谈员访谈6名老人外,其他7名访谈员每人访谈特定社区的4名老人;在每个社区中,访谈对象必须包括60~70岁的老人2名,70~80岁的老人1名,80岁以上的老人1名,且每个社区的访谈对象中都必须有男有女,以保证访谈对象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与农村老年人的实际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大体相仿。然后通过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获取定性资料,并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农村老人的福利态度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福利态度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与对基层社区的满意度反差很大。

二、向上感恩:社会福利体系构建与农村老人国家福利认同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供给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严重,199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福利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减少了国家有限的农村福利责任,使得农村老年福利水平变得更低。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和谐,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加强了农村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养老服务政策、农业生产补贴制度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建立和健全,农村老人对国家福利制度的总体满意度趋高。

1. 新农保提升了农村老人对国家福利政策的满意度

农业税取消之前,即便是老年农民种地也须向国家和集体缴纳各种税费,但能从国家获取的福利十分有限。2009年9月,《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颁布,规定年满60周岁且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老人,不用缴费即可按月领取55元的基础养老金,第一次在社会保险中体现了国家对农村老人的福利责任,提升了农村老人对中央政府福利政策的满意度。比如,83岁的ZML老太太说,“我对国家就没有话讲哦,现在不要再说上边(中央)坏话了,国家对农民挺重视的,以前我们还要交钱给国家,现在国家都给我们钱了”;67岁的HHB老人甚至发出了“现在国家政策真是好啊,托国家的福,我真想多活几年啊”的感叹。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较为满意的直接原因在于基础养老金可以补贴家用,增加消费,提高生活质量^[19]。对于依靠自我养老的老人来说,养老金既可用于购买粮油等基本消费品,还可增加他们对未来生活稳定的预期;而对于依靠子女供养的老人来说,养老金则可增加老人的灵活开支,进一步提升其生活水平,如83岁的DWS老人说:“养老保险钱对我帮助挺大的,现在吃的都是儿子们送来的,穿的都是闺女买的,上年纪的人也穿不了几件衣服,养老保险钱我就可以灵活支配了。”另外,参加新农保对于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还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20],有助于减轻子女经济负担^[21],减少老人对子女的依赖,增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例如,T县72岁的SCH夫妇身体较差,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经济主要靠3个子女供养,子女虽经济条件较好也比较孝顺,但老人还常常为增加子女负担而感到内疚,他们说:“现在国家就是好啊,这样不做事每年都会给你600多块钱,要不不给的话,孩子们的担子就更

重了。”但毋庸讳言,目前我国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十分有限,农村老人还希望进一步提高养老金水平。

2. 新农合及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增加了农村老人对国家医疗福利的认同度

1950年代中期,我国就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经济基础薄弱、卫生服务设施不足条件下,提高了农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集体经济的解体和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自费医疗和个体诊所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农村出现了“看病难”和“因病致贫”的严重问题。^[22]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颁发,开始推行新农合制度,随后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逐年增加,2014年已达到320元。此外,国家还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010年卫生部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意见》,要求每个乡镇至少建有1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每个行政村应有1所村卫生室,并以乡镇为单位,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行政、业务、药械、财务和绩效考核进行一体化管理。新农合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制度的完善,住院和门诊报销比例的不断提高,不仅使参保农村老人初步尝到了医疗保障的实惠,更减轻了他们对于罹患大病的焦虑,从而提高了农村老人对新农合的福利认同。比如,T县66岁的WHS,家境一般,去年生病在市医院住院花了3400元,报销了2000多元,感到比较满意。该县的参保费用从2011年的每人每年55元上涨到2012年的60元、2013年的70元,老人也没有多少怨言,而且缴纳保费的积极性更高了。WHS说:“我情愿年年花钱参加保险,还不去报销,好好的谁也不想生病啊,但是万一生病就能用到了啊,人吃五谷杂粮,谁知道谁能得啥病啊,买了

心安啊。”新农合制度实施中推行的普惠型老年免费体检制度,有利于老人们更加及时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早地防病治病,提升其对身体的控制感,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例如,72岁的ZJZ老人在免费体检中被查出患有肾结石、胆结石、尿结石、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随后,其及时做了治疗和生活方式调整,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是相对于较低的收入水平,目前我国农村老人的就医经济负担仍然较重^[23],故此,他们虽然对新农合制度较为满意,但仍然盼望进一步减轻医疗负担,提高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服务质量。

3. 普惠型农业补贴政策提升了农村老人对国家的忠诚度

普惠型的国家农业补贴既可以增加农业再投入,也可用于日常开销,不仅提高了农村老人的种粮积极性,也有利于提升其自我养老能力和总体生活质量,提高其对国家的满意度。W县73岁的WEL老人说:“粮食补贴加一起,每人可以领300多元,种地不问你要钱还给你钱,国家现在对老百姓的关怀,咱真没什么话说,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所以,一般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人都还种有自己的承包地,保障了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和蔬菜供应,增强了生活稳定感。

总之,随着农村社会福利体系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农村老人虽然仍希望国家对此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提高福利水平,但也切实感受到了国家福利责任扩大带来的实惠,较之2000年以前,其对福利的满意度显著提高。

三、对下抱怨:农村社区福利递送质量影响农村老人对福利的满意度

与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较高的满意度不同,由于农村社区福利筹资、福利输送能力比计划经济年代大为减弱,加之干群关系不佳,农村老人对农村社区福利递送的总体满意度不高。

1. 农村集体经济对集体福利支持下降削弱了农村老人对村集体的依赖感和信任感

改革开放之前,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农村老人除了参加力所能及的农副业劳动以换取“工分粮”外,还可分到每个人都能摊到的“口粮”,遇到重大困难还可得到公社集体的救济,生病也可通过合作医疗加以解决,集体福利供给水平虽相对较低,但在普遍贫穷的匮乏经济下,这也使农村老人获得了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但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终结,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乡镇企业的普遍改制,农村集体福利供给所依赖的集体经济逐步衰落,加上农村基层政权的空心化,村集体对村民的福利供给能力大大减弱,农村福利供给模式逐步由集体福利模式转变为市场福利模式^[24],农村老人得到的集体福利也随之大为减少,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村委会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经济照顾。比如,皖南Q县73岁的FML老太太的情况对于大多数集体资产薄弱的内地村庄来说,就较具代表性。她说:“我们没有什么补助,像有的村子养鱼,年底村里每家每户还能发点鱼,我们这个穷地方,什么产业也没有,哪能有什么福利,除了前些年村里给老党员发点日历画,什么都没有。”

2. 干群关系不佳弱化了农村老人对集体福利公平性的信赖

由于一些农村干群关系不佳,在福利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农村福利资源分配难度,村集体主要将集体收入或上级下拨的福利资源分配给“三无老人”,从而将有子女的老人排除在福利救助范围之外。此外,村委会还在村庄中塑造“有子女吃救济可耻,让后代蒙羞”的养老文化氛围,使得有子女的老人即便是贫困老人,也难以得到公正对待。比如,皖南H县66岁的HXZ老人,其老伴去世9年了,虽有两个儿子,但是其儿子几乎对其不管不问,去年

老人突然患了脑梗塞,差点瘫痪。她说:“我也没找村里,村里谁管你?村干部不可能帮忙。这是农村,你自己有儿女。”此外,村干部在福利资源分配中的优亲厚友现象,更加剧了农村老人对村集体救助的失望和不满,不愿在经济上向村集体求助,许多经历也表明,即便求助,效果也甚微。比如,皖北G县66岁的WHS老人说:“哪有救助?有补助咱能捞着吗,上面下来的救济粮不都是人家(指村干部)亲的、近的吃吗,咱也捞不着。低保之类的,想都别想。现在这个社会,就要家里有人,没关系根本什么福利都分不到你头上。”

3. 基层卫生服务质量不佳降低了农村老人对新农合的福利认可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是基层卫生服务的主要输送者,但是由于基层卫生机构条件较差,卫生工作者技术水平有限,加之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后,村医工资待遇不高,工作积极性降低,服务质量下降,这严重影响了农村老人对新农合的福利认可程度。Z县80岁的ZYB就对村医W某不信任,她说:“W医生私人搞诊所,不报销,做鬼事情,你要是找他看病,他就叫你到他家里去看,那样钱就是他自己的,你的新农合又用不上。上面检查慢性病的治疗情况,他就让我们说村里经常给我们量血压,发放高血压药物,其实药物他都留在自己家里慢慢卖,才不管你呢,我一粒药都没看见。”可见,基层医疗服务质量较低,影响了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效果,影响了农村老人对新农合的正面评价。

4.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足影响了农村老人对福利的满意度

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但是目前农村老人服务设施依然比较匮乏,严重影响了农村老人的精神生活,受访老人迫切要求建设老年活动室或老年活动中心,增加养老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聚会、聊

天、打牌、娱乐的场所。依据 CHARLS(2011)数据,通过对全国 28 个省、150 个县、450 个村的抽样分析,发现:社区中有老年活动中心的只占 27.59%,有老年协会的只占 22.10%,有养老院的只占 8.77%,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仅占 2.55%。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严重缺乏,无疑会影响农村老人对社区福利的满意度。

由此可知,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衰微和农村基层组织的空心化,目前农村社区对社区老人福利,在经济支持、服务提供、精神慰藉上发挥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农村老人无法依赖社区福利供给获得满足感,与村委会的疏离感较强,对农村社区福利输送的满意度较低,抱怨较大。

四、结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减少社会不平等,促进社会公正、和谐,我国加快了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步伐,增加了农村养老、医疗、老年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制度供应,农村老人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健全,农村老人社会福利供给在整个福利供给体系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但通过以上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国家福利责任扩大的过程并没有同时带来农村老人对中央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双重认可,而是出现了“向上感恩、向下抱怨”的福利态度悖论,即对中央政府的福利认可度提高,但对基层社区不满意^[25]。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一个理性决策者,农村老人的福利态度主要取决于所属群体的利益,在多元福利主体之中,哪一个主体提供的福利增量越大,使他们受益越多,他们对其的福利满意度也就越高。从中央政府层面而言,随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国家对农村老人的福利承诺和财政投入大幅增加,同时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国家对农村的汲取大大减少,在今夕

对比和一增一减对比中,农村老人切实地感受到了国家福利责任扩大带来的实惠,所以尽管他们仍然期盼国家能够继续加大对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福利投入,但是对于国家建构农村老人福利体系普遍怀有感恩之心。从农村社区层面而言,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村社会福利的筹资者,更是福利服务的主要递送者,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老人福利供给也从以集体福利为主向以家庭福利和个人福利为主转变,农村社区的福利提供能力大为下降,加之有限的福利资源分配不尽合理,服务递送质量不太高,农村老人对“空心化”的农村社区抱怨较多,这也间接证实了此前国外福利态度研究中关于福利态度与福利接受者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研究结论^[10]。显而易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继续加大对农村老人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加强监管,并切实提高基层社区福利服务递送质量,以不断提升农村老人的福利水平和满意度,巩固各级政府执政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SIPETEAN F. The social model of the European Union: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aspects [J].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2013(1): 23.
- [2] LARSEN C A.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welfare attitudes: how welfare regimes influence public support [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8(2): 145.
- [3] SABBAGH C, VANHUYSSSE P.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perceptions and the role of welfare regim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10(6): 638.
- [4] JAEGER M M. Welfare regim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redistribution: the regime hypothesis revisited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2): 157.

- [5] LIPSMEYER C S. Welfare and the discriminating public: evaluating entitlement attitude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3(4):545.
- [6] SVALLFORS S. Policy feedback,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and attitudes to state intervention: Eastern and Western Germany, 1990—2006 [J].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1):119.
- [7] DYCK J J, HUSSEY L S. The end of welfare as we know it? Durable attitudes in a changing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8(4):589.
- [8] BARON J D, COBB-CLARK D A, ERKAL N.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work-welfare attitude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in welfare receipt [R]. IZA discussion papers, 2008.
- [9] BAILEY N, GANNON M, KEARNS A, et al. Living apart, losing sympathy? How neighbourhood context affects attitudes to redistribution and to welfare recipient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13(9):2154.
- [10] FORMA P. The rational legitimacy of the welfare state: popular support for ten income transfer schemes in Finland [J]. *Policy & Politics*, 1997(3):235.
- [11] PETERSEN P A. Welfare state legitimacy: ranking, rating, paying: the popularity and support for Norwegian welfare programmes in the mid 1990s [J].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01(1):27.
- [12] HASENFELD Y, RAFFERTY J A.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welfare state [J]. *Social Forces*, 1989(4):1027.
- [13] 彭国胜. 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1.
- [14] 万国威. 我国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定量研究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136.
- [15] 薛君. 80后新生代的福利意识形态实证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2):75.
- [16] 薛惠元, 曹立前. 农户视角下的新农保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保险研究*, 2012(6):119.
- [17] 亓寿伟, 周少甫. 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1):105.
- [18] GOERRES A, PRINZEN K. Can we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 A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survey instruments with evidence from focus group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2(3):515.
- [19] 岳爱, 杨鑫, 常芳, 等.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 [J]. *管理世界*, 2013(8):101.
- [20] 陈华帅, 曾毅. “新农保”使谁受益: 老人还是子女? [J]. *经济研究*, 2013(8):55.
- [21] 张晔, 刘志彪. “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 [J]. *经济研究*, 2013(8):42.
- [22] 宋士云. 1955—2000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考察 [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60.
- [23] 方黎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贫困居民就医经济负担的影响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2):80.
- [24] 刘继同. 由集体福利到市场福利——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福利政策模式研究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2(5):36.
- [25] LV X. Social policy and regime legitimacy: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4(1):1.



引用格式:余超,王晓云.维权教育视域下基层教师维权困境及应对[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92-96.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92-05

维权教育视域下基层教师维权困境及应对

The dilemma of grass-roots teachers' rights protec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for protecting rights

余超, 王晓云

SHE Chao, WANG Xiao-yun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基层教育的发展和扶贫教育的开展,仰赖庞大的基层教师队伍的辛勤耕耘。然而,迄今基层教师的法定工资、法定福利、法定地位仍未得到有效保障,亟需通过维权教育寻求有效的维权路径。基层教师维权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诸如维权意识淡薄、维权存在思想困惑、维权渠道受限、维权制度保障有待完善等。应通过提高基层教师维权意识,解决基层教师维权思想困惑,拓宽基层教师维权渠道,完善基层教师维权制度等途径,重塑基层教师为人师表的尊严。

关键词:

维权教育;
基层教师;
理性人格;
人文关怀

收稿日期:2016-07-20

作者简介:余超(1989—),男,河南省信阳市人,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王晓云(1978—),女,福建省漳州市人,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第30个教师节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满腔热情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1]李克强总理于2016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2]。这是党和国家对基层教育和教师职业高度重视的充分体现。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教育扶贫战略的实施,都离不开基层教师,即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因此,基层教师权益维护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本文拟从维权教育视角分析基层教师维权问题,以增强基层教师的维权意识,促进基层师资队伍的良好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基层教师维权与维权教育的内在联系

维权教育是通过培养基层教师的法律素养和维权意识,引导其运用合理、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从而维护基层地区的教学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发挥维权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可以提高基层教师运用法律维权的素养与能力,培养基层教师维权的法治意识与观念。维权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导向、保障、开发、教育等功能,其在维护基层教师权益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基层教师维权是维权教育的具体实践,维权教育为基层教师维权提供了思想保障和重要方法。

1. 基层教师维权是维权教育的具体体现

维权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基层教师合法维权,将维权教育理论用于维权实践中。在维权教育实践中,基层教师是维权教育的主要对象。

当代维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基层教师的自由、健康、全面发展,保障其合法权益。这是确立基层教师应有社会地位的政治基础,也是维权教育的实践要求。维权教育体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人文精神,解决基层教师维权难的问题是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2. 维权教育可为基层教师维权提供精神支持与方法辅导

首先,维权教育为基层教师维权提供重要思想保障。维权教育有利于帮助基层教师认清自身的社会地位,树立坚定的职业情感和政治立场,为其维权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同时,维权教育可以推动社会对其价值的认同,使其基本权益得到认可,促使公众认清基层教师维权的缘由和必要性,奠定基层教师维权的舆论基础。其次,维权教育可为基层教师维权提供方法辅导。比如,通过说理引导,强调基层教师享有权利的事实和权利遭受侵害的事实,讲清基层教师需要维权和如何维权的道理,从而规范和引导基层教师合法有效维权。

二、基层教师的权益现状及维权困境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指出:“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依法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3]但在现实中,教师尤其是基层贫困地区教师的生存环境并不理想。

1. 基层教师的权益现状

基层教师合法权益的落实与保障,是提升其工作满意度、家庭和谐度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基层教师的权益现状问题较多。

其一,基层教师的法定工资难以及时足额

发放。近年来,黑龙江、安徽、河南、云南等省份集中出现了“教师维权讨薪”事件,主要诉求是让政府返还克扣工资,绩效按月发放,同城同工同酬^[4-5]。这反映了基层教师的工资难以及时、足额发放的问题相当普遍。工资发放缺乏保障,是我国基层教师长期面临的问题,这与教师“耻于谈薪”也不无关系。

其二,基层教师的法定福利难以落实。2015年《中国教育报》开展了主题为“教师的这些福利,你享受过吗?”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应当享有的各项“法定福利”落地比例未超过其人数的50%,近50%的基层教师对住房、医疗等福利不了解,96%的教师希望提高工资水平。^[6]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教师福利落实比例则更低,尤其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补贴、医疗保险、退休保障等。即使落实教师福利的地区,政府也是把福利放在该地的高级学校、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具体到各个学校,也是根据教师的资历对福利待遇进行“论资排辈”,而非覆盖到所有基层教师。经调查,有些地区对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教师的寒暑假也予以剥夺,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基层教师福利被私吞的违规行为,基层教师的法定福利缺乏有效保障。

其三,基层教师的法定地位不高。基层教师的工资待遇情况,是其法定地位的最直接反映。近些年发生的系列事件充分说明基层教师的法定地位有待提升。例如,2014年年底,甘肃会宁县招聘录取189名警察,其中171人来自教师行业。^[7]据相关人士调查,会宁县基层教师出现“离职潮”的主要原因是收入过低,不能满足正常的生活所需。再如,河北省任丘市的一位工作15年的基层教师每月发到手的工资约为2000元,月、季均没有奖金,也没有年终奖,仅能解决温饱。^[8]这是基层教师工资待遇低的真实情况,它直接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基层教师的法定地位缺乏认同。

2. 基层教师的维权困境

基层教师的基本权利不被认同、未得到保障,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受损,应有的政治地位被降低,进而导致其社会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基层教师依法维权面临着现实、心理两方面的困境^[9],具体体现在维权意识、维权困惑、维权渠道、制度保障四个维度。

其一,基层教师维权意识淡薄。基层学校主要分布在县及其所辖乡镇,是我国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地方。基层教师的综合素养不高,基层教师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也较少,部分基层教师政治、法律素养不高,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维权意识比较薄弱。^[10]

其二,基层教师维权存在思想困惑。基层教师不仅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而且工作环境也相对较差。在社会地位下降、人文关怀缺乏的情况下,基层教师已失去了教师本应有的尊严,不得不忍受社会异样的眼光,其维权过程中充满思想困惑。

其三,基层教师维权渠道受限。在基层地区,教师的诉求没有畅通的渠道可以传达出去,其维权也就存在所谓的“不合法性”,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校工会组织未能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基层教师的意见诉求无处倾诉;二是执法部门对教师维权问题没有制定相应的调解化解机制;三是没有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投诉渠道,教师权益受损问题也未能引起政府、社会、学校的重视。

其四,基层教师维权制度有待完善。基层教师工资待遇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政策保障。如对教师讨薪事件,某地方政府竟回应称,基本工资之所以9年未涨,是因为没有新政策。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教育法》《教师法》等单项法律法规,对基层教师权益的维护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现有的教师权益保障体系仍存在不足,解决基层教师维权困境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维权教育视域下基层教师维权困境的应对策略

维权教育不仅是一种意识教育,也是一种能力教育,其对提升基层教师的维权素养和促进基层教师的有效维权有着重要作用。为此,需要合理运用理论引导、理念倡导、心理疏导等维权教育方式,解决基层教师维权时所面临的自身限制性因素。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尊重基层教师、关注基层教育,减少基层教师权益受损事件的发生。

1. 塑造基层教师的理性人格,提高基层教师的维权意识

基层教师理性人格的塑造是维权教育的内核。基层教师的政治素养、生活态度、职业道德,是决定其理性人格的重要因素,影响其维权的方式和动机。权利意识可分为维权型权利意识、表达型权利意识和参与型权利意识三种,其中在参与型权利意识中,维权意识、表达意识与参与意识都比较强。^[11]因此,应通过维权教育培育基层教师的参与型权利意识,塑造其理性人格,提高其维权意识。首先,基层教师应明确自身的权益与责任。基层教师应通过加强对政治、法律的学习,明确自身享有的权益和应尽的责任,以合法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正确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基层教师维权主体意识的体现,是提升基层教师维权意识和能力的重要路径,也是塑造基层教师理性人格的重要环节。其次,基层教师应提升自身的幸福意识。基层教师幸福意识的提升,是其理性人格塑造的内生性因素,也是提高其自身维权意识的根本。基层教师理性自觉和理性文化的塑造,可促使其理性人格的形成,进而形成其正确的维权意识、维权动机和维权方法。最后,基层教师应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以乐善好施之心对待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以理性的态度将师德风范融入维权实践之中,以促进基层教师正确维权

意识的培育。

2. 加强对教师的心理疏导,减少基层教师的思想困惑

要对基层教师及时实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解决基层教师维权的思想困惑。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注重对基层教师进行心理疏导。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和生存环境不理想等问题,会使部分基层教师不顾正常教学秩序,放下师道尊严,采取非法、暴力等极端手段进行维权。对此,应借助微信、QQ、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对基层教师进行心理疏导,及时有效地破解基层教师的负面心理情绪。第二,应重视对基层教师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从广义上理解,是对人的需要、个性和价值的肯定,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重视。^[12]对基层教师的人文关怀,应体现在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工资、福利等待遇问题上,通过制定教学激励方案和提高教师授课课时费标准等方式,以有效缓解基层教师经济困境,提高基层教师的工资薪酬水平和生活幸福指数。

3. 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拓宽基层教师维权渠道

基层教师维权诉求的有效表达,是基层教师维权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其维权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要聚集多方社会力量,不断拓宽基层教师维权诉求的表达渠道,增强基层教师维权诉求方式的合法性,提高基层教师维权诉求的有效性。这就要求:第一,要强化学校工会社会服务的职能。要积极发挥学校工会的组织协调作用,积极与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和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维护教师权益。同时,学校工会要勇于担当社会协调的角色,善于倾听基层教师的意见诉求,及时梳理整合基层教师的提议,并将其转达给有关部门,做好解决利益冲突的“搭桥人”。第二,要完善法律援助调解渠道。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应积极为基层教师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基层教师合法

维权。此外,法律服务机构还应拓宽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不仅为基层教师解决讨薪问题,还应帮其争取应有的其他福利待遇。第三,要合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可利用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QQ群等网络媒体渠道,对有关基层教师维权的问题进行报道,揭露侵害基层教师权益的违法行为,大胆曝光一些恶性侵权事件,壮大社会舆论监督声势。通过社会舆论,创造尊重基层教师权益和关注基层教育的社会环境,引起社会对基层教师维权问题的关注。同时,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媒体渠道,对学校教师聘任条例的制定和教师聘任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实现基层教师有理有据维权。

4. 强化基层政府对教师权益的保障职能

基层教师的权益保障主要是指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法律保障、制度保障和政策保障。应落实基层政府在法律、制度、政策等层面的职责,以促进基层教师维权困境解决的常态化、长效化。第一,基层政府应依法行政,完善基层教师权益的法律保障,构建基层教师维权机制的法律基石。我国已制定的《劳动合同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就教育拨款和教师工资问题已做出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如果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拖欠工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等,建立健全基层教师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第二,基层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建立配套的教师权益保障制度。基层教师权益的制度保障体系,包括同工同城同酬、休息休假、足额发放工资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是构建基层教师维权机制的制度基石。要制定具有激励效应的绩效考核指标,制定普法宣传制度,提高基层教师的法律素养和自保意识。第三,落实基层政府政策保障职责。完善基层教师权益的政策保障体系,是构建基层教师维权机制的政策基石。基层政府应加强对基层教师权益保障政策运行的监督,实施内外监管,以维护基

层教师权益保障政策的健康运行,同时明确基层教师权益方面的责任清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N]. 人民日报, 2014-09-10(01).
- [2] 李克强. 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16-03-05)[2016-07-20]. http://www.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3/05/c_128775704.htm.
- [3] 刘波, 刘泽环. 近十年教师身份公务员化研究述评[J]. 教学与管理(理论版), 2012(4): 3-5.
- [4] 本刊评论员. “教师讨薪”折射教师职业吸引力提升之困[J]. 上海教育, 2015(3): 1.
- [5] 人民网. 河南罗山数百教师维权讨工资, 政府急发绩效[EB/OL]. (2014-12-29)[2016-07-05] <http://edu.people.com.cn/n/2014/1228/c1053-26287906.html>.
- [6] 杨国营, 宋伟涛, 王玥. 法定福利多数教师“无福消受”——大数据透视基层教师福利现状[N]. 中国教育报, 2015-06-06(05).
- [7] 杨于泽. 重视基层教师队伍建设[N]. 长江日报, 2015-08-13(03).
- [8] 叶婧, 吴燕婷. 不少基层教师每月到手工资只有2000多元, 有待提高[N]. 新华每日电讯, 2014-11-22(04).
- [9] 李佳源, 苗高萌. 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困境解读及制度出路[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39.
- [10] 胡乐明, 陈晓菲, 王杰. 维权意识、工资集体协商与工资效应[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5(5): 53.
- [11] 秦阿琳. 从维权到参与: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演进[J]. 求索, 2014(9): 20.
- [12] 申维辰. 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N]. 人民日报, 2011-10-11(04).



引用格式:杨子江,柏昌利. 中日近代学制比较——以中国《癸卯学制》和日本《学制》为例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97-103.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1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97-07

中日近代学制比较

——以中国《癸卯学制》和日本《学制》为例

The comparison of recent educational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aking China's *Kuimao educational system* and Japan's *Educational system* for example

杨子江, 柏昌利

YANG Zi-jiang, BAI Chang-li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学制是一个国家教育体制的核心,是各国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中日两国近代学制在推行和发展中许多方面均存在差异。日本的教育改革和学制制定有更明确的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富国强兵、普及义务教育;相较之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则略显被动。从中国的《癸卯学制》与日本《学制》两部著述来看,中国学制的指导思想虽较为笼统,但也改变了单一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模式,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奠定了现代学制公平性的基础;日本学制的指导思想带有强烈的反封建性,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中日两国近代学制对两国近代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加速了教育改革的步伐。

关键词:

近代学制;
近代教育;
中日比较

收稿日期:2016-03-16

作者简介:杨子江(1991—),女,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柏昌利(1960—),男,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所谓学制,简单来说,就是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是实施教育的组织体系。18世纪中后期,西方近代化浪潮的涌入,使中日传统教育思想和旧式教育体制均遭受巨大冲击,为满足国家近代化对于教育的要求,两国分别出台了新学制作作为近代化教育改革的“指挥棒”,以此推动教育的近代化发展。

在中日近代学制的比较研究中,学者大多关注其历史背景和对近代教育的作用,没有深入探究学制实施成败的内在原因。本文认为,学制能否顺利推行直接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同时与学制内容本身是否合理密切相关。由于中日近代学制在预期目标、内容和实施环境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它们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一、中日近代学制产生背景比较

1. 中国近代学制产生的背景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冲击下,清朝末期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给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很大影响,新的教育思想启发了许多有识之士,近代学堂的产生,以及对科举制度弊端的凸显等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中国近代学制的产生。

首先,清末留洋官员的积极进言,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出台提供了重要思想准备。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收录的文献可以看出,自1866年起,从第一个出访欧洲的中国官员斌椿写下的《职方外记》,到王之春的《广学校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学制》等,无不深受西方和日本诸国完善的教育制度的影响和感染。张謇在他的《变法评议》中写道:“东西各国,学校如林,析其专家,无虑百数。前导后继,推求益精。但能择善而从,皆足资我师法。……为中国今日计,不独当师其改定之法,亦当深知其初定之

意。”^[1]罗振玉的《学制私议》详细论述了教育宗旨、教育阶段、每日授课时数、教员、考试,以及残障人士如何受教等十二条制度。这些表明,最先接触到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官员提出了教育近代化的诉求和实施方案,为中国近代学制诞生做了良好铺垫。

其次,新式学堂大量增加并迅猛发展,为中国近代学制的确立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朝末年,中国各类学堂数量迅速增长,其中包括西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和水师、武备学堂等多个种类。截至1902年,学堂的学生数量已达8912人。^[2]其中,于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已经有了初步的中学与大学之分,而南洋公学已经有了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之分,以及师范学校等专科学校之分,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令“除京师已设之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3]。规模和数量日俱增加的学堂需要统一的管理办法,愈发凸显设立新学制的必要性。

最后,科举制度脱离现实的弊病愈加凸显,成为近代学制确立并实施的重要现实原因。清末时期国家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社会现实,与西方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巨大反差。清末时期的科举,科场风气不正,考试内容严重偏离社会发展需要,人才选拔制度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当一种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发展时,必然要有新的制度取而代之。

2. 日本近代学制产生的背景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理念和要求,其成果之一就是日本近代学制的产生。19世纪中期,日本掀起了明治维新运动,确立了国家“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发展目标。为实现“富国强兵”,明治政府非

常注重对西方教育文化的学习和引进,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如聘用外国专家和技师并派遣留学生,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政府开始制定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学校制度,明治三年(1870年)出台的《大学规则》正式确立大中小学学校体系,同时开始着手民众教育。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直接推动了日本近代学制的产生,而且为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推动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本旧式教育体制不能满足新的人才需要,是加速新学制出台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长期以来,日本都是沿袭德川幕府时期的教育制度,本质上是以贵族教育为主。大多数教育机构,如“藩校”、“乡校”(针对商人和地主)、“寺子屋”(针对平民)等,严格说来均不是符合教育体制规范的学校,也不符合维新运动所倡导的新式人才教育观,因而创建新式教育制度变得迫在眉睫。明治二年(1869年),地区政府依据教育改革方案,开始设置初等、中等学校,并对旧式学校进行改造;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文部省,负责推进国民教育改革;1871年,文部省成立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新学制的编制。至此,日本完成了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学制的产生背景,可以看出,其相同之处在于,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旧的教育体制均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需要改革并制定新的教育体制;其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教育改革和学制制定有更明确的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富国强兵、普及义务教育。另外,此前日本的教育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果,为其近代学制的产生打下了根基。相较之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则显得非常被动。

二、中日近代学制内容比较

1902年,《壬寅学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

有了统一的近代学制。两年后又推出的《癸卯学制》,是张之洞、张百熙等人结合湖北实际,将《壬寅学制》加以改良后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推行的新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学制正式确立的标志,该学制一直沿用到1922年,之后由中华民国的《壬戌学制》取而代之。1872年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出台了第一个《学制》,这是第一个面向全国而制定的综合性现代教育制度,一直沿用至1879年,由《教育令》取代。总的说来,中日近代学制的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1. 指导思想方面的差异

清末《癸卯学制》确立了“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宗旨,在《学务纲要》中分别对各级学堂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堂培养儿童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和中等学堂培养学生的谋生能力,使其掌握必备知识,为其毕业后谋生打好基础;高等学堂(大学堂)的学生主要学习国政民事,使其成为未来国家治理的储备人才。此外,对通儒院、实业学堂、译学馆、进士馆、师范学堂等都制定了基本办学宗旨。总体来看,各学堂职责分明、分工明确,对于各级学堂毕业生所应达到的基本能力要求较为实际。此外,《癸卯学制》体现出张之洞一贯的“中体西用”思想,学生学习依旧以忠孝为本、经史为基。《学务纲要》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规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在各级学堂章程中还明确规定了学习经史的课时和课程内容,同时明确将学生品行的考核作为考试通过的必要条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学为体”的学制指导方针。

日本《学制》的指导思想带有强列的反封建的时代意蕴。首先,它否定了封建教育理念,

坚持教育是个人的立身、治产、昌业之本的近代教育观,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次,它提倡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全民教育理念;最后,它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主张围绕“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办教育,强调以个人实业厚生为目的做学问。此外,在学制制定中,日本很大程度上也整合了西方多国学制的精髓,将自身学制打造成为多元化的复合制度,这也体现出日本在每一个领域中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尽可能地集各国之大成的民族心理^[4]。

相比而言,中国学制的指导思想较为笼统,没有摆脱传统教育制度的影子,依然以传统儒学教育为主,突出伦理道德,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此外,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日本以学习西方制度为主,教育改革从观念入手,因此比较彻底;中国以培养技艺人才为主,教育改革停留在器物层面,这也是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文本方面的差异

中国的《癸卯学制》以《学务纲要》为总纲,共计22个章程,对各级学堂的招生对象、开设课程、入学条件、考试与毕业等都作了详尽规定。日本《学制》的内容由学区、学校、教师、学生和考试、海外留学生规则和学费六部分组成,共109章。作为《学制》的补充,1873年日本发布了《学制二编》《学制追加》和《学制二编追加》,增添了关于海外留学生规则、神官僧侣学校相关规定、学科毕业证书规定、专门学校、外语学校等,共计213章。为更直观地比较中日近代学制在内容上的异同,笔者将两种学制中关于学区、学校设置、升学、考试、费用、教员、课程设置等内容列于表1予以说明。表1表明,我国的《癸卯学制》更加详尽实际和人性化,可实施性更高,各地区学堂的建设和推行有一定的自由度;而日本《学制》的规定更完备,尤其

在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与特殊人群的教育上考虑非常细致。从当时的国情来说,日本学制有些理想化,没有考虑各地区的实情;但从长远角度来说,它是符合国家近代化发展需求的,更能促进教育持续长久发展。

三、中日近代学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教育影响比较

1. 《癸卯学制》对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影响

《癸卯学制》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体系的基本确立。《癸卯学制》对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具体影响是:其一,改变了单一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模式,重视发展普及教育和师范教育。由洋务运动开始的西学,只针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发展,而没有考虑从根基着手以改变国民教育落后的现实。中国近代学制的颁布,细化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办学宗旨,大力推进了师范和实业教育体系和专门学堂的发展,使教育普及有了明确方向。其二,新学制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封建教育制度的最终解体。在《癸卯学制》颁布初期,科举制并未迅速废止。新学制规定的学堂学习时间较长、规章制度繁多,而科举制度虽然由于官员上书逐年分科递减,但仍是步入利禄之途的捷径。在此情况下,选士大多仍抱侥幸心理,舍远求近、舍难求易。由此造成学堂招生困难,即使入学条件宽厚,举荐的学生也不愿意入学堂。这种社会风气导致学堂有名无实,新学制的推行严重受阻。因此,袁世凯、赵尔翼、张之洞等上书,建议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制由此得以废除,全国统一执行新学制。其三,《癸卯学制》开启了中国现代学制单轨制传统,奠定了现代学制公平性的基础。所谓单轨制就是不分阶级和社会地位,所有的学生用一套教育体系培养,没有特殊区分,这一性质延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其四,《癸卯

表1 《癸卯学制》《学制》学制内容比较^{[2]300-337,494-521[5]}

名目	中国《癸卯学制》	日本《学制》
学区	按省划分,不限学堂数量	全国分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大学1所,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小学1所,共计大学8所,中学256所,小学53760所
学校设置	初等教育阶段: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 中等教育阶段:中学堂(5年); 高等教育阶段: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3~4年)、通儒院(5年); 另设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四者皆属高等教育性质)	小学:分上下两等,6~9岁为下等,10~13岁为上等,共8年。类别分为寻常小学,幼稚小学,私塾小学,贫民小学,村落小学,女儿小学和残疾人小学; 中学:分为上下两级,共6年。除普通中学外,还设立商业学校、通弁(翻译)学校、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诸民学校(在职人员业余教育)、残疾人学校; 大学:分大学和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类似职业学院,例如矿山学校、法学校、医学校、艺术学校等
升学	高等小学毕业学生给凭归地方官考试核办,升入中学堂;中学堂毕业学生给凭归道府大员考试核办,升入高等学堂;高等学堂毕业学生的考试由简放主要负责,督抚学政辅佐;大学堂毕业学生由简放总裁和学务大臣共同组织考试	规定儿童适龄必须入小学,能否升学由升学考试成绩决定
考试	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外场分数(按学习程度、课程内容分类出题)、内场分数(文学考试)和品行分数,品行分数必须合格,然后依照另行章程,依据出身不同,分别录用	分为小考(升级考试)和大考(毕业考试),小学和中学在毕业时要进行大考,合格者授予毕业证书,对优等生有奖励制度,大学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费用	除初等小学堂和优级、初级师范学堂不收学费外,其余学堂均收学费,其中伙食费、住宿费、书籍衣服费用等需学生自己承担;学费收缴的多少各省依据筹款情况自定,但要求费用适度,学生力所能及	由三部分组成:学生缴纳的学费;民间捐赠款、学区内筹集和诸项存款利息;国库补助的委托款。对于家庭贫困、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贷款交学费
教员	学堂的教员列作职官,方便管理并规定年限;国籍不限,中外教师皆可,但外国教员不得讲授宗教知识	小学教员年龄在20岁以上,性别不限,要求获得师范学校毕业证书或中学毕业证书;中学教员年龄在25岁以上并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大学教员须获得学士称号
课程设置	小学堂:初等小学堂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8门,图画、手工酌情开设;高等小学堂除上述8门外加中国历史1门,农业、商业酌情开设; 中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体操、法治理财(酌情选择)12门; 高等学堂:分为经学科、格致科和医科3类,每类有不同基础学科,此外依据学生兴趣开设不同方向的课程; 大学堂:分8类,经学科(含理学)、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每科分不同门,每门开设不同课程,学制中有详细介绍	小学:分三等科,初等、中等、高等内容逐渐增多,高等科目为修身、读书、习字、绘画、体操、地理、博物、物理、裁缝、化学、经济、生理、几何等; 中学:下等中学学习国语学、数学、习字、地学、史学、外语学、理学、画学、古言学、几何学、记簿法、化学、修身学、测量学、奏乐,上等中学增加动植物学、地质矿物学、经济学、重学; 大学:理学、法学、化学、医学、数学,后加文科、法科、医科等学科; 在追加条文中又对专门学校(如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矿山学校、兽医学校、外国语学校等)进行详细规定
学生	不设女学,录取时有保人限制	不分性别和出身,专设女子学校

注:* 简放,清代指经纶叙派任的道府以上外官;** 总裁,清代指中央编纂机构的主管官员和主持会试的大臣。

学制》改革了传统教育内容和方法,将西方教育思想融入了教育教学和课程设制中。例如,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提到,教授儿童要循循善诱,不应体罚伤害学生,让学生犯错后有羞耻之感即可,对于记忆力差的学生可让其用自己的话讲解文章,不宜强制背诵经文等。这些规定说明:我国学制已将西方儿童心理学思想融入教师的教育教学中。

《癸卯学制》出台之时,日本《学制》已出台实施32年。我国虽然也注重学习其学制,但没有看到日本近代教育观念的深层含义。也就是说,《癸卯学制》在制定实施中依然没有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将教育改革只是当作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此外,在社会环境动荡和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中,百姓也无心学习。这使得学制在推行过程中阻碍重重,流于形式的弊病较为严重。有日本学者曾评论中国在推行学制中的现状:“各省督抚铺排门面,上下相蒙,常怀观望,依违不决,即有末一二学堂,亦不过具文,有兴学之名,无教育之实……财政无统一之制,官吏后公益而先私利,欲兴学堂,无款可筹拨……巨室富人,甘为守钱奴,宁投财于游冶祷祀,而不用之于教育……人民风气感情不一,或有讼言革命变法,自由平等,不受约束,政府辄当罪新学,晋绅章甫惧祸及己,不敢提倡新学。”^[7]此评论真切地道出了清末学制在贯彻实施中的实情。

2. 《学制》对日本近代化教育的影响

日本《学制》在其教育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把教育的普及和国家的生存、富强、发展与国民的修身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施促使其国民基本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其一,学制提出教育是立国之本,把教育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很深刻、很有远见的认识。教育是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其作用虽不是立竿见影的,而且前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

入,但对国家未来发展可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新的教育观影响了近现代日本的发展,对于学校性质的规定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生活。其二,《学制》的实施极大促进了日本初等教育的普及,为之后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县级政府把平均财政的40%以上用于初等教育,并且为小学提供最好的基础设施。这使得日本的学校数量、教员数量和学生数量迅速增长。明治六年至明治十二年,日本的小学数量由12558所发展到28025所,儿童上学人数从110万增加至230万,教员从2.5万增至7.1万,就学率从28%增加至41%。其三,《学制》在思想上逐步塑造并培育了国民意志,使人们主动参与日本经济建设,由此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提出:“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

但是,《学制》在日本的推行也引发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学费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另外,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方式也使得教育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教育改革中的实用与功利主义心态,导致了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出现与自身改造的不适应性。此外,学制内容也不尽合理,从效果看,高估了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近代学制的制定和实施加速了国家教育改革的步伐。中日两国当时都处在从封建社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时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推进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并且都以制定和实施新学制为教育改革的标志。学制是教育制度的核心,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同时也深刻地印上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对比中日两国学制的差异和

两国后来的发展实际不难看出,教育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教育理念和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同时也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历史变革息息相关。归根结底,教育的发展根本上还是依赖于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 [1]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10.
- [2] 王笛. 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J]. 史学月

刊,1986(02):110.

- [3] 璩鑫圭. 学制演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4] 马立民. 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改革及其特点研究[J]. 中外教育研究,2011(12):67.
- [5] 石艳春. 日本明治初期的《学制》[J]. 学术论坛,2010(06):180.
- [6] 杨晓. 癸卯学制与近代日本须知的比较[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06):23.

(上接第64页)

- [5] 贾立政. 感受美国期刊数字化转型[J]. 新闻战线,2014(3):27.
- [6] 文之强. 以新媒体为核心建立三次售卖模型[J]. 中国报业,2014(4):14
- [7] 向飒. 媒介融合下的期刊数字化发展生存之道[J]. 传媒,2012(8):30.
- [8] 周小玲. 学术期刊如何实现微信传播?[J].

社会观察,2014(10):12.

- [9] 向飒. 论媒介融合下期刊品牌影响力的网络传播策略[J]. 出版广角,2012(8):70.
- [10] 雷永青. 从“读者”到“用户”——探讨传统纸媒转型的盈利模式[J]. 新闻与写作,2014(2):32.
- [11] 王磊,赵文义. 学术期刊的品牌与盈利模式分析[J]. 编辑之友,2012(2):18.



引用格式:李燕华,乔晓宇. 亚当·斯密的责任感理论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责任感教育的启示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104-108.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104-05

亚当·斯密的责任感理论 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责任感教育的启示

Enlightment of Adam Smith's responsibility theory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李燕华, 乔晓宇

LI Yan-hua, QIAO Xiao-yu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当代中国大学生中不乏牺牲自我以成全社会和他人的人,他们为其他青年做出了表率,但是也有很多大学生责任感意识缺失,功利心严重,不能很好地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借鉴亚当·斯密的责任感理论,以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教育为路径,可以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责任感培养提供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模式: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建构完善的责任感理论基础;二是学校和家庭应高度重视大学生的责任感教育;三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加强社会责任感教育。

关键词:

亚当·斯密;
责任感理论;
责任感教育

收稿日期:2016-08-20

作者简介:李燕华(1963—),女,河南省辉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乔晓宇(1991—),女,河南省信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近年来,许多家长为其子女提供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致使子女过分注重个人利益,攀比成风,责任意识淡薄。这一现象在当代中国大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学阶段是大学生独立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可塑性较强,容易受到外来价值观念的冲击,因而道德教育对其健康成长非常重要。但我国道德教育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道德教育都有欠缺,致使大学生责任感缺失的问题越发凸显。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人才储备,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不仅需要其具有良好的知识素养,更需要其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因此,建立完善道德培育机制,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是目前我国高校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有关责任感问题,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尤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在其道德理论中论述了责任感的本质,系统探讨了责任感的产生过程、责任感教育的重要性、个人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密切关系等。基于目前我国大学生的责任感现状,本文拟在系统分析亚当·斯密责任感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大学生责任感教育方略。

一、当代中国大学生责任感现状与成因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是大学生为社会和他人作积极贡献的觉悟意识和自觉情感,是一种内化的精神追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他们的责任感关乎民族的兴衰。”^[1]不管是对于大学生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责任感都不可或缺。责任感在要求大学生对自身负责的同时,也鼓励他们为社会做出表率 and 贡献,引导他们关注他人和群体的利益。但是目前我国大学生的责任感状况不容乐观,无论

是个人责任感还是社会责任感都普遍缺失。

1. 大学生责任感普遍缺失

大学生责任感的普遍缺失具体体现在过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自我意识增强带来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减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目标并为之奋斗的行为虽是积极的,但是由于大学生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切断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如很多大学生在就业时,不愿意选择能够带来更多社会价值的工作,首先考虑的是工作舒适、待遇较好等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因素。大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也有所缺失,对于社会中出现的违背社会公德的事件常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例如,当看到他人随意破坏公物时,一些大学生不但不及时制止反而自己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社会公共群体的利益,不惜违背道德的谴责与约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甚至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的人群”^[2]。

2. 大学生责任感缺失的原因

造成当代中国大学生责任感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社会意识多元化对当代大学生责任感的形成有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带来人们物质生活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多元的价值观,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念侵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代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物质条件较好,精神独立自主,但由于缺少集体意识,很多大学生不懂得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分享,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漠视他人和集体利益的自私意识。其二,学校没有对道德教育特别是责任感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的学校教育过多地将重点放在了文化知识的传授上,过于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忽视道德教育,即使开设有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也多流于形式,枯燥古板,过于口号化,学生死记硬背以应付考

试,难以入心。最后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在道德责任理论上颇为熟练,在实践中却不能付诸于行动,遇事还是偏向了利己主义。其三,家庭责任感教育缺失。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行为和态度最能直接影响孩子的价值观,但是目前很多家长都把学习成绩作为孩子成长的标杆,只在意升学考试,忽视思想品质和生活实践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影响,错过了孩子思想道德形成的最佳阶段,很多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未形成主动承担责任的意识。其四,大学生自身缺乏对责任感的认识。如果说前面所提到的都是导致大学生责任感缺失的外部因素,那么大学生本身自我约束意识薄弱则是导致其责任感缺失的内在因素。在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自我约束力薄弱的大学生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容易出现偏差,最终导致其责任感的缺失。

二、亚当·斯密责任感理论的基本内容

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以同情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各种美德的特点、道德的性质、道德的评价标准及其保障途径。同情心是道德的起源,“公正的旁观者”是道德的评价标准,责任感是道德原则的保障。亚当·斯密的责任感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责任感的产生过程

亚当·斯密认为,当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时,就需要人们自觉地去遵守,这种对规范或准则的尊重和遵守的情感趋向被称为责任感,或者义务感。那么这种责任感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照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公正的旁观者”的使命是制定对所有社会成员一视同仁的社会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的权威性来源于人们对其有效的执行,而人们的责任感则是为了保障道德原则的有效性,为这些

规范的执行提供动力。虽然人们的情感和行为有“公正的旁观者”的监督,但由于人天生偏爱自己的情感,有时会影响人们对自己行为和感情是否具有合宜性的判断,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这就需要一个时刻提醒人们端正评判态度并做出正确行为的仲裁者,以为道德原则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感就扮演了这一监督者的角色。比如,当一件事情发生时,人们需要做出某种对应的行为,“公正的旁观者”会提醒人们这种行为是不可行的,是不被认可和违背道德准则的,但是当这个行为发生时某些人可以从中获得利益,人们会自我暗示:这种行为是可行的、正确的,以求心安理得。这时候,责任感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它会让人们心中的天平不再倾斜,强制人们遵照“公正的旁观者”的指示做出反应。所以当责任感在人们心中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些影响判断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都可以被有效屏蔽,即人们基于责任感所做出的反应大多是不受心境变化影响的,“一旦我们已经形成了某种指导各种行为的道德规范,人类的那些自欺欺人的倾向和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反复地进行情感冲突、搏斗的困惑以及道德腐败的可能性就大大被化解了,当我们面对某种抉择时,我们就会被纳入到一个一般化的道德规范之内来判断,而不必去权衡自己的激情与公正旁观者的眼光之间的张力”^[3]。对于正面的情感,人们会选择遵从内心的激情,扩大感情效应对行为的影响;而面对负面的情感,人们则会根据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尽量减少自身偏爱的作用。只有人们自身的激情与道德准则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责任感,这也是人们需要具有责任感的原因。

2. 个人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关系

责任感能够有效保持人们社会行为的持续稳定,使人们变得可靠,建立人们对彼此行为的

预期,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亚当·斯密强调,个人的道德行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同样,个人责任感也不能脱离社会责任感而存在。个人责任感作用的对象是自己,是人们对于自己或者与自己相关的事情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关注度;而社会责任感作用的对象是他人,是自己对于社会其他成员及组织的关怀和希望其履行的义务。个人责任感是在社会责任感中实现其价值的,一旦离开社会责任感,个人责任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个人的收益和理想固然重要,但是在社会责任感面前,个人需要为集体的利益而做出让步,因为没有社会的稳定,个人理想就无法实现。社会建设虽离不开社会责任感,但社会责任感需要建立在个人责任感的基础之上,社会的繁荣是由社会成员的利益、贡献和理想集结而成的,人们只有对个人的道德行为负责,才能保证其对社会具有相同的情感共鸣。所以,个人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不可互相取代。

3. 责任感意识受后期培育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有关道德准则与个人情感之关系的论述中提出:“所有慈爱的情感鼓舞我们做出的那些优雅可敬的行为,出自那些情感本身的程度,应该不亚于出自任何对概括性行为规则的顾虑。”^[4]人们对于道德准则的遵守,并不只因为道德准则本身,如果强迫人们违背内心的意愿按规则去施行,即使在行为结果上无可指责,行为的过程也是不受欢迎的,正确的责任感行为是要达到情感与道德准则的统一。亚当·斯密举例说,一个儿子即使在孝道责任上没有缺失,但如果他缺乏身为对父母的敬爱之情,那么父母抱怨其冷漠就是合理的。因而,无论是把道德准则变成人们自身责任感的基础,还是保持责任感的认知,都需要通过后期的教育、培训,以及他人示范的影响,从最开始的经验慢慢变成自然而然的情感,从而在人

们不需要思考权衡的情况下就能做出既符合道德准则又符合个人情感的主动行为。由此可见,责任感意识的后期培育在责任感的形成、稳固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亚当·斯密在他的责任感理论中强调,如果人们失去责任感的约束,不仅会导致个体行为的混乱,连简单的道德准则都难以遵守,还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塌。因此,社会道德原则的维护依赖人们的责任感。

三、亚当·斯密的责任感理论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责任感教育的启示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正值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人们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导致了道德的崩塌。面对这种状况,亚当·斯密提出了一系列道德理论,企图唤醒在经济生活中迷失的人们,使其关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给国民生活水平带来提高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类似于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道德滑坡的现象。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重视社会责任感教育,而大学生作为国家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仅应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而且应具有较高的道德责任感。受亚当·斯密责任感理论的启示,结合我国当前大学生责任感现状,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感。

1. 建构完善的责任感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指出,人们责任感的形成需要后天的示范和培育,而责任感的培养要从理论引导做起。亚当·斯密的责任感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责任感的本质,把“遵从内心意愿主动承担责任”看作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并且强调责任感在道德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价值观要求,这是我国责任感教育的理论基础。因此,当代中国大学生责任感教育的理论基础的建构,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同时借鉴亚当·斯密责任感理论的有益部分,立足于中国大学生责任感教育的现实,既要有理论自信又要吸纳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

2. 学校和家庭应高度重视大学生的责任感教育

学校应将强制性的教学过渡到主动性的教学,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根据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教师以身作则,起到示范和表率的作用。在家庭教育方面,首先,父母应转变“以学习为本”的陈旧思想观念,除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物质生活外,还应该注意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和沟通能力。其次,父母应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孩子积极参与到家庭活动中来,根据孩子的道德表现建立相应的奖惩规则。另外,父母还应时刻注意审视自身的行为,做孩子的道德表率,引导其树立正确的责任观念。

3.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加强社会责任感教育

责任感的形成与示范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我国大学生的责任感教育中,要充分利用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团队意识,在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一方面可以通过与他人交流、协作来增强集体责任感,养成主动关爱他人、互帮互助的良好品德;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与他人对比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提高个人的责任意识,增强自律意识,正视个人价值和潜能,不

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系列的社会责任感教育能够让大学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坚守住自我,承受住考验,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四、结语

当代中国大学生中不乏牺牲自我以成全社会和他人的人,他们为其他青年做出了表率,但是也有很多大学生责任感意识缺失,功利心严重,不能很好地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而大学生的责任感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脚踏实地,逐渐展开,以改善社会道德风尚。亚当·斯密作为近现代伟大的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其责任感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结合我国大学生责任感教育的现状有选择地借鉴,对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责任感教育意义重大。在亚当·斯密的责任感理论的启迪下,以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教育为路径,可以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责任感培养提供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模式。

参考文献:

- [1] 郭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J]. 思想教育研究, 2013(2): 90.
- [2] 吴帆, 陈岸涛. 场域分层: 大学生责任感缺失与培养论略[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4(8): 102.
- [3] 张丽娟. 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 [4]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208.